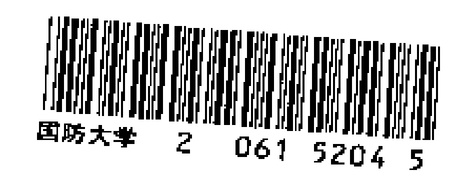
◯ 世界史精览 ◯

铁血与金钱

——俾斯麦统一德国的故事



长春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1 5204 5

世界史精览

K297/21

铁血与金钱

——俾斯麦统一德国的故事

姜德昌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10号

世界史精览

铁血与金钱

姜德昌 著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5年2月第1版
印张：10.875 插页：4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53 000　　印数：1—5000册

ISBN 7-80604-220-2/K·16

定价：13.00元 （全32册）388.00元

《世界史精览》编委会

总策划 杨德宏 王占通
主 编 申晨星
副主编 王恒伟 夏保成 张耀民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占通 王亚玲 王国瑞 王洪玉
王恒伟 冯 超 申卫星 申晨星
刘 泓 阴 玺 巩英春 李松梅
李 键 李焕栋 李曦瞳 杜宇峰
陈文海 宋洪章 杨德宏 张耀民
周 杰 郑淑芬 夏保成 鄂淑燕
颜海英

序

人，无不憧憬明天，也频频回顾昨天。从总结昨天得到启发，汲取教益，变得聪明。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作为类，人类也是如此。这个昨天，就是历史，是不可追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家去研究它，表述它，写出来的，人们也称之为历史。

历史家的历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客观”的历史。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你逛过一个商店归来能把万种商品千人顾客百般陈列一一状写得“客观”无疑吗！何况人类历史的复杂性那是商店的琳琅满目无法比拟的。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一点，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每个历史家都从不同的时代视野、不同的方位视角去审视客观的历史，写出不雷同的历史，得出不同的见解：或灼见、或偏见，或深邃，或表象。

今天不是历史，而是现状，一旦到了明天，今天的现状就成了昨天，成了历史。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文化大革命，海湾战争等等便相继进入了历史家的视野，历史不断增添新的、需要从头研究的领域。今

天的历史家写出一部最成功的史著，明天的历史家也会感到不足。因为总会有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手段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认识的前进。比如，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家乡，村边小溪所引发的思绪，必然与他儿时同小朋友戏水时的感受迥异。那么，一代代历史家之间对历史长河的理解又怎能一致。难道还会有哪位现代历史家以“宗周”“据鲁”的原则去写春秋么！不唯如此，在历史家的历史中还有历史的伪造，尽管历史伪造者在史学史上极少（不能把或由于疏忽，或由于资料不足研究手段落后造成的失误列入此类）。且说那部曾被推崇备至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罢，如不论其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多少共同点，仅就史实而言，这部大作中充满了大量伪造，并开了一代谤史的先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一批批列宁时代的老战士被污为“帝国主义走狗”、“奸细”、“间谍”。谎言即使由钢铸就那也是脆弱的，如今那些污陷阴谋已真相大白。历史家当然要重写这段历史。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因素，从孔丘、司马迁、希罗多德到今天，古老的历史学还在开拓前进。人类只要拥有明天，就不会忘怀昨天，历史之树常青。

历史学的功能，因写史人的眼界不同而不同。司马光把他主编的那部名著题名《资治通鉴》，目的了然：“资治”，为君王提供统治术，达到一家天下长治久安。封建社会的“正史”大抵都奉行这一最高宗旨。随着近代

民主政治的推进，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史学逐渐被抛弃。本世纪20年代末兴起于法国而后波及全世界的新史学学派一反传统，冷漠政治史，热心“长时段”的、普通人参与的历史问题，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态史备受青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视。他们稔熟古代史，他们对古代农村公社、国家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巩固了哲学唯物史观，确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确证现存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现实的阶级斗争史更受到他们的重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篇幅不大，但却不能不列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1851年底至1852年初，却预报了下一次法国革命即近20年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主题：打碎官僚国家机器，代之以社会公仆的政府。这个主题至今光辉不减。

垂范史坛的大家大手笔毕竟是少数。以一般的教化功能为主的史著则是大量的。这其中有的明确限定主题，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等等；有的则是一般历史知识。我国向有重视历史通俗读物的传统。《三字经》从“自羲农，至黄帝”开始，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历史。宋元时人陈栎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以历史普及读物常传不衰。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普及现代科技常识，加强外语学习，都十分重要，今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应照搬古人。但是具备一般历史常识还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中国历史普及读物编写和出版都有可喜成绩，有的工程浩大，有的富有新意。世界史方面的同类读物相比之下略嫌不足。长春出版社的同志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倡议、组织编写这套丛书。倡议得到一批同仁响应，有学有造诣的师友鼎力合作，有在读学位的青年朋友热情参与。历时近二年，丛书即将付锌，如果它能在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将是几十同道的极大欣慰。

编写这样一套通俗历史读物，在我们是初尝，没有设计成规，只提出一般原则：科学性与可读性。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处理，则由每册作者自夺，文责自负。至于风格，更没有追求划一。倘如常言所道文如其人，那末，30 余人本就各异，何必一律严肃、一律微笑呢。从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长河中，选出 30 个左右题目，当然只是举起算算大者。但也有些重要题目因有关通俗著述较多，本套丛书就没有再重写，好在读者也不是把它作为教材来读。

全体同事虽付出很多劳动，但纰漏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和读者指正。

申晨星

一九九四年六月

目　　录

第一章 预 言

国破山河在，德意志人民不可侮

1815年，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德国历史的转折点。曾经席卷欧洲大陆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即拿破仑·波拿巴）被送往大西洋的圣赫伦纳岛，反法联军凯旋进入巴黎。在1813——1814年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普鲁士国王弗·威廉三世曾经答应战后要颁布一部宪法。德国人民多么希望战后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能颁布一部宪法。统一和自由，德国人民翘首以待。可是希望落空了，理想竟是南柯梦一场！

1815年，多瑙河缓缓东去。维也纳城却热闹非凡。素有音乐之都的奥国京城，成了欧洲的政治中心。欧洲各国的政治首脑云集维也纳，讨

论和决定拿破仑失败后欧洲的政治命运，修改欧洲的政治地图，重新瓜分欧洲。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耀武扬威，俨然是战败拿破仑的首要人物，陪同他的是俄国外交副大臣涅塞尔罗德。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这位拿破仑的岳丈人，成为会议的东道主。而真正的东道主却是他的首相梅特涅。此公善于造谣欺骗，为达目的而奋不顾身。英国外相卡斯尔累风度翩翩，颇有英国绅士风度，在会议上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送给他的绰号是“呆板迂儒”。普鲁士国王弗·威廉三世，虽然曾被拿破仑赶出柏林的王宫，靠王后亲自会见拿破仑而保存了霍亨索伦家族的王位，长期避居小城默默系，今天却也成了反拿破仑的胜利者，陪同他的是首相哈贝格和外交家威·洪堡。战败国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并没有亲临维也纳，他的代表是外相塔里兰。此人智谋过人，圆滑无比，机警权变，交际广泛。为了保持法国的利益，他在会上周旋折冲，左右逢原。他提出会议应遵循正统主义原则，却成为维也纳会议的指导思想。

维也纳会议是欧洲规模的国际会议，但是又是会非会，既没有开幕式，也没有闭幕式，也

从来没有召开过一次各国代表全体会议。会议历时 7 个月，229 天。梅特涅极尽东道主之谊。代表们在舞会上翩翩起舞，各种宴会频频举杯，招待会一个接着一个，庆祝会的欢呼声彻夜不停。各国的代表陶醉于胜利欢呼而又是酒醉恍惚之中。重要的会议和决议都由大国决定。他们在幕后进行讨价还价，拼搏得你死我活。他们按照自己的利益重新瓜分了欧洲，封建势力重新掌权。历史是罗旋式上升，1815 年是欧洲历史一次大曲折。

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在 1806 年被拿破仑宣布解散了。德意志人民多么希望重建他们伟大的祖国。普鲁士伟大的改革家卡·冯·施泰国作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顾问出席了维也纳会议。他在会议上为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国家而奔走呼号，他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立宪国家。他这样说，他只知道一个祖国，那就是德意志。外交家威·洪堡想把德意志建成一个联邦国家，要有一支强大而统一指挥的军队，一个联邦法院和一部各邦都有议会的联邦宪法。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早在 1814 年就曾考虑制定一部真正的联邦宪法。

一切幻想都成了肥皂泡而破灭了。一切希望都如南柯一梦而落空了。一切诺言都言而无信被抛弃了，德国人民的盼望一切改革都推迟了。反动的势力，反对统一和改革的势力占了上风。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他首先考虑重建哈布斯堡王朝在德意志的统治地位，保证欧洲的新秩序，即封建复辟势力的统治。德意志各中小邦王公拼命维护自己的特权，反对统一。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更不希望他的西邻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德国。经过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梅特涅的策划，1815 年 5 月 16 日，维也纳会议签署了德意志联邦条例。

根据这个条例所建立的德意志联邦，是一个奇特的国家，是国家而又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它只是一个邦联。

德意志联邦是由 38 个拥有主权的邦和自由市组成，各邦都拥有主权，拥有自己的军队和驻外代表。联邦却没有真正的国家机构，没有政府，没有统一的军队，没有驻外代表，只有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成立一个联邦议会，各邦派大使参加，它的决议要各邦君主批准才能实施。

联邦的领土犬牙交错，国中有国，国中非

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邦所控制的领土，并没有完全加入德意志联邦，只是以前属于帝国的领土加入联邦。三个非德意志君主，英国国王代表汉诺威王国，丹麦国王代表霍尔斯坦公国，尼德兰国王代表卢森堡大公国，都是德意志联邦的成员国，有权派大使出席联邦议会，有投票权。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是德意志古老而闻名的城市。它是帝国自由市，德国著名诗人歌德的诞生地。德意志联邦议会在这里召开。议会由各邦代表组成，奥地利代表担任联邦议会主席。只有他有权在会上吸烟。条例规定，各邦权利平等，其实并不等。各邦在联邦议会里代表名额不同，各邦的地位也是各异，实际上是奥地利，或说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邦控制它。

德意志联邦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格雷斯在《莱茵信使报》上说，德意志联邦是一个干瘪可悲、不成体统、丑陋不堪的组织。这样的形容可谓一针见血！

国破山河在，德意志人民不可侮！从1815年起，德意志人民争取国家统一和自由的斗争就一浪高于一浪，从未停止。统一和自由成为法

国人民的历史重任，谁主沉浮？

二等乡绅

易北河经过德意志的勃兰登堡省缓缓向北流去！1815年4月1日，星期六下午，未来的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诞生在易北河以西八公里的申蒙森庄园里。这一天恰恰是莱比锡战役的前夕！

申蒙森庄园位于勃兰登堡省阿尔特马克巴，在易北河西岸，东岸则是阿尔特马克区的首府施滕达尔。俾斯麦家族在申蒙森庄园居住了500多年，1562年这个庄园成为俾斯麦家族的财产。他们世代为勃兰登堡君主服务，但没有特殊的功勋。1770年左右，奥古斯特·冯·俾斯麦拆掉了旧宅，新建了一座巴罗克式住宅，这是18世纪流行的建筑样式。1775年，奥托的祖父又建造了图书馆和音乐厅。申蒙森虽然还够不上一座封建大贵族的城堡，却也是一座坚固而高大的建筑，是一个封建的世家。

奥托·冯·俾斯麦在青年时代这样描写他的庄园：“我透过左手雪茄烟冒出的烟雾，从窗

户向北看，左右都是古老的菩提树，然后是花园，围以整齐的篱笆，有众多的石雕神像，黄杨树和矮果树，树后是一片麦田（可惜不是我的），再往后三英里在易北河畔高处则是小城阿尔尼堡……从南窗则看见坦格蒙德塔群，向东朦胧中看见施藤达尔大教堂。在门里，我看见三层楼的大房子，墙很厚，帷幔有皮制的，有竹布制的，绣有东方的花样和山景，家俱陈旧已俗不可耐，罩以褪色的丝绸。总之，设备表明比现在所有者从他的祖先所继承的要富裕得多。”

这是一幅中世纪的古老宏光贵族庄园的写照！

俾斯麦家族的主人，是德意志的典型的容克贵族。他们在庄园既是地主，又是警察和法官。但是他们不是勃兰登堡省的名门望族。俾斯麦家族历代要服军事义务，但军阶都不高。奥托的父亲斐迪南·冯·俾斯麦12岁进柏林武备学校学习，23岁转入预备役，只是上尉军衔，3年后退役。他没有参加过1806年耶拿战役和1813—1814年的解放战争。

日月穿梭，斗转星移！德意志古老的封建社会已经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经济破土而出。1807

年施泰因男爵颁布改革敕令，农奴制被废除了，农奴从此成为自由人。在改革的浪潮中，许多小容克贵族的庄园破产了，申森庄园由于斐迪南的惨淡经营而保存下来。

1816年，在奥托·冯·俾斯麦周岁时，斐迪南又在波美拉尼亚省继承克尼普霍夫庄园，占地2000英亩。它包括3个小庄园：克尼普霍夫、屈尔茨和雅克林。克尼普霍夫庄园距离波罗的海沿岸和施特丁都是45公里。这里土地贫瘠，但森林茂密，湖泊齐布，波罗的海的海风吹来，催人醉意。克尼普霍夫庄园只有一幢木结构房子，屋内并无装饰。它不像容克贵族的邸宅，倒象一家富裕农民的房屋。房前地势平坦，麦浪滚滚，一派田园风光。斐迪南告诉他的儿子奥托：“这都是我们的。”庄园里的农奴已经是自由人，他们都成为农业雇工，住在草房里，但并没有完全脱离农奴的依附地位。庄园里有石灰窑、铁匠铺、牧场，其产品要卖到市场上去。庄园已解脱了古老的封建关系，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世道在变，人也在变。启蒙思想游荡在德意志大地，理性代替了神学，平等自由代替了愚昧

落后。俾斯麦家族同样卷入这场思想解放的大潮里。奥托的祖父和父亲读卢梭的著作，成为启蒙思想的信徒。他们希望儿辈们成为一名贵族，但要抛弃贵族的偏见。他们政治上胸无大志，不愿为官，以农业为乐，乡居为荣。家里有丰富的藏书，教育孩子们要成为“受尊敬的人”，彼此成为朋友。封建的天然尊长，逐渐失去神圣的光彩，温情脉脉家庭关系日益代之以平等自由思想！这是时代的潮流，时代的呼唤，不管你出身如何！俾斯麦同样在这股大潮中徐缓前进！

奥托·冯·俾斯麦的母亲威廉明妮·曼肯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曼肯家族属于德意志的资产者，一百年从事律师和教授职业。威廉明妮的父亲路德维希·曼肯是弗里德里希大帝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内阁顾问，担任过驻斯德哥尔摩大使和枢密大臣。施泰因称他是一位为人正直，具有强烈自由思想的官员。路德维希·曼肯同施泰因一样是位改革家。他反对弗里德里希大帝的专制，要求限制国王的权力，推行责任内阁制。施泰因很器重他，称他是自由派。威廉明妮接受深厚的家庭教育，一切事务都要在理性面前决断。她同样用理性教育儿子们。

奥托曾说过：我从母亲奶汁中吸吮的是自由派的观点。

统一和自由的呼声

1815 年后的德意志联邦，是维也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黑云压城城欲摧，国内一片反动的局面。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德意志人民争取统一和自由斗争的意志是摧毁不了。昔日解放战争中的战士，今日的大学生们首先组织起来，进行斗争。1815 年 6 月 12 日，耶拿大学的大学生们，成立了德意志第一个大学生协会，他们的口号是：荣誉、自由、祖国，目的是统一国家和加强道德。他们的旗帜上配有黑、红、黄三个条子，中间是金色的 树枝。随后，吉森大学、海德堡大学、埃尔兰根大学，都成立了大学生协会，全国汇成青年学运的洪流！

在德意志联邦爱森巴赫附近的陡山上，有一座古老的城堡—瓦特堡 。马丁·路德就埋葬在这里。瓦特堡属于萨克—魏玛大公的治下。1817 年 10 月 17～19 日，全德国 12 所大学的几

百名学者在这里集会，纪念路德颁布95条论纲和莱比锡战役4周年。埃森巴赫的市政当局和市民热情地接待来自全德各地的大学生、瓦特堡骑士厅装饰上美丽的花环。10月19日早9时，大学生们在埃森巴赫市广场集合。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前边旗帜招展，伴随着乐队的乐曲向瓦特堡前进。瓦特堡纪念会庄严隆重，学生们发表振奋人心的演说，宣布这次来自德意志祖国和各族青年的目的，控诉过去的艰难生活，讲到德意志人民的理想和期望。学生们的发言都贯串着德意志爱国主义和争取民族统一的思想。他们宣布：所有的学生是一体，他们都属于单一的民族——德意志，德意志的生存、延续和光荣要靠它自己[illegible]

晚7时，大约600名学生手持火把，重新来到山顶，燃起篝火。山上歌声嘹亮，学生们再次发表演说。青年学生们群情激动，回忆起路德烧毁教皇敕令，他们把反对民族主义作家的书籍收集起来，连同袋装假发、卫兵的紧身搭、军棍一起投入篝火，全部烧毁。

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瓦特堡纪念节后，德国的学生运动迅速发展。1818年10月，

在耶拿成立了全德大学生协会，有14所大学的学生参加。

1819年，德意志联邦议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卡尔斯巴德决议，往各大学派政府特派员，监视教授和大学生的活动，检查报刊文章，迫害所谓的"蛊惑者"。

学生们热爱祖国，求统一，争自由的斗争是镇压不下去的。1820年10月18日，恰恰是莱比锡战役七周年。德意志的爱国学生们，冒着生命的危险，重新集合在萨克森王国境内的莱比锡战场上，吊唁为祖国解放而光荣牺牲的战士，表达青年们要求统一和自由的思想。19岁的大学生卡尔·奥古斯特·冯·哈舍（1800～1890）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表达了德国人民的心声。他说："我们要求恢复我们丧失的独立，德意志帝国必须恢复其正式名誉。精神倍增的、生机勃勃的和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必须再次居欧洲各族人民之首。"他提出德国人民的希望。他说："第一个梦想是：幸福和快乐不是人民的最高目的，最高目的是自由。第二个梦想是：人民的幸福和伟大只有依靠由他们亲自制定或由他们的代表制定的法律所确定的全体公民的最大可能性的

自由和平等。第三个梦想是：为了这样的法律和祖国而战斗的热情洋溢的人民是不能被征服的。”他说：“德意志人，我们是一个整体。这里没有萨克森人、巴伐利亚人；更不用说黑森人了。法兰克福人不必说，普鲁士人同样能够被征服；但是，从威塞尔到孚日山脉，从北海跨越阿尔卑斯山到喀尔巴阡山，那个优秀的人民通过语言、习惯和家世而一致，帝国的全体公民——兄弟般的统一的人民是无敌的。”

社会在前进，人类在进步，历史的潮流是任何人所无法阻挡的。1815 年建立的维也纳体系在 1836 年遭到重大打击。1830 年的法国七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的复辟势力，退出了神圣同盟。法国革命同样影响法国，德意志青年再度掀起统一和自由的高潮。

古老的汉巴哈宫庄严肃穆，位于哈尔特河畔诺伊斯塔特马克斯堡。1832 年 5 月 27—30 日，在路德维希·波尔恩和1819 年以来被禁止的大学生协会成员的领导下，30000 青年和市民在汉巴哈宫集会。他们打着黑红黄三色旗帜，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罗特克的大学生雅科布·齐本法伊弗尔在讲话中预言：“是的，一个共同

的德意志祖国站起来的日子终将会到来。”他高呼：自由统一的德国万岁！每个国家里愿砸烂自己身上的锁链并立誓和我们结成自由同盟的人民万岁！祖国、人民自由、各国人民团结万岁！

自由派报纸《德意志论坛报》编辑约翰·乔治·维尔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说：

“德意志，伟大、光荣、强盛的德意志，应居于欧洲各国社会的前列，但却被叛逆的贵族家庭所剥夺，她已被从欧洲的国家中除名，受到外国人的歧视。”最后他高呼：“万岁！为了德意志成为统一而自由的国家而高呼：万岁！为了联邦的共和的欧洲而欢呼！”

维尔特被捕了，其他讲演者逃亡国外，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被取消了！中央政治调查局到处侦查，迫害，反动派仿佛胜利了。不，维也特的声音是湮没不了的。

二十五瓶香槟酒赌注：25 年内德意志必然统一

波美拉尼亚是德意志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地区。威廉明妮不容许她的儿子留在这偏僻

的农村就学。1922年，奥托·冯·俾斯麦七岁的时候，被送进普鲁士首都柏林威廉街普拉曼学校学习。这是一所新式的学校，按照瑞士教育学家斐斯泰格奇（1746～1827）的教育思想办学，强调促进人的天赋的和谐发展。体操之父、伟大的德意志爱国主义者弗·路·雅恩（1778—1852）在这里任教。雅恩强调，每个人体格健康就能振奋国家、民族，人们经常锻炼就能训练智力，去从事更高级的活动。

奥托·冯·俾斯麦在普拉曼学习五年。他积极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学会游泳、击剑，在校内还耕作一小块土地。一年级的成绩单上写着：他性格开朗，热情奔放，受到大家喜爱。四年后学校的评语是：他应努力克服发脾气，无论是认真做作业，还是无节制的娱乐，在自己的生活中都应适当地注意。可俾斯麦自己的回忆录却说：在普拉曼学校学习我从中获得了德意志民族的印象。但是，这种印象只停留在理论思考阶段，还不足以根除生就的普鲁士—君主制的情感，我的历史同情心是在当局一边。俾斯麦的回忆录屡次谈到他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普拉曼学校五年应该是他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萌芽发端阶

段。

1827年，奥托·冯·俾斯麦转入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弗里德里希—威廉文科中学读书，1830年又进入灰色修道院文科中学。在这所学校学习期间，他住在教师波纳尔博士家中。他在灰色修道院文科中学读书期间，放荡不羁，不拘小节。早上睡懒觉，午后才兴奋起来，晚间则精神焕发。学校对他的评语是："性格粗暴，不尊敬师长。"他对希腊罗马史毫无兴趣。演数学题更是头痛万分。法语学得不错，喜欢清狂飚运动代表人物歌德和席勒的作品，对莎翁的著作兴趣更浓。尤其喜欢战争与和平的斗争史。1832年，正是歌德逝世的当年，奥托·冯·俾斯麦从文科中学毕业。

1832年，奥托·冯·俾斯麦进入格丁根大学。格丁根是一座坚固而漂亮的城市，带有明显的中世纪的特征。格丁根大学建于1737年，是德国浪漫主义先驱的诗人们集会的中心。俾斯麦进入格丁根大学时，年满17周岁，身高1.80米，身体修长，红色的金发披肩，很像莫特利小说《莫顿所希望的莫顿》中的人物拉本马克，因此人们又称他是奥托·冯·拉本马克。

这位德国容克的子弟，在格丁根大学里不拘小节，放荡不羁。他长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头发的颜色难以确定，介于红色和浅褐色之间。他身上穿着一件不象样的上衣，没有领子和扣子，没有明显的样式和颜色。还穿着肥得出奇的裤子，和带有铁后掌和大马刺的靴子。头发垂挂过耳，直到颈项。腰间佩带一把很长的剑。大学生们嘲笑他，他则毫不介意，要求进行决斗来回敬！他在格丁根大学读书时间，与人家决斗29次，只有一次受轻伤！

俾斯麦入学的那一年，适逢汉巴哈节。节日的歌声一直留在他的记忆中。他参加了汉诺威的大学生协会。他说："我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感情仍然很强烈，以至大学时代初期我就同以培养民族感情为宗旨的大学生协会发生了关系。"俾斯麦的政治思想有很大的发展。他说：我内心一直保留着民族情感，并相信，最近的将来，事态的发展将把我们引向德意志的统一。他又回忆说：我是在解放战争的意义上从一个普鲁士军官的立场来观察当时公众很少过问的外交政策的。一看地图，法国占领斯特拉斯堡，我就感到愤怒，而海德堡、施佩耶尔和普法尔茨的访问

勾起了我的复仇情绪和好战思想。他说过，我虽然没有成为一个共和主义者，但深信共和国是最为合乎理性的国家形式。当然，他的共和思想只是一时的闪念，而他对普鲁士君主制的感情却是根深蒂固的，他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却有长足的发展。在美国独立战争日，他同美国莫特利用 25 瓶香槟酒打赌：25 年内德意志必然统一。德意志统一比他的赌注晚 10 年，但毕竟在他的手中实现了。

1833 年，俾斯麦离开格丁根，转入柏林大学。1835 年他通过法律考试，在柏林当律师。他从此离开学生生活，步入德国分崩离析而在不断前进的社会！

新型容克

威廉明妮本想让奥托·冯·俾斯麦大学毕业后从事外交工作。可是他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乡村贵族，很难在外交界谋得一个称心的职业。1835 年，他考取了律师资格。开始他被分配到冯·布劳希奇法律事务所工作，4 个月后调到审理民事案件的市法院，负责办理离婚案件。俾斯

麦当律师是为了逃避兵役，他并不喜欢这个职业。他曾说过，我父母急于我去当军人，我拒绝不干，我居然胜利。俾斯麦虽然职位低微，但他毕竟是位容克，名字带“冯”。他根据父母的意愿，经常到王宫里去参加舞会。俾斯麦年轻体壮，舞步翩翩。他在舞会上第一次遇到了普鲁士亲王。亲王问他：“你为什么不当军人？”俾斯麦回答说：“殿下明见，我在军队里没有前途。”亲王说：“我怀疑你当律师是否有更好的前途?!”

1836年6月26日，奥托·冯·俾斯麦来到亚琛，在亚琛市官厅任职。亚琛在地图上标名是埃克斯·拉·夏佩尔，地处布鲁塞尔和莱茵河之间，是德国著名的矿泉疗养地。这里推行过拿破仑法典，深受法国的影响，1815年划为普鲁士管辖。亚琛区长是阿尔宁·博伊岑堡伯爵，出身于阿尔特马克区，是俾斯麦的同乡。阿尔宁伯爵，是个现代派，很有英国绅士风度。阿尔宁热情接待了这位小同乡，供以美食佳肴，并且为他计划了锦绣前程。先当律师，然后当法官，理想是外交官，至于先去圣彼得堡，还是先去里约热内卢，他认为并不重要。

奥托·冯·俾斯麦在亚琛接触到现代西方

的生活方式。他不重视本职工作，陪伴英国少妇骑马游玩，同许多英国人接触。他曾说过，同桌吃饭的有17名英国人，两名法国人，有克里兰公爵夫人，有罗素小组。他陪同公爵夫人去看歌剧。他读更多的西方著作，读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著作，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查理王五世》和《哈姆雷特》。

玩世不恭，不务正业。1837年他陪同情人旅游，未请假辞职回家。这期间，他曾在波茨坦地方当代理县长。1838年春进入近卫猎兵大队。1838年深秋，因母亲病请了长假。威廉明妮于1839年与世长辞。1839年夏，俾斯麦向波茨坦当局提出辞呈，回到克尼普霍夫庄园。

克尼普霍夫庄园已经没落了。家道中衰，父亲不善经营，女主人长期卧病在床。奥托和他的哥哥，花天酒地，挥霍无度。收入日减，债台高筑，以50%的利息举借高利贷，维持生计。在普鲁士，农业改革已经几十年了。克尼普霍夫庄园同样处于从封建庄园向资本主义大农场过度过程中。这里土地贫瘠，只有十几所草房，每所住四家农民。农民都是自由人，仍然极端贫困，月工资只有一个塔勒。每年还要给地主服许多

天的劳役，不给工资。地主仍握有司法权，还是本区教会的保持人。克尼普霍夫庄园并未脱离中世纪落后的局面，一派残破落后的景象！

俾斯麦决心回乡经营克尼普霍夫庄园。父亲给他哥哥写信说："奥托如此厌倦行政工作，以致他厌倦生活。如果他多作几年行政工作，他或许成为年俸两千塔勒的主席，但是没有这份福份。他恳求母亲另寻出路。他的理想是，我们应该开办一家糖厂，为此他前往马德堡学习炼糖业，然后回来管理克尼普霍夫事务。由于我看到他将得不到幸福而非常苦恼；同时由于在克尼普霍夫我看到你对农业非常有兴趣，并且我承认如果我留在柏林，我们大家必然一起没落，因此我决定把克尼普霍夫给予你们两人各自拥有，我靠申蒙森的收入已足够生活。"

奥托·冯·俾斯麦对回乡经营农业有浓厚的兴趣。他写给表姐的信中说："公务和作官与我无缘。我不想有志成为一名官员或朝臣。我似乎认为种谷和书写公文同样受尊敬，在某种情况下更有益。我更愿意发号施令，而不愿意服从。我讲不出什么理由，只能说我喜欢这样作。一个普鲁士官员很像乐队的一名演奏者，不论

他是第一把提琴手，还是三角乐器手，都是一样的。他都要随指挥演奏。”

回乡后，他同哥哥分家另居，在克尼普霍夫独立经营自己的庄园。奥托·冯·俾斯麦是位实干家。他经营农业就钻研农业科学。他用几个月的时间到德国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研究耕种学和土壤化学，阅读农业书籍，在埃尔登纳学院研究化学，得到一位博士的辅导。他的好朋友凯塞林伯爵知识渊博，把几本植物书送给他。德国的农奴解放几十年了，俾斯麦虽然还是容克，但已经不是古老的封建贵族了。据说他对庄园的农民很好。他千方百计提高庄园的产量，提高羊毛的价格。他经常到市场，听他们讨价还价，用心地听，仔细地考虑。夜间盘算，是施肥、播种还是打麦子。他用心经营，精打细算，收支帐目清晰。骑马在地里巡行，发号施令，监督农民劳动。他晓得田地收入，预知天气预报，了解农民、粮商和市场行情。他记性超众，背诵100多条农业谚语。

他从市镇农业协会借阅许多书籍。他秉烛夜读，孜孜不倦。一面喝香槟掺苏打酒，一面读书。他喜欢读历史书，也喜欢读政论著作。他读

英国历史，研究英国政治活动家罗伯特·皮尔（1788～1850）用什么方法把托利党变成保守党。他阅读英国感伤主义代表人物劳伦斯·斯特恩的《特里斯特拉姆·香代》和英国著作家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他很喜欢莎士比亚、拜伦·尼古拉斯·雷瑙的著作。他也喜爱读社会学，读路易·勃朗的著作。他阅读黑格尔的哲学，读大卫·施特劳斯批评圣经神学的著作。他说："我的全部知识都是在这段无所事事的时间里获得的。那时我在乡间有一间藏书室，藏有各种思想和行为的书，那时我简直把书吞在肚子里。"

他在克尼普霍夫经营农业9年。他说："经验使我承认，经营农业是过田园生活。他骑马打猎，坐马车串亲访友，到市场上出卖农产品。坐小船打野鸭。荡舟河上，一边喝酒，一边读拜伦的著作。何其悠哉闲哉！他已经不是一个封建的老地主，而是一位善于经营，懂得现代农业，有着各方面的广泛知识的新型容克，即资本主义化了的容克。他经营克尼普霍夫9年，庄园产量提高1/3。

但，他毕竟还是个容克。他无拘无束横行乡

里，驾车奔驰，摔下车来，清醒过来再跑。同朋友开玩笑，毫无节制。坐在床上打靶，在泥泞的道路上酒后乱跑。大吃大喝，酗酒无度，一口气喝一大瓶酒，食量甚大。因此人们叫他为“疯狂的容克”。政治上，他更是一位真正的容克。波罗的海一家自由派报纸著文揭露波美拉尼亚贵族骑英国马，带着猎狗，外出打猎，践踏农田，农民只有反抗一法。俾斯麦写文章，进行反驳，说冬季骑马打猎，并不损害种子，而且有利于马匹的饲养，况且马是德国种，只有马鞍子是英国货。他指出，许多更坏的坏人，他们不仅从英国输入马鞍子，而且输入刮胡子的肥皂、内衣、腐乳。他指出，发牢骚的作者无实在的理由，只是从个人考虑。他说：“我很明白，当穿红衣服的人们骑马打猎，带着猎狗去追逐野兔时，极其快乐，享受其猎物，不仅是被追逐的兔子不满意这种景象，那此身穿黑衣服、无马骑、无猎狗、无打猎机会的人们也不满意。”他承认：他“出身于贵族门弟，他的最大特权是在他的名前加个‘冯’字，很像比朦胧时代活得更长的鬼影，使哀伤的日耳曼看不见资产阶级和社会平等的太阳升起。”最后他要求：“把远波美拉尼亚应享有

的和个人的权利，留给波美拉尼亚，使这个地方的人愿意怎样花钱游戏就怎样花。”这是1843年，年满28岁的奥托·冯·俾斯麦的立场！

国外旅游，开阔视野

克尼普霍夫庄园面貌有所改观，但波美拉尼亚的天地过于狭小了；德意志虽然有所进步，但同英法西方国家比较，又过于愚昧而落后了。西渡英伦，看看新世纪，成了德国青年的向往。

1842年，年满27岁的奥托·冯·俾斯麦，渡过加莱海峡，到英国旅游。他离开波美拉尼亚，前往汉堡，乘船去英国的赫尔港，7月10日到达。他看到从文字著作中了解的国度，心情十分舒畅。可是这位土里土气的疯容克，漫步赫尔街道，兴致所至，吹起口哨来，扰乱英国居民星期天的宁静生活，因而受到斥责。一气之下，他改船去爱丁堡，在这里他又破坏了加尔文教的教规。他途经利兹，约克大教堂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来到曼彻斯特，1842年这里正是宪章运动的中心。他看到英国三四里长的铁路隧道，兴趣颇浓。他更喜欢英国的田野山川，小块耕地

和树篱笆。最后他到达英国首都伦敦，住了几个星期。他到英国贵族院参观，看到英国贵族议员都是骑马而不是坐马车等候在贵族院门前，得到深刻的印象。他考察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与自己有关的各种事务、社会风俗。英国人好骑快马，礼貌待客，远远超出他的意料之外。他从伦敦去朴茨茅斯，再从布赖顿渡海，到第厄普，在巴黎和瑞士住了一段时期，10月第二周回到家里。

俾斯麦还准备去亚洲旅游。他同好友阿尔宁商定，要去埃及和叙利亚。他甚至说，几年内将成为一个亚洲人，以改变我这喜剧的背景，这样我将在恒河边，而不是在里加抽我的雪茄烟。他父亲写信给他说，他现在已经是个孤独的老人，死期将近，要见儿子。书信满纸泪痕。同时阿尔宁正要同他妹妹玛尔涅结婚，因此，他们亚洲之行没有成为现实。

他再不想过宁静的农村生活。国外旅游开阔了眼界。克尼普霍夫的生活已经满足不了他要走向更广阔的世界。1845年满30岁的俾斯麦写道："最后我孤身住在乡间，我再不能容忍一个乡间地主的生活。我在盘算，或者进入国家服

务，或者去远游。我孤身一个在这里，真想悬梁自尽。我相信，每个有教养的未婚男子都会有同样痛苦的。”他还说：“整天算帐，整天在太阳底下骑马和步行，人生忙得像魔术表演。”他还说：“从那时起，我已在这里生根。感觉迟钝，历历行事，毫无趣味，力求按自己的方式达到舒适；近日来，当我看到他们如何欺骗我时，不再发脾气！早上我不兴高，早餐后感觉好些。陪伴我的是狗、马和小乡绅。我比后者优长之处是，我能读书，衣着时尚，能杀野兽和鸟类。像杀猪杀羊一样。我胆大善骑，能抽烈性雪茄烟，喝烈性酒，他们都醉倒在桌子底下，我却不醉。”

他脱离孤独生活，广泛交游。同莫里茨·冯·布兰肯堡结成莫逆之交，终身至友。他认识了莫里茨的表兄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昂校。罗昂是总参谋部的军官。他们成了终生战友，后来俾斯麦任首相，罗昂是主要支持者，俾斯麦统一德国他又是主要合作者。

第二章　忠实的保王党

克尼普霍夫野人

1847年，对德意志和欧洲其他国家来说，是灾难深重的年头。1845年，马铃薯和其他农作物都得了枯萎病，大面积歉收。马铃薯是老百姓的主要食品，饿殍遍野。粮价上涨，粮商囤积居奇，农民流离失所。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849年从英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像瘟疫一样，传到德国。光纺织业1847年的产值就下降41%。铁路股票原先利润最高，可股价突然下跌，铁路公司倒闭，大批股民破产。1847年光汉堡就有125家商店关门倒闭。老百姓确实活不下去了。他们铤而走险。1847年4月21日，饥饿的群众抢劫市场和商店，历史上叫马铃薯暴动，同军警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上层的危机同样加深了。1840年即位的普鲁士国弗·威廉四世，生于1795年，在解放战争中长大，具有德意志爱国主义思想。他即位后采取一些自由主义措施，为达尔曼等被迫害的"七君子"恢复名誉，取消书刊检查制，释放政治犯。但他毕竟是个专制君主，并未去兑现他父亲许下的颁布宪法的诺言。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他向银行家罗思柴尔德借钱，竟然遭到拒绝。1847年4月11日，他在柏林王宫的白厅召开联合省议会。国王宣读开幕词，拒绝颁布宪法，强调臣民对他要宣誓效忠！

德意志各阶级、阶层、各党派都非常活跃，他们召开会议，制订纲领、发表宣言，表明对即将来临的革命的态度。已厌倦农村生活的奥托·冯·俾斯麦，成为容克贵族阶级的忠实代言，初露锋芒，卷入到德国风雨般的政治旋涡。有个历史学家把俾斯麦比作一匹骏马，听到外面马嘶叫声就要出猎。1847年初，他再次担任官方职务，任河堤官，负责管理易北河河堤。1849年联合省议会召开的消息传出后，俾斯麦认为时机已到，要争取一个议席。他离开波美拉尼亚，在马德堡骑士协会的会议上谋得一份工作，但

只是获得候补代表的资格。他提出抗议，说有一位男爵刚刚当上省长，不应再当代表。他的话无人理睬，前辈们耸耸肩膀说：那你为什么要离开波美拉尼亚呢？他回答说："我最想当一名议会代表。"恰好，一位柏林的萨克森骑士冯·布劳希奇有病。俾斯麦从中做了手脚，朋友们劝他辞了职。俾斯麦顶替他成了联合省议会的正式代表。会议的最后六个星期，俾斯麦才来到柏林，坐到联合省议会的议席上。

1847 年 5 月 17 日，在联合省议会第四次会议上，俾斯麦发表了第一次演说。与会者描写他说："他是一位 30 开外的人物，高高的身材，魁伟健壮，双肩宽阔，头脑高扬，面部虽有修饰，但表情特别，激动而活泼，坚定而不呆滞。他脸色红润，光彩夺目，红胡子，浑身是气力和健康。脸的半部肥胖，诱人的微笑。他的鼻子不好看，高耸的眉毛、两眼明晰、机警、奸狡。他的前额端正、宽阔，可谓天庭饱满，地角方圆。他初给人的印象是乐于享受，但却是一位有知识、有信心、精力充沛的人物。"

一位参加过反拿破仑战争的自由派人士发言说：普鲁士人在 1813 年之所以同法国人打

仗，并不是因为他们仇恨征服者，因为这样高尚的民族不知道什么是民族仇恨。当时的情况比现在更好，因为当时政府依靠人民。人民只是因为国王答应他们在祖国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以后给他们一部宪法。

俾斯麦听到后怒不可遏，立即上台进行反驳。他说：要去寻找1813年人民运动的其他理由，或者找到其他动机，都是滑稽可笑的，而是由于敌人出现在我们国土上对我们进行污辱。我认为，任何一个人主张这种恶劣待遇不足以重生人民热血沸腾。不足以对外国侵略者的民族仇恨压过一切其他的情感，都是对民族荣誉的污辱。

俾斯麦的发言引起一片反对声！许多人表示不同意见，会场陷入一片混乱。有人反驳说：激发人民行动的不是仇恨，而是爱国。俾斯麦年纪太轻，不知道这件事，俾斯麦重新登上讲台！会场立即骚动起来，议长要求安静。喧叫声四起，俾斯麦随手从兜里拿出一张报纸，站在讲台上阅读，直到恢复秩序，他再次发言说，诚然，解放战争时他尚未出世，但他一向惋惜他尚未出世，今天听到他们的讲话就不再惋惜了，因为

据他们说，普鲁士之所以遭受奴役，不是由于外国人，而是国内的产物。

俾斯麦的演说遭到一片非难声。一位朋友对他说："（你）这样一位有才能的人把自己变成如此可笑。"一位得过铁十字勋章的亲戚说："当然你完全正确，但你不应说这类事情。"布兰肯堡评论说："在这里吮血的狮子不久将用不同腔调怒吼了！"年轻的历史学家济贝尔在报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和自由不能用这样的区别把它们互相分离开来。第二天他自己写信给未婚妻约翰娜说："昨晚我引起了一场空前未有的不满浪潮，因为我谈到1813年人民运动的性质，伤害了自己阵营中许多人被误解了的虚荣心，当然也促进反对派都起来反对我。愤怒的情绪是很强烈的，也许正是因为我道出了真情。人们骂我还年轻和其他的话。"

一夜之间，奥托·冯·俾斯麦声名狼藉。克尼普霍夫的野人一下子变成柏林联合省议会的野人！他给约翰娜的信中说："我捅了志愿兵的马蜂窝，愤怒的马蜂围着我嗡嗡直叫！"

在联合省议会的辩论中，俾斯麦同自由派代表人物格奥尔格·冯·芬克针锋相对。他是

普鲁士政府的坚定支持者。他在回忆录中说，东普鲁士代表索肯·塔尔普琴、阿尔弗里德·奥尔斯瓦德的演说，贝凯拉特的富于感情，海特和梅维森的莱茵的法兰西的自由主义，芬克演说的粗野狂暴，都令我十分反感，即使现在我读这些辩论材料，也给我一种不适当的陈词滥调的印象。他同芬克的辩论达到如此激烈的程度，人们给他起个绰号叫"芬克的折磨者"。保守的势力，各邦王公的代表，则非常赞扬他。里森大公的公使在6月6日写道："在少数支持政府观点、代表国王意志的发言人中间，有一位叫俾斯麦的人表现突出。人们预言他在今后的会议上极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在辩论中，他以他那种强有力的、坚定的态度猛烈攻击冯·芬克先生等人，直接向他挑战，但最后还是冷静占了上风。"

俾斯麦的保王党立场太露骨了，以致在公开场合，连国王都不敢亲近他。他经常出入宫廷，国王，甚是太子妃都竭力回避他。他说，我的保守主义狂想的程度已经超过国王为自己划定的界限。可是，他毕竟是真正的保守党。国王在私下屡次召见他，十分亲切，谈话涉及政治及

各个方面，对他在议会中的发言和立场表示赞扬和鼓励。他确是忠心保主。他给约翰娜信中都这样说："谈到国王不要漫不经心，我们两人都犯这种错误。我们不该说对父母无礼的话，更不该说对国王不敬的话。即使国王做错了什么事，我们也要牢记，我们曾经宣誓效忠于他，要遵从他的王育。"

在联合省议会的辩论中，奥托·冯·俾斯麦成为极右翼的一员干将。在辩论犹太人问题时，反对派左翼要求人人平等。俾斯麦发表演说，反对这种令人讨厌的人道主义空谈。他说："我不是犹太人的敌人，假如他们敌视，我原谅他们。在任何环境下我都爱他们。就我来说，我同意给他们所有权利，除了在基督教国家掌握官吏的权利以外。"他说："我认为，上帝恩惠的话不是空谈，但是我只能把它作为上帝的旨意，默示在福音书里。如果我们取消国家的宗教基础，国家就变成了一种偶然的权利集合，变成反对一切人、反对一切战争的屏障。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例如，我还不清楚如何去反驳共产主义者们关于财产乱伦的思想。因此，我们不应该侵犯人民的基督教。"

在德国革命即将来临的时候，俾斯麦站出来，公开为王权辩护。对于普鲁士王朝来说，真是难得的人才。国王弗·威廉四世赏识他，国王近臣重视他。掌握大权的盖拉赫兄弟，列奥波德和路易，一位是军长，一位是主席，都非常喜欢他。从此，他成为君侧党的一员！

孤身勤王

同英法两个西欧国家相比，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姗姗来迟。1848 年 3 月，德国的革命终于来临了。革命风暴风满楼，德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都卷入这场风暴里。可是同英法两国相比，德国是在资本主义更加成熟的条件下革命来临的。客观环境不同，国情各异。德国新生资产阶级要求政权，而共产主义幽灵又在欧洲游荡。所以德国革命走了自己的路，王冠并未落地，只是在人民革命面前暂时低头，时机一到又反扑过来，许多革命人民却人头落地了。

1848 年 3 月 6 日，大批革命青年在柏林动物园饭馆前的帐蓬里集会。第二天，他们以柏林市民的名义发表请愿书，要求政治自由，实行大

赦，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行人民代议制，召开联合省议会，废除高利贷和资本家对人民的压迫。柏林市政府不允许他们把请愿书呈递国王。3月9日，青年再次集会，与会人数达4000人，决定向国王递交请愿书，又被拒绝。同时，柏林市参议会也向国王呈递请愿书，要求政治自由，召开联合省议会。

以列·冯·盖拉赫为首的军人集团主张对人民革命运动进行镇压。从3月7日起，柏林街头已警戒森严。军队的刀光剑影，阴森恐怖。革命洪流滚滚向前，势不可挡。3月13日晚，两万多人在动物园集会，会上散发致国王的请愿书。会议正在平静地进行，突然遭到军队的攻击。人们冲出动物园，途中骑兵队向他们袭击来，一人被打死，许多人受伤。柏林工人们树起街垒，夺取了武器。3月14日，人民不顾当局禁令，在王宫广场集会。警察前来驱赶，人民用石头瓦块还击。15和16两天，人民同军警的冲突继续发展，仅16日就有20人死亡，150人负伤。

在人民革命面前，国王动摇了。弗·威廉四世在14日宣布，4月27日召开联合省议会。3

月15日，维也纳革命的消息传来了，梅特涅逃跑的消息更是大快人心。3月17日，柏林人在大街小巷集会，向国王提交请愿书。他们要求：1、军队撤出柏林；2、组织市民自卫团；3、保证无条件的出版自由；4、召开联合省议会。会议决定第二天在王宫广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国王接见他们的代表团。同一天，以莱茵省省长和科信市长为首的12人代表团到达柏林，向国王呈递请愿书，表示如不进行改革，将脱离普鲁士。

3月18日清晨，普王弗·威廉四世接见了两个代表团。他当场宣布两道命令：取消书刊检查制度，4月2日召开联合省议会。同时宣布，建立以普鲁士为首的联合省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广大群众集合在王宫广场，等候消息。当日中午，正式向群众公布了国王的两道命令。人们并未满足。他们高呼："士兵们滚开，撤走军队！"盖拉赫为首的军人集团下令肃清王宫广场，龙骑兵冲过来了，步兵也前来驱赶群众，步兵开了两枪。这是火上浇油，一场革命开始了。请看一位目击者对3月18日革命的记述。

时方2点3刻钟。一片混乱的喊叫声从选

帝侯桥那里传来。成群的人经御街逃去，市民们过来了，被吓得惊惶失措，浑身发抖，面色苍白，喘不过气来。他们喊着方才有人在宫殿前的广场上向我们开枪。狂怒和报仇的呼声响遍了御街，响遍了整个城市。全城咆哮起来，犹如地裂，铺石路被拆走了，兵器店被抢光，住宅受到威胁，钺斧被拿走了。顷刻，在御街筑起了十二道街垒，用出租车辆，用运客车辆，用羊毛袋，用木栅，用翻倒了的井亭架牢固地、合格地、模范地建筑起来的街垒，一户一户地翻开了屋顶，屋顶上，手里拿着砖头瓦块的人们站在令人看了发晕的边缘，监视着士兵到来。被威胁的刀剑匠把他们的兵器都扔出门外去；所有的人都用粪耙，用刀剑，用长矛，用长枪，用厚木板武装起来了；男孩子们挤进住宅，用大篮子装石头往屋顶上运。有人还想进攻市法院大楼，以便夺取从窗口往外投掷的据点；因为有许多从王储那里来的贵族用粉笔在市法院的房子上写着："市民的财产"——人们便退回去。那些债务犯即所谓"牡牛头"的居民被赦放出来，企图夺取仓库和军事学校的步哨的尝试失败了。这时从亚历山大广场上开来了一支引人注目的队伍。前面是

一个年轻的骑兵，显然是个波兰人，带着一顶波兰便帽，手里还拿着一把剑，他喊着：自由万岁！随后是一个鼓手，再后面是好多个拿着红色和黄色旗子的旗手，最后面约有二百人拿着剑、大砍刀、铲子、手枪、斧头、粪耙，把旗子（多数是红色的）插在街垒上，大家就掩蔽在这些街垒的后面，在窗子旁边，在屋顶上布置了拿着石头的人。那边传来了消息，据说整个城市都给街垒堵起来了，它就像一个人一样站起来了。从4点钟到5点钟之间从选帝侯桥向御街射来第一批霰弹；这些霰弹并不能摧毁街垒。炮声一响跟着一响；街垒震动着，被炸烂的尸体倒在街角上。5、6点钟开来了步兵尖兵。有人从窗口向他们射击，有人从屋顶上向他们投石块。一场可怕的屠杀开始了；士兵逐一夺取了向外射击和投掷石块的房屋，许多人牺牲了，其中有少数是士兵。而一次严重的反抗打击着他们，特别是从旅馆房间里来的射击。士兵们冲进了房间；他们站在房间的窗旁，把枪对准向外投掷的屋顶，后来他们到屋顶上去，才把众人赶下去。到7点钟的时候，御街在大屠杀中被占领了。……警钟鸣起来。……到9点时我试着回家去，在斯潘道街我

看到了巨大的街垒，我发现这条圣洁的小巷已经被遮断了，我只好爬过去。当我看到那种可怕的景象时，我几乎刚踏进城垒街。在弗里德里希桥上空霰弹和炮弹块从上面掠过，拿着旗帜的人们和逃走的受伤者朝我走过来。我于是急忙跑回来；士兵们正在御街露营。

3 月 19 日清晨，普王弗·威廉四世发表《致我心爱的柏林同胞书》，要求柏林居民们拆除尚存的街垒，保证把军队从所有街道和广场撤走。人们的回答是："在士兵撤走之前，我们宁可不拆除街垒。"当天上午，军队从柏林市内撤往波茨坦。国王开始由于王后有病，后来由于王宫已被包围而留在王宫里。群众从四面八方涌进王宫院内。他们手持武器，抬着死难烈士的尸体，经过王宫庭院。国王弗·威廉四世和王后不得不走上阳台，向死难烈士的遗体低头致哀！

3 月 21 日，普王弗·威廉四世发表《告我国人民和德意志同胞书》，宣布他要承担德国统一的事业，把普鲁士溶解于德意志，宣誓忠于黑红黄三色旗帜，实行出版自由和陪审制，取消领主法庭。当天，国王穿上袖头配有三色绶带的礼服，出现在柏林街道上，参加游行，在讲话中表

示信仰德意志爱国主义。

1848年3月19日，恰值星期日，奥托·冯·俾斯麦，正坐在申豪森以南30公里卡罗尔·冯·瓦藤斯累本伯爵的客厅里，讨论政治局势。突然，一辆四轮马车来到伯爵门前，几位太太坐车逃来。她们神色慌张，满脸风尘，告诉俾斯麦和在座朋友：柏林发生了革命，她们是从柏林逃出来的，国王被群众所囚禁。俾斯麦听后深感不安，马上赶回申豪森庄园。他是以国王的忠实捍卫者，反动分子臭名在外，愤怒的群众不杀他杀谁!?他要保护自己的家庭，保护自己的产业，坚决反对红党。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解救国王。

3月20日，一位坦格明德城市代表来到申豪森庄园，要求在钟楼上悬挂黑红黄三色旗，否则他就要带增援队伍来。俾斯麦命令本庄园农民把城市代表赶走，本庄农民和妇女盲目地服从了这项命令。他还让农民把一面有黑色铁十字图案的旗帜挂到教堂的钟楼上。他和本庄农民收集武器，他自己有20支枪，农民有猎枪50支，派人到叶里雷夫和拉特诺夫取火药。俾斯麦在夫人陪同下，到邻村去煽动农民，前往柏林，保卫国王。他的一位邻居是自由派，谴责他到处

煽风点火。警告他说，如果农民真的去柏林解救国王，他就要进行干涉，甚至是采取镇压措施。俾斯麦说："您知道我是不爱生事的人，不过您要那样干，我就要对您开枪。"

邻居说："您不会这样干。"俾斯麦说："我说的是老实话。您知道，我是守信用的，您还是不要这样干。"

俾斯麦煽动农民未成，他却孤身进城勤王。他随身携带一支手枪，四盘子弹，动身去波茨坦。在火车站他遇到内务大臣冯·包德尔斯文格。这位大臣不敢同俾斯麦谈话。俾斯麦向他致意，他用法语说："不要同我说话"俾斯麦说："我们那里农民动起来了。"包问："为了国王吗？"俾斯麦回答说："是的。"包说："这个踩钢丝的人。"

俾斯麦首先访问了他的老朋友罗昂·冯·默伦道夫将军、冯·普减普利特维茨将军。普利特维茨对他说："您不必给我们派农民来，我们不需要，士兵足够了！最好给我们送些马铃薯和粮食来，可能的还送些钱来。因为我不知道士兵的粮饷是否能得到充足的供应。如果援军来了，我会接到从柏林来的命令，一定率领队伍，把他

们打退。”俾斯麦要求：“请把国王救出来！”普回答说：“这不会有大的困难，我有足够的力量进攻柏林，可是这意味着我们得打仗，国王既然已经下令让我们接受战败者的角色，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没有命令，我不能进攻。”

俾斯麦绝望了！国王已不能发号施令，他决定去找王太子普鲁士威廉亲王。可是威廉亲王已逃离柏林，躲在科安孔雀岛。王妃奥古斯塔正在酝酿让王太子继承王位，已同自由党领袖芬克谈过这件事。3 月 23 日，俾斯麦去见王妃，在波茨坦宫一个侍从室里受到接见，王妃非常激动。他对俾斯麦说，她的职责是保护他儿子的权利。她认为，国王和他的丈夫都不能保证这个权利了。他的计划是，在他儿子未成年时由她摄政。俾斯麦不赞成这个计划，在第二次联合省议会期间，王妃通过芬克正式向俾斯麦提出这个建议。俾斯麦宣布说，他反对这个提案，并且要弹劾这个提案者，定他们大逆不道之罪。

他在波茨坦会见了弗·卡尔亲王。他向卡尔亲王指出，使王室同军队保持联系该多么重要。国王现在身不由己，即使没有他的命令，也要采取行动，即命令军长带领军队进入柏林。卡

尔亲王听完后非常激动，回答说，他虽然很赞成他的想法，但实现不了这个设想。他也曾劝说带兵的军长，被拒绝了。

俾斯麦在波茨坦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卡尔亲王给他写了一封信，作为他晋见国王的证书和通行证。内容如下：

“呈信者——我的熟人——受托亲自向我至尊兄长陛下恭请圣安，并为我带回信息：因何缘故，我多次亲笔询问‘我是否可往柏林’一事，经过 30 小时尚未答复。

卡尔，普鲁士亲王

波茨坦，1848 年 2 月 21 日下午 1 时。”

俾斯麦带着这封信，刮掉胡须，带一顶宽边帽，穿上礼服，前往柏林，请求市民自卫队，允许他进宫晋见国王，被拒绝了。他给国王写了个奏折说：“革命只限于大城市，国王只要离开柏林，在农村仍然是君主。”他把信交给鲍古斯塔夫·拉德维奇尔公爵，请他带给国王。但没有得到国王的答复！

柏林革命人民已经发觉了俾斯麦的行径。他在街上行走时，有位陌生人对他说，“有人跟踪您，您知道吗？”在菩提树大街上也有人警告

他："请您赶快离开，不然要逮捕您。"俾斯麦问道："您认识我吗？"那人回答说"是的，您是冯·俾斯麦先生。"

在柏林混不下去了，涉及身家性命。他返回波茨坦，同默伦道夫和普利特维茨讨论采取主动行动的可能性。普说："应该怎样着手呢？"默伦道夫要求俾斯麦："愿您能够给我们安排这件事。"俾斯麦回答说："我不能，但是没有命令您就这样干，您究竟会蒙受什么？国家会感谢您，国王到最后也会感谢您。"普说："您能向我们保证弗兰格尔和赫尔曼会一起干吗！我们不能把不服从命令和纠纷带到军队来。"俾斯麦派亲信去斯德丁，征求弗兰格尔将军的意见。弗兰格尔回答说："普利特维茨怎么办，他就怎么办。"俾斯麦亲自跑到马德堡去，晋见冯·赫尔曼将军。他只见到将军的副官，他说明来意。不久，这位副官到旅馆告诉他，要立即离开，以避免让他不愉快和使将军处于荒唐可笑的境地，将军准备把俾斯麦作为叛徒加以逮捕。

俾斯麦只好回到申豪森！但他野心不死！3月25日，他带申豪森和其他庄园的代表到波茨坦，企图再见普利特维茨将军，进而会见普鲁士

亲王。他们在波茨坦火车站正遇到国王到达，听到国王正在波茨坦大理石厅对军官们讲话："我从来没有过比在我的公民的保护之下更加自由和安全了！"

俾斯麦带着痛苦的心情回到了申豪森。他说："军官们听到这句话响起一阵喃喃的埋怨声和剑鞘的撞击声。这种声音是普鲁士国王从未在自己的军官当中听到过的，并且希望永远不再听到了。我很伤心，只得回加蒙森去！"

宫廷党的一员

1848 年 3 月 29 日，普鲁士国王弗·威廉四世任命莱茵省资产者康普浩森组阁，任内阁首相，莱茵银行家汉泽曼任财政大臣。海因利希·阿尔宁任外交大臣，阿尔弗雷德·奥斯瓦尔德任内务大臣，马克西米连·施韦林任文化大臣。除了康普浩森和汉泽曼外，内阁成员大多数都是普鲁士旧官吏。

4 月 2 日，康普浩森内阁召开联合省议会。年满 33 岁的俾斯麦又来柏林出席会议。会议任务是筹备普鲁士国民议会的选举工作。会议讨

论致普王弗·威廉四世的呼吁书，并向国王致谢。俾斯麦十分活跃，登台发言。他说：

“我是对请愿书将投反对票的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我要求发言只是为了说明投反对票的理由，并且向你们声明，就请愿书是一项未来的纲领而言，不多说我接受它。不过，唯一的原因是我没有其他办法。我这样做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为环境所迫；因为6个月以来我的观点并没有改变。我认为，唯一能够把我们从目前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引导到一个有秩序、有法制的状态的机构是内阁，出于这个原因我尽可能处处向内阁贡献我微薄的支持力量。但是促使我反对请愿书的是表明对近日发生的事态的欢欣和感谢。过去的事情已经被埋葬了。我比你们许多人更为痛心和惋惜的是，在王冠自己投入棺木埋入土中以后，任何人间的力量都不能使它起死回生。但是既然我为环境的压力所迫承认了这种事情，就不能够用谎言来辞别我在联合省议会中的活动，即对我至少必须认为是一条错误道路的事情表示感谢和欣喜。如果在现今业已采取的新道路上真正能够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德意志祖国，达到一种幸福的或者即使是只

靠法治的有秩序的社会状况，那么，这时我才会向新秩序的奠基人表示谢意，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

俾斯麦发言十分激动，泪流满面，中止发言，走下讲台。在讨论选举法时，他提出许多修改意见，删去赞扬三月革命的话，他才满意。联合省议会结束后，他又回到申蒙森。

三月革命后，德国境内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十分激烈，在革命斗争洪流中，大浪淘沙，各阶级各党派的阵线逐渐分明。1848 年 4 月 2 日，柏林的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反对三级选举制，要求直接的选举权而举行强大的示威游行，康普浩森内阁戒备森严，使 4 月 5 日示威游行以失败而告终。

5 月 22 日，普鲁士国民议会开幕，俾斯麦的立场反动，根本没有被选进国民议会的可能性。普鲁士国民议会开会第四周，保守派创办了《新普鲁士报》，封面画有黑色铁十字，故名《十字报》，发行人是瓦格纳。俾斯麦是这家报纸的经常撰稿人。三月革命后，名义上政府是康普浩森——汉泽曼内阁，但是内阁之上还有内阁，即在国王宫廷里还有一个秘密内阁。他们的成员

有：保守派列奥波德·冯·盖拉赫、曼推菲尔将军、劳赫将军、宫内大臣科列尔、冯·马索夫等，其中也包括冯·俾斯麦。列·盖拉赫是总参谋长。他们都是极端保守派，目的在于在军队支持下，在普鲁士恢复专制制度。他们反对德意志统一，反对制定宪法，认为召开立宪会议是危险的途径。他们喜欢用西班牙语“宫廷党”一词。路德维希·冯·盖拉赫认为俾斯麦是“我们宫廷党党部中一个十分精明能干的副官”。

1848年6月4日，逃亡英国的普鲁士亲王回国了，这又加强了国内反革命的势力。小城维尔泽茨选他为普鲁士国民议会代表。6月8日，亲王在国民议会发表演说，高呼“国王万岁，祖国万岁！”气焰十分嚣张。亲王在归国途中，在根廷车站遇到了俾斯麦。他同俾斯麦握手说：“我听说你积极为我而努力活动，我将永世不忘！”亲王请俾斯麦到巴贝尔斯贝格宫会见。俾斯麦向亲王汇报了三月革命的情况。他向亲王朗颂了一首诗，表现了亲王从柏林撤退时的情景：

这是些普鲁士人，黑色的和白色的，
旌旗又一次在前面飘扬，

这是国王的忠实臣民在为国王捐驱，
为了国王，他们前赴后继，一片欢声。
即使看到牺牲者被不断抬走，
我们也毫不畏缩，
这时一声呼喊刺破了忠诚的心，
“我们不再是普鲁士人，应是德意志人。”
我们怀着爱戴之情向王座靠近，
仍然信任和充满信心，
这时国王向我们表明人们怎样报答忠诚的人。
他再也不听我们这些普鲁士人的呼声。
纽带松了，
我们的祖国在忍受痛苦！
自从他摈斥了他的忠实臣民以来，
我们的心碎了，他的支柱裂了。

当暴风雨在他高贵的头上呼啸之时，
正是愚民愤怒地向他诅咒和责难之日，
他们现时在我们胜利的战场上大肆破

坏，

正是军队的英勇保卫您国王。

他们挺立而不颤抖，

为他们的主人，为他们的国王，

而流血牺牲，

他们的死是甜蜜的，他们的荣誉是纯洁的。

在您的英勇的忠诚的战士倒下的地方，

神圣的祖国，审视这种丑行吧，

人民看到愚民的卑鄙的大批屠杀，

手握手地围住了那个国王。

那时他们重新发誓，

啊！爱戴和忠诚。

虚伪是他们的誓言，

而他们的自由是借口，

我们幸运的是他们不愿再作普鲁士人。

黑红黄三色旗帜在阳光下闪烁，

受到亵渎的黑鹰低头忧伤；

在这里结束了，索伦家族，您的光荣历史，

在这里倒下了一个国王，但不是在斗争中。

我们不再愿意看到

已经陨落的星辰。

您这里所做的，君主，您将悔恨不已，

没有人会象普鲁士人那样忠诚。

这是反动的诗篇，

普鲁士亲王听到失声痛哭！

6 月 23 日，奥托·冯·俾斯麦受弗·威廉四世国王的邀请，到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莫愁宫参加宴会。赴宴人很少，只有康普浩森和俾斯麦，以及男女陪客。餐后，俾斯麦陪同国王在平台上的树篱之间散步。

国王问他："您近来好吗？"

俾斯麦回答："不好，陛下！"

国王说："我想你的情绪是好的。"

俾斯麦回答说："情绪原来很好，可是从王室根据玉玺在我们中间批准革命以来，情绪便坏了，缺乏对国王支持的信赖。"

这时，王后从后面走了出来，说：

"你怎么对国王这样说话?!"

国王说:"不用管我,伊丽莎,我来对付他,你责备我什么呢?"

俾斯麦回答说:"撤退柏林。"

国王说:"我并不愿意这样做。"

王后说:"这完全不是国王的过错,他当时三天没有睡觉。"

俾斯麦说:"国王必须会睡觉。"

国王说:"你们这些立法会议委员比任何其他人都清楚……责备不是重建已动摇的王位的最好办法。需要的是支持,行动,和自我牺牲,而不是吹毛求疵的批评。"

俾斯麦回忆说,这些话征服了我。他来时抱着投石党的情绪,走时就解除了武装,被征服了,成了一个地道的宫廷党。

赤色反动派,将来再用

奥托·冯·俾斯麦经常进出莫愁宫。他竭力劝国王要恢复所谓受到威胁的秩序。国王认为,他暂时还不能越出法律的轨道,否则他的统治基础将是不牢固的。俾斯麦则认为,应更多地

着眼于战争和自卫，而不是法律上的根据。

1848年6月14日柏林兵器库事件失败后，德国革命的局势急转直下，康普浩森—汉泽曼内阁辞职，反动势力抬头。当年5月，容克地主成立保卫立宪王国的普鲁士同盟。8月18日，在柏林米兰人大厅召开容克地主大会，有400名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参加。俾斯麦容克地主大会的发起人和积极参加者。盖拉赫在会上发言，号召容克地主团结在波茨坦王宫周围。大会决议成立保卫土地所有者同盟。

奥托·冯·俾斯麦积极为推翻三月革命成果、恢复专制缺席而四处奔波，在柏林、波茨坦、易北河中游各城市之间进行串连。维也纳十月起义失败后，普鲁士反动分子展开反攻。宫廷党的两员干将盖拉赫和劳赫极力劝说弗·威廉四世采用军事手段，解散普鲁士国民议会。在准备政变过程中俾斯麦充当柏林卫戍部队和各个军营之间的联络人。他协助勃兰登堡伯爵说服奥托·曼推菲尔参加政变。在12月9日政变当天，根据勃兰登堡伯爵的安排，俾斯麦同即将上任的军政大臣冯·施特罗将军会见，讨论局势。

俾斯麦问："您准备好了吗?"

施问："规定穿什么服装？"

俾斯麦回答："便服。"

施说："我没有便服。"

俾斯麦安排一名仆人在规定时间内给将军准备了一套便服。俾斯麦还参予了解放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军事部署。他亲自去拜访负责军事部署的冯·格里斯海姆陆军上校。他在给约翰娜信中说："我不必在这里等待事件的进展，也不必乞求上帝保佑我免于不必要的危险，如果出事，我愿意在国王身边，你可以完全确信，这里并无危险。"

奥托·冯·俾斯麦为普鲁士王宫竭尽忠诚，可谓是忠实的保王党。他本可以得到封赏，进入内阁。但他反动太露骨了，连普鲁士国王都不敢用他。勃兰登堡伯爵组阁时，曾提名为大臣，盖拉赫将军也尽力推荐，但国王批示："赤色反动派——嗜血——将来再用。""只有在刺刀不受限制地实行统治时才任用。"

1848年11月18日，国王请俾斯麦到宫中赴宴，但任命他为大臣时机尚不成熟。11月底，他又回到申豪森庄园。

竞选议员

奥托·冯·俾斯麦回到申豪森庄园，他不甘寂寞，很快就投入竞选议员的热潮。

普鲁士国王弗·威廉四世在 1848 年 12 月 5 日解散普鲁士国民议会之后，他亲自颁布了一部宪法，在历史上称作钦定宪法。宪法是普鲁士颁布的第一部国家根本大法。从此，普鲁士走上了君主立宪的道路。宪法规定，国王个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完全仅仅属于国王个人。立法权由国王和议会两院共同行使。同时也规定，全体普鲁士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取消等级特权。同时规定了迁徙、宗教、教育等项自由权利。每位普鲁士人年满 25 岁都有选举权，享受被选权需年满 30 岁，有充分的公民权需满 3 年普鲁士国籍。

俾斯麦认为，这部宪法太自由化了。但是他还是决定参加议员的竞选。他的家乡阿尔特马克不能提名他竞选议员，经过他的堂姐和姐夫的帮助，他由勃兰登堡市提名。俾斯麦在勃兰登堡市的竞争对手是该市市长弗兰茨·齐格勒，

此人是自由派，颇有威信。俾斯麦全力投入，通过各种个人关系争取选票。他到处竞选，争取选民。他写信给约翰娜说："今天我要认识更多一些选民，信使们无数次地被派往各个方向，两位爱国的演说家前往维尔德，很像在军事司令部里——每几分钟就收到信件和公文。非常感谢你的信，昨天收到时我正在4百人的乌烟瘴气和吵闹之中，我在难闻气味的灯光下读这封信。如果最喜爱的人要求我离开这可怕的喧嚣，我将立即离开这些无益的活动。如果我当选，这种没有内心安宁的生活将是一种艰难的职业。现在选民们正在投票，我听天由命，静待选举结果，虽然不久前我正像热锅里的蚂蚁。

议员选举在2月4日（星期日）和2月5日（星期一）举行。星期日选举结果，俾斯麦多12票。星期一则在边远地区投票，多是农村居民。结果，俾斯麦以154票对129票获胜，当选为普鲁士议会下议院议员。星期一晚，举行4人参加的庆祝宴会，人们为万能的真主、马丁·路德和普鲁士而干杯。他写信给他哥哥说："这个星期我常常自我嘲笑。我竭尽个人所能去赢得胜利。选举后举行一次400人的宴会。在宴会中我们

高唱："'感谢上帝'，'欢迎你，胜利的花冠'，'普鲁士之歌'。第二天我有点头痛，因为拉手过多，整个手臂筋肉都痛。第二天我几位朋友窗户被砸，还有几位挨打，当天我已平安地同约翰娜在家里。"

1849 年 2 月 26 日，奥托·冯·俾斯麦终于坐在普鲁士下院的议席上。

第三章　我还不知道

圣保罗教堂的钟声

德意志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德国狂飚运动的著名诗人歌德诞生在这里。1815 年以后，它是德意志联邦的自由市，德意志联邦议会设在这里。市内有多处古迹，多座教堂，圣保罗教堂是其中最宏伟的建筑。

1848 年 5 月 18 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全城挂起黑红黄三色旗帜，圣保罗教堂钟声响亮。全德国 500 多名国民议会的代表，鱼贯而入，走入这座庄严的全德国民议会的会场，宣布全德国民议会隆重开幕。

全德国民议会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来自德意志的各个阶层，有自由派和激进派的著名领袖，有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化界人士，还有三月

革命前遭受迫害的甚至是住过牢房的进步人士。会议分成不同的派别，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极右翼约60人，他们称为米拉尼党，他们都是旧制度的拥护者，认为国民议会没有制定宪法的权力，制定宪法要同各邦君主协商。激进派分为两个派别。温和派称为德意志霍夫派。他们坚持民主原则，认为国民议会是唯一的立法机关，各邦要服从统一的国家。领导人罗伯特勃鲁姆主编《德意志议会报》，主张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国民议会里他主张同自由派合作。极端激进派称丹尼尔斯贝格派，是坚定的民主派，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威廉·沃尔夫属于这个派别。资产阶级自由派居于中间地位，他们人数众多，约270人，影响力大。其中尤卡西诺党影响最大，都是著名资产阶级政治家、高级知识分子，被称为教授党。他们要求统一和宪法，但反对革命。他们认为制定宪法最好是同政府协商。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主席、自由派领导人海因利希·冯·加格恩就成立全德中央政府问题发表演说。他说：

"谁去创立中央政府？先生们，我冒昧地对你们说，我们必须亲自去创立临时中央政府（长

时期和热烈鼓掌）……未来的中央政府须由一位摄政掌握，同时成立责任内阁。”

什么人能担任这样的摄政呢？他说：

“如果我们希望这样一位摄政，我们这里多数代表无疑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一位品格高尚的人，他值得全国人民支持充当这个最高职位，并将无疑表现继续值得尊敬。我们需要从最高身分的人中选择一位摄政。在目前情况下，任何私人，或某些个人，甚至各政党都认为他们不能承担这个职位。”（右翼高呼：赞成，赞成！）

他说：

“这位高尚的人物必须是一位皇族，你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尽管并不是因为他事实上是一位皇族。”（会场上和旁听席上一次再一次响起欢呼声）

最后他说：

“让我们像一个联邦一样团结起来，是可能的。让我们牺牲必须牺牲的，以便去获得并照亮通往更光明的道路。我们不危及自由，我们组织我们民族和祖国的统一，这是我们渴望已久的。”（从会场各方面，从旁听席，响起激动的和长时间的欢呼）

1848年6月29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以486票(26票弃权)的绝对数选举奥地利的约翰大公为帝国执政。7月11日，约翰大公来到法兰克福市，第二天就任帝国执政。德意志联邦议会宣布解散，把权柄交给帝国执政。同时成立了中央政府。奥地利人安东·冯·施美尔林任政府首脑，兼内务大臣。卡尔·来根侯爵任外交大臣，海克舍尔任司法大臣，不来梅商人阿诺尔德·杜克维茨任商务大臣，莱茵银行家海尔曼·贝克拉特任财政大臣，普鲁士军官爱德华·配伊克尔任军事大臣。帝国政府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它既没有自己的军队，也没有任职的官吏。它曾经要求对各邦军队有指挥权，遭到各邦王公的拒绝。国外只有一个匈牙利政府承认它，而匈牙利政府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认。

1849年3月28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二读通过德意志帝国宪法。宣布，德意志是36邦组成的帝国，各邦内政独立。帝国元首为皇帝，皇帝有任命内阁、宣战、媾和、解散议会的权力。中央政府负责外交和军事工作，有权制定海陆军立法，制定关税政策，享有铸币权。最高立法机关是帝国议会。下院称人民院，每三年经过普

遍、平等、直接和秘密选举产生。上院称国家院，由各邦代表组成。宪法规定，帝国皇帝称“德意志人皇帝”。这是仿效拿破仑一世称“法兰西人皇帝”的尊号。

同一天，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以290票的多数选举普鲁士国王弗·威廉四世为“德意志人皇帝”。

3月28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派出以主席西姆松为首的21人代表团，前往普鲁士首都柏林，请求普鲁士国王接受皇冠和帝国宪法。4月3日，弗·威廉四世在波茨坦骑士厅接见了代表团。他听取西姆松的谈话后说，他虽然不怀疑他们的忠诚，但他是否接受皇冠要看各邦君主的决定。

1849年5月15日，普王弗·威廉四世发表《致我国人民》。他说：

“我不能满意地答复德意志国民议会提供给我的皇冠，因为没有德意志各邦政府的同意，这个团体无权授予他们提供给本人的皇冠，何况他们提出的条件是，我要接受一部与德意志各邦的权力和安全不相容的宪法。”

他下令召回所有普鲁士被选进法兰克福国

民议会的代表，说议会里坚持维护帝国宪法的代表已同恐布分子结盟。最后他希望用他的方法，即同各邦君主协商，制定宪法，完成国家统一。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历经一年的努力，力图走合法的议会道路，脱离人民的革命运动，把统一德国的希望寄托在普鲁士国王身上。不管他们表示如何效忠，仍然遭到拒绝。他们没有执行宪法的物质力量，手捧宪法和皇冠乘兴而去，两手空空败兴而回，成为历史的笑柄，证明这条道路走不通！

我的祖国是普鲁士

在接受帝国宪法和皇冠问题上，普鲁士内部斗争是很激烈的。普鲁士议会下院讨论这个事关德意志命运的重大问题。4月21日，洛贝尔图斯在议会发言，要求承认帝国宪法。勃兰登堡伯爵猛烈抨击洛贝尔图斯。但是，普鲁士议会下院还是通过决议，请求国王接受帝国宪法。同时，俾斯麦会同他的亲戚科来斯特、阿尔宁以及两位有爵位的大臣于1849年4月2日签署劝

进表，呈给弗·威廉四世。劝进表说："德意志民族代表们诚心恳请陛下承担复兴的德意志最高统治者的光荣使命。我们急切地恭请陛下不要忽视德意志国民议会的请求。"

弗·威廉四世拒绝帝国宪法和皇冠以后，俾斯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支持国王的决定。4月21日，他在下院发表演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力图表示其专制欲望的这个不合法的各项决议（中断，议长摇铃），我不能承认这样的决议对我们是有效的。"他把下院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称之为"宪政的无政府状况，是来自法兰克福，拒绝由于我们的批准以支持增加法兰克福的权力欲。"他继续说："我们很难相信两部宪法同时存在……一部在普鲁士，一部在德意志，特别是狭隘的联邦的德意志民族除普鲁士人外人数是极少的。"最后他说："每个人都希望德意志统一，但是我不希望用这样一部宪法来换取德意志统一，万一的时候，我宁愿普鲁士仍然是普鲁士……或许法兰克福所献的王冠是光彩夺目的，但是制造光辉现实的黄金是由把普鲁士王位扔进溶化炉里供给的，我绝不相信根据这样一部宪法重新建造能够成功。"

在普鲁士和德意志关系问题，俾斯麦是倾向于普鲁士而忠于霍亨索伦王室的。他对好友凯德尔说："我关心小邦做什么？我只关心保卫和增加普鲁士的实力。有位下院议员称俾斯麦为"德意志祖国的浪子"。他反驳说："我的祖国是普鲁士，我从未抛弃祖国，将来也绝不抛弃。"

俾斯麦反对用法兰克福议会通过的帝国宪法来统一德国，但他支持由普鲁士王朝来完成国家统一。他认为，在1848年普鲁士两次失去了统一国家的机遇。第一次是1848年三月革命之后。他认为，三月革命后普鲁士是唯一稳定的大邦，各邦君主都到柏林寻求保护，这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有利的条件。他指出，如果按照普鲁士和奥地利3月10日的声明，3月20日在德累斯顿召开德意志各邦君主大会，各邦君主可以作出牺牲。他认为，如果果断地巧妙地利用三月起义这一胜利，实现德意志统一就会比我参加政府后最终实现的更充分。他又说：如果国王在三月份断然镇压了柏林暴动，并不让其死灰复燃，那么在奥地利崩溃之后，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巩固的德意志国家的时候就不会遭到尼古拉皇帝那里来的阻拦。普鲁士之所以失去这次机遇，

是由于国王在三月革命中向革命战士让步，他再不是普鲁士军队的首领，各邦君主不再寻求他的保护。

俾斯麦认为，1848 年三月普鲁士统治集团之所以失去这次机遇是由于：①被议会的喧闹声搅得头晕目眩；②高级官员部分对运动的自由派一翼，部分对民族主义一翼表示同情。这促使对现实力量对比关系作了错误的判断。

在谈到弗·威廉国王的责任时指出："弗·威廉四世的德意志民族感情，或像他自己所写的'条顿'民族感情，比他父亲更加热烈殷切，但由于他的中世纪的修饰和在实际活动中不愿做出明确果断的结论，所以这种情感受到了压抑。因此他失去了 1848 年的有利时机，而且这不是他失去的唯一时机。"

俾斯麦认为，普鲁士失去统一德国的第二次时机是 1849 年。他指出，镇压德累斯顿起义和组成三五同盟之后，国王和军队依然强大，利用这种局势也许是可能的，不过条件是具备明确的和确实的目标和果敢的行动，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然而却把主要精力放在讨论未来宪法的细节上，如各邦有权和旁国一起派遣公使等

等。他以镇压德累斯顿、萨克森、法兰克福、巴登起义为证明，军队是可靠的，只要接受军队的领导权，结局不会有疑问的。

俾斯麦的结论是，正因为有1848年对革命势力的妥协，使得1866年成为不可避免。

奥尔缪斯之耻

普鲁士国王弗·威廉四世拒绝法兰克福议会献给他的帝国宪法和皇冠以后，着手运用他的方式统一德意志。他的首相约瑟夫·冯·拉多维茨执行这项计划。

拉多维茨将军早在1847年的奏折中就谈到改组德意志联邦的必要性。1849年6月12日他再次上疏国王。他指出，德意志人民渴望统一，德国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足以对付国内外危机的行政机构，以及全国统一的法律体系。中央政府必须控制国家的军队。他认为，奥地利由于帝国内有许多非德意志民族，它不能成为这个联盟的首领。因此，他建议普鲁士建立一个范围较小的联盟。以普鲁士为首的联盟再同奥地利缔结同盟条约。拉多维茨根据这种认识，于1849

年起草一部德意志联盟计划。

1849年5月，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萨克森、汉诺威五大邦代表在柏林开会，讨论恢复德意志联邦问题。拉多维茨在会上提出他的小德意志联盟计划。当时奥地利由于匈牙利和意大利问题还无力反对这个计划。同时，1848年法兰克福国会里的自由派约150人在哥达城集会，通过哥达派纲领，支持普鲁士的小德意志计划。1850年结成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三王同盟，他们同意参加拉多维茨规划的德意志同盟。1850年4月20日，普鲁士为首在埃尔福特召开国民议会。可是奥地利在沙俄和法国支持下已经镇压了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革命，它腾出手来反对这次会议。巴伐利亚和符登堡两个国王也拒绝参加，萨克森和汉诺威也相继退出会议，只有一些小邦参加了埃尔福特会议，组成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盟。

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在1850年5月10日在法兰克福召开旧的德意志联邦议会，他担任会议主席。1850年9月1日正式宣布恢复旧的德意志联邦。

这样，在德国就出现了两个政权，一个是以

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盟，一个是以奥地利为主席的旧的联邦议会。普奥之间的战争已不可避免。这时黑森选侯国由于选侯和议会之间的分歧，引起人民起义。选侯要求联邦议会给以帮助。普奥两国都派军队进来，战争一触即发。

沙皇尼古拉一世出面干涉。尼古拉斥责普鲁士在玩“革命的把戏”。拉多维茨被解除了职务，曼推菲尔接任普鲁士首相。他被召到华沙去，同施瓦尔岑堡会谈。1850年11月29日，普奥两国签订奥尔缪斯协定，放弃普鲁士的联盟计划，普鲁士同意恢复旧的德意志联邦议会。德意志各邦在施瓦尔岑堡主持下，在德累斯顿开会，旧的德意志联邦议会正式恢复。1848—1849年各种改组德意志联邦，统一德国的计划和行动都最后失败了。这就是普鲁士历史上的奥尔缪斯之耻。

怎样寻求德国统一，我还不知道

1849～1850年，奥托·冯·俾斯麦即是普鲁士议会下院的议员，又是埃尔福特议会的议员。但他对拉多维茨计划并不感觉兴趣，对德国

统一有他自己的看法。

在普鲁士统治集团内部，对待奥尔缪斯协定有两种不同意见。拉多维茨是主战派。据传统，拉多维茨被解除首相职务时把他的佩剑扔到国王脚下，对国王说："一个顾全荣誉的人不再能替陛下效劳。"普鲁士亲王支持对奥地利进行战争，他非常赞许拉多维茨的行为。总参谋长同样是主战派，认为普鲁士有40万军队准备打仗。他甚至说："世界上最坏的政府也不能毁灭这个民族，无论如何普鲁士将是德意志的领导，然而确实是，地球上再也没有比德意志更可怜的民族了。"被解除首相职务的拉多维茨在逝世前写过一篇文章《1900年的展望》文中说："我看见一个以普鲁士为首的复兴的德意志帝国，法国由于失去阿尔萨斯而退回她的自然疆界而变得无害。"

新任首相曼推菲尔、盖拉赫兄弟、勃兰登堡伯爵、国王的顾问和大臣们都反对同奥地利作战，是主和派。俾斯麦也属于主和派的行列。

俾斯麦对于奥尔缪斯的耻辱是感到气愤的。他听说，在奥尔缪斯协定签订时期，奥地利施瓦尔岑堡公爵住在二层楼上，有大批随从侍

候，而普鲁士的首相曼推茨尔住在一楼，只有两名随员。他认为，这是施瓦尔岑堡对普鲁士的污辱。可是，感情是感情，行动又是另回事。他在普鲁士议会公然替奥尔缪斯协定辩护。

奥托·冯·俾斯麦是普鲁士民兵的军官。战争即将爆发时，他被召入伍。他到达柏林后立即会见陆军大臣。陆军大臣施托克豪森对他说："目前我们必须尽可能避免破裂。即使奥地利没有萨克森的支持，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奥地利人对我们的破坏。我们不得不把柏林让给他们，而在首都以外的两个中心，也许是但泽或威斯特发利亚进行动员。要用14天我们才能向柏林调拨大约7万人，而这也不足以对抗奥地利现已作好准备反对我们的军队。"大臣说："如果我们要发起攻击，首先必须赢得时间，因此希望众议院的辩论不要加速破裂。"所以他请俾斯麦留在柏林，对友好议员施加影响。俾斯麦找了议会法律顾问格佩特，此人是右翼中心的领导人。他们决意支持政府，但认为，不仅在原则上，而且在军事行动上，捍卫普鲁士的民族使命是合适的。

从而，俾斯麦在议会里公开为奥尔缪斯协

定进行辩论。协定签订后，他在12月3日在议会里发表演说时指出，没有任何需要把10万人置于死亡境地，那是罪恶。他说："普鲁士就要走上那条道路。如果我们去征服，这些就是我们要去征服的人，每个民主党将在我们征服的人们的帮助下向国王表示他们的痛苦。"他说："当我想到发生什么事涉及我的自尊、我的享乐和我的祖国，想到忠诚、勇敢和光荣的普鲁士人喝被称作'普鲁士光荣'醉人之酒时，我就不禁流泪！"

他说："正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普鲁士民众在自己国王的召唤下已经万众一心地奋起，他们忠诚而驯服地站起来了，他们象他们父辈那样为了进行普鲁士历代国王下令进行的战争而站起来了！而在这之前，先生们，请注意这一点，在这以前，他们并不知道在这些战争中他们究竟要求什么，这是参加后备军的人当中恐怕没有人知道的。"

俾斯麦说：

"我曾经希望，在议会范围内，在掌握政权的人士的更小的范围内，能再次萌发这种万众一心和忠诚的情感。我在柏林的暂短逗留，对于

这里生活的仓促观察告诉我，我错了。请愿书草案称我们的时代是伟大的时代，但是除了个人的虚荣外，我在这里没有发现任何伟大的东西，除了缺乏自信没有任何伟大的东西，依我的判断，这些东西给我们的时代打上了成为卑微时代的印记，同时也给爱国之士提供了一种暗淡的前景……

俾斯麦分析了对奥战争的前景。他说：

这是什么样的战争呢？这不是派几个团去远征什列斯维希或巴登，也不是在骚动不安的省份里作炫耀武力的散步，而是对付欧洲大陆三大强国中两大强国的大规模战争，与此同时第三个强国又陈兵在我边界之上对我虎视眈眈，它清楚地知道，在科隆大教堂可以找到珍宝，占有这些珍宝，它就能够结束法国革命，并巩固那里当权者的地位，即法兰西皇冠……”

他带些煽动性地说：

“内阁或议会中的政治家坐在火炉旁取暖吹起附和公众思潮的战斗号角，或者从讲坛上发表振振有词的演说，同时却让那些在雪地上流血而死的步兵来决定他们的制度是否获得胜利和荣誉：这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是轻而易举

的。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然而现在不注意寻找在战后仍然站得住脚的作战理由的政治家是要吃苦头的……”

俾斯麦谈到普鲁士对德意志统一的关系以及应采取的态度。他说：

“我确信，普鲁士的荣誉并不在于：普鲁士在德国到处为那些受到损害的议会名流扮演唐吉柯德的角色，这些议会名流认为他们的地方宪法已面临危险。我认为普鲁士求得荣誉的地方在于：普鲁士首先摆脱与民主的任何可耻的联系，普鲁士在这个问题上和其他所有问题上，都不承认在没有普鲁士赞同的情况下在德国发生某些事情，一切由普鲁士和奥地利经过共同的独立的探讨而认为明智的，政治上正确的东西，都应该由德国两个权利平等的保卫者来付诸实施……”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俾斯麦的主要注意力是放在反对民主，反对革命上。

他谈到统一国家的德国模式。他说：

“赋予德国的模式，调整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关系，调整普鲁士、奥地利和诸小邦的关系等等，这是一个包含着战争与和平的主要问题，

它应在几天之内成为自由讨论的对象，因而它现在还不能成为战争的对象。如果有人无论如何也要进行战争，我可以以此安慰他，在自由讨论中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它；如果渴望战争的话，在4或6个星期内，我绝不想在本是如此重要的时刻以建议来妨碍政府的活动方式。如果我要对内阁表示自己的希望的话，那就是：在自由讨论会得出一个积极的结果以前，我们不能解除武装；这样，如果我们真正荣誉地不能避免或者不愿避免战争的话，那末我们总是有时间进行一场战争的。”

对于德国应该采取什么方式，俾斯麦表示当时他还不知道。他说：

“怎样应当在同盟中寻求德国的统一，我还不知道。这是一种特殊的统一，因为它一开始就要求为了这个特殊同盟的利益而时时在南方枪杀和刺死我们的同胞。这种特殊统一认为法国的荣誉在于全部德国问题的重心必须转向华沙和巴黎。请您设想，德意志两部分持枪对垒，双方力量的差别不明显，以至于非要一个不亚于俄国和法国的强国站在一方，才能使它占决定性的优势。我不理解，自己愿意造成这种力量对

比关系的人有什么理由抱怨在这种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重心移到外国去了。”

这就是 1850 年俾斯麦对德国统一的看法。俾斯麦讲话从来都是直率坦白，可是上述讲话似乎含含糊糊，闪烁其词。他后来在《思考与回忆》中说：“我演讲的主导思想是：根据军政大臣的想法，力求做到将战争推迟到我们武装好之后。但我不能清楚地公开表述我的想法，我只能暗示这一想法。”

由于他公开为奥尔缪斯之耻进行辩护，拉多维茨将军把他叫做“普鲁士的凶神”。

第四章　谁领导统一

“捕鸟的亨利”出任大使

在1848年革命洪流中，在1850年德意志的政治风云中，奥托·冯·俾斯麦都是普鲁士宫廷的功臣，他成为宫廷党的一员干将，很受普鲁士国王弗·威廉四世的赏识。但他仍然是布衣人物，没有官职，只是普鲁士议会下院的一名议员。可是，他虽然不是政府官员，也整天忙于政务，不是一身轻松了。他在给家里写信这样讲述他的生活：

“我向你描绘我生活的画面：周六从早10时到午后5时，庆祝宗教节，7时会见海外贸易大臣，阅读文件和报告到10点钟，然后去见曼推菲尔；喝茶和密谋到午夜，回家给我的选民写两封信，晨2时上床就寝。周日6时起床，7～

9时，商谈昂哈德—贝恩堡大臣职位，11时听布塞尔讲经，与内务大臣议事至中午，3点出外拜访，6时同哥尔茨约定研究普鲁士亲王委托我的一件事务，伏案写此事直到9点钟，然后去见斯图贝格，晨1时就寝。”

俾斯麦急于谋得一个政府职位。1851年初他曾想谋取安哈德首相一职。可是更好的机遇等待着他。德意志联邦议会恢复后，普鲁士急需一位具有坚强性格和外交才能的人物去担任大使。宫廷党主要人物盖拉赫将军极力推荐俾斯麦。他在奥尔缪斯协定辩论中，既维护了普鲁士政府的立场，又讨好了奥地利。他说：“1850年，反对我们的人谴责我们叛卖性地亲奥地利，称我们为柏林的维也纳人。”任命俾斯麦为驻联邦议会大使，便于同联邦议会主席奥地利大使和平相处。盖拉赫兄弟把俾斯麦看作是他们的门生，让他出任驻联邦议会大使，以便推行他们的外交政策。但是，任命俾斯麦当大使，宫内议论纷纷。普鲁士亲王说要任命这位后备军少校当大使，叹息不止！

1851年6月23日，普鲁士国王弗·威廉四世召见了他。国王问：“您很有勇气，立即就接

受一个你不熟悉的职位。”俾斯麦回答说：“陛下，是您有勇气把这样一个职务委托给我，同时，只要这个任命证实不合适，则陛下完全可以不受约束撤消这个委任。在我熟悉这项任务之前我自己也没有把握说我胜任。如果我不能胜任愉快，我就会第一个请求调离此职。既然陛下敢于任命，我也就敢于从命。”国王说：“那我们就试试看吧！”

事实上，奥托·冯·俾斯麦在1851年5月11日就来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出任普鲁士驻联邦议会大使冯·罗霍夫将军的参赞，接受外交工作的训练，7月15日他才正式被任命为大使。他把这次任命说成是一种偶然，把自己比喻为“捕鸟的亨利”。俾斯麦对这项任命非常满意。他写信给妻子说：“你曾抱怨，长官不给我差事做。现对出于我的期望和意愿，突然任命为现在我国外交事务中最重要的职位。”他说：“薪俸三千塔勒，加上我们自己的微薄收入，我们将在这里生活，但是我们还要节省。”

奥托·冯·俾斯麦从二等乡绅，成为驻外使节，一步登天，不久他的大使薪俸加到1.2万塔勒。他着手租房子，办家具。他写给哥哥的

信中说：“一年以前，甚至在6个月以前，谁曾想到，我将花5000多元去租一套房子，雇佣一名法国厨师，以备君主生日请客”“我已花1万到1．2万塔勒办置家具，还未置办齐全。贵重的设备是金银餐具、青铜器、玻璃器具和陶瓷制品。地毯和木制家具花费不多。因为这里吃饭是每一盘用一叉，请70位客人至少要用100副餐具。现在我要开办300人的舞会，工人们忙着准备一切，无用的花销太大。还不用说12名仆人的花费，一半是男仆，一半是女仆，我更愿意使用30名农村女仆。”

俾斯麦初出茅庐是位实干家。他办事认真，注意节省，事必亲躬，经营有道。他出任大使后，同莱茵省工商界广泛交往，接触到新鲜世界，逐渐克服容克地主的狭隘观念。他向首相兼外交大臣报告说：“我高兴地同供给我家具的人们的太太跳四对舞。这些太太们的礼貌使我忘却对他们丈夫的高价而劣质的商品的痛恨感情。我的舞伴是供给我雪茄烟的一位和蔼可亲的绅士的太太，挨着我那位太太的舞伴就是前天给我夫人提供窗帷幔的人。”

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是座清谈馆，没有任何

实权。实干家俾斯麦不习惯这样的政治生活。他写道："我觉得这里非常乏味……奥地利不断施展阴谋，却装作粗俗的和气……一般说，各小邦的代表们都是古朽性外交家，即使他们请求借个火，都是摆出外交家的姿势；当他们仅仅是索取厕所钥锁时，也要用拉提斯本的呆板姿势选择面孔和字眼。假如我在此地能独立行事，我将清除杂草，不然就突然回家。我认为这里是空架子，丧失自由，毫无目的。但愿不久会变好些。此外，我不觉得会实现我们的德意志政策，除非它的主要线索握在我的手里。我认为在普鲁士外交界，除了君主高级副官和外交大臣，很少能满足一个成年人的野心或忙于各项活动。"

他对法兰克福议会的工作评论说：法兰克福联邦议会的外交家们"远比下院的代表们更加荒唐可笑。现在我完全清楚地知道在1年、2年甚至5年内究竟能做成什么事，而我自己在24小时内就可以大功告成，只要其他人在整天内保持他们的知觉和理智。"他又说："议会里这些无谓的争论，那里各种令人可笑的事情令人气恼。"

德意志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是不可避免的

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意志联邦议会里，奥地利大使图恩伯爵坐在主席位置上。由他主持会议，发号施令，享有特权，在会上只有他有权抽雪茄烟。俾斯麦来到法兰克福，这位高傲倔强的容克，不甘屈居人下，处处同图恩争取平起平坐。他描写图恩说："穿了一件短甲克主持会议……扣上纽扣，掩盖着没穿背心，只露一条领带。他用谈话的腔调处理事务。"他还说："图恩在俱乐部里赌骰子直到早上4点钟，从10时到5时不停地跳舞，倍感享受，同时消耗大量带冰的香槟酒，特装出向商界的美妇人献媚，并装出他不仅关心旁观者对他的印象，而且关心自己的享乐。"他说图恩"是贵族的冷静和斯拉夫民族狡诈混合物。奸诈是他明显的特征。"

在俾斯麦担任参赞时，由一位柏林官员陪同去拜访图恩。图恩知道俾斯麦即将走马上任大使，故意躲避而不同他谈话。俾斯麦气得发抖，高傲的容克不容忍这样的污辱。俾斯麦升任

大使后，再去拜访图恩，图恩接见他时只穿件内衣，坐着吸烟。俾斯麦第二天再次拜访他，也点着一支雪茄烟。第二天俾斯麦把这事传播出去，天下皆知！

俾斯麦对联邦议会的会议采取轻蔑的态度。开会时他写私人信件。在联邦议会中奥地利是主席，得到中小邦大使的支持，只有北德4个小邦站在普鲁士方面。他对普奥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新的看法。他指出，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友谊无非是“解放战争结束之后出现的年轻人的梦想”。他看到奥地利如此敌视普鲁士异常惊奇！他第一次看到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关于奥尔缪斯事件的公文信件，其中说：“去污辱普鲁士 或者大方地饶恕她。”在这封文件发出时，俾斯麦还在下院议会里为奥尔缪斯协定进行辩护呢！真使他怒发冲冠！他到法兰克福6个星期以后说：“奥地利人现在都是赌纸牌的骗子手。他们野心勃勃，内外政策不是以正确观点为指导，我认为他们不可能同我们结成真诚的联盟。”

在1851年11月中旬的一次议会辩说中，俾斯麦和图恩针锋相对，短兵相接。他说：“图

恩伯爵所说同善沙所论同样意思，详细阐明大德意志的各种梦想。我再对他们所说进行补充，即根据这样一种观点，普鲁士的存在，尤其宗教改革的出现，是件可懊悔的事。在欧洲并不存在一个像他们所说的‘否认弗里德里希大帝遗产’的普鲁士，在我能抗议在国内执行这样一种政策以前，事件势将诉诸刀剑。”

俾斯麦在给盖拉赫的信中说：所有不幸都原于对奥地利让步的结果。他在信中说：“与我同床的人比外人更能容易打我、毒害我甚至勒死我……特别是这位同床人是一位残忍而怯懦的人。”盖拉赫把这封信读给国王听，引起共鸣和愤怒，对两国关系产生极大的影响。

奥地利政府不得不撤回图恩伯爵，改派原驻柏林大使普罗科斯—奥斯坦为驻联邦议会大使。普罗科斯—奥斯坦不同于图恩，经常去拜访俾斯麦，在俾斯麦家里同小孩玩耍。但俾斯麦评论说：“我同他的关系比同图恩的关系更平淡，因为图恩有时说真话，而普罗科斯绝不。”一次，普罗科斯清查办公室时，把装有反对普鲁士文件的办公桌卖掉，这些文件被俾斯麦获得。这些文件都是即将在普鲁士报刊上刊登的具有革命

性质的论文的草稿，都是署以民主派的名义。俾斯麦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俾斯麦认为，要是对维也纳宣布奥斯坦制造假文章的作法，将对他的大使地位不稳，这对普鲁士不利。最好的办法是，使他对他的地位担心，并把事情真像秘密告诉我们的同盟者，我们对他采取宽容政策，这对普鲁士有利。再个办法是复印普罗科斯的几篇假论文，其目的是让政府发现私人手中有这些文件而引起对他的怀疑。俾斯麦极其秘密地进行这一工作。

普罗科斯评论俾斯麦说："冯·俾斯麦先生宣布说，普鲁士是世界的中心，他要尽力去瓦解联邦。如果有一位天使从天而降，俾斯麦将不允许天使落地，除非他带着普鲁士的帽徽。他像马基雅弗利一样有清醒的头脑，他机敏过度，聪明过人，不惜采取他手中的任何办法，我们还要承认他绝不是半途而废的人。由于他不屈不挠地使联邦处于瘫痪状态——不惜巨资利用报刊，暗示奥地利是罪恶之党。他强调普鲁士使臣的重要性如此印象深刻，即他不止一次地宣布说，德意志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是不可避免的。我以前从未见过如此自信，如此相信自己意志的

人。”

俾斯麦欲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必要时拿出中学时代决斗的手段。在一次会议上他同莱希贝格发生争论，后来在大厅里继续争吵。俾斯麦说：“我们毕竟不能在博根海姆小树林用手枪来解决我们两国的外交问题。”莱希贝格听后暴跳如雷地说：“我们立刻到那儿去，我愿马上奉陪。”俾斯麦回答说：“我们为什么要走呢？联邦大厦花园里有的是地方，对面住着普鲁士军官，奥地利军官也住在附近。15 分钟就能安排好。我仅仅请您允许我把争吵的起因用三言两语写在纸上，并希望您和我在这张记录纸上签字。因为我不愿意在我的国王面前显得是一个用比剑来进行君主的外交工作的好争吵的人。”俾斯麦开始写，莱希贝格在他身后走来走去。俾斯麦请梅克伦堡公使冯·厄尔岑去同莱希贝格商谈下一步。经过厄尔岑的调节，争吵才算结束。

不坐奥地利的拖船

1854 年 3 月 28 日，英法两国对沙皇俄国宣战，一场战争恶魔降临在欧洲。由于这场战争主

要在克里米亚半岛上进行，史称克里米亚战争。战争的一方是英、法、土耳其，另一方是沙皇俄国。但是战争牵动了欧洲各国。沙皇俄国曾是奥地利的救命恩人。1849年沙皇出兵10万，镇压了匈牙利革命，保住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皇位。在1850年德意志联邦改组的斗争，沙皇出面干涉，逼迫普鲁士就范，保住了奥地利的盟主地位。但是，恩怨仇恨不是衡量国际关系的准则，它的唯一标准是力量的对比和国家利益。克里米亚战争后，奥地利不仅没有站在俄国一边，反而出兵多瑙河，对俄国军队造成威胁。4月20日，普鲁士和奥地利订立攻守同盟，规定普鲁士在36天内要集中10万军队，必要时要集中20万军队待命。

在普鲁士当权者内部，对于克里米亚战争的态度意见分歧。首相曼推菲尔和普鲁士亲王主战，首相甚至主张对俄国发出最后通牒。以盖拉赫为首的宫廷党反对支持奥地利，对俄国进行战争 。

俾斯麦对这一时期普奥关系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在施瓦尔岑堡侯爵时期，在此后的克里米亚战争 时期和利用奥地利来推行东方

政策时期，我们同奥地利的关系使人回想起列波累洛和唐璜之间的关系（即奴仆关系—引者）。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除了奥地利，其余德意志各邦都努力要求普鲁士在法兰克福代表他们的利益免遭奥地利和西方强国的暴力侵犯，在法兰克福我作为普鲁士政策的执行者不由得感到羞愤交加，因为我看到，对于奥地利并不总是以有礼貌的方式提出的过分的要求我们总是牺牲自己的政策和独立的观点，步步退让。在自卑感的重压之下，我们惧怕法国，屈从于英国，于是只好乘上奥地利的拖船苟且偷安。对于我的这些印象，国王并非没有同感，但是他不倾向于通过一项有气魄的政策来摆脱这种处境。”

普鲁士国王弗·威廉四世犹豫不决，而且联邦议会即将讨论这个问题。5月5日，首相曼推菲尔写信给俾斯麦：

“冯·盖拉赫先生通知我，国王陛下为在联邦讨论普奥同盟问题已命令阁下到这里来，而且将军先生也就此事已给阁下写过信。遵照我事前一无所知的陛下命令，谨请阁下立即前来这里。考虑到联邦议会即将进行的讨论，您在这里的停留将不会很长。”

俾斯麦回到柏林后，召见他的首先是主战派普鲁士亲王。普鲁士亲王情绪激动，他希望俾斯麦劝说国王采取亲西方反对俄国的政策。亲王说："在这里您可以看到两个互相斗争的流派，一个以曼推菲尔为代表，另一个对俄国抱友好态度的以盖拉赫和驻彼得堡的明斯特伯爵为代表。您才来这里，是位新人，国王召见您，是让您当个仲裁人。因此您的意见会起决定性作用，我恳求您，请您在谈话时不仅要考试到欧洲局势的要求，也要考虑到对俄国的友谊的真正利益的要求。俄国招致整个欧洲与自己为敌，最终要被战胜的。"

俾斯麦对亲王说明，普鲁士绝对没有自身的理由同俄国王作战。在东方问题上普鲁士也没有任何利益对俄国作战，或者牺牲同俄国的友好关系进行辩解。恰恰相反，任何获胜的反俄战争，在作为邻国的普鲁士的参加的情况下，不仅会引起俄国的长期仇恨，而且也要使普鲁士面临解决波兰的棘手问题。既然普鲁士没有切身利益进攻和反对俄国，如果普鲁士进攻俄国，那就是惧怕法国，向奥地利和英国献殷勤。普鲁士就会像印度参与英国的历次战争而扮演陪臣

的角色，或者扮演1812年随拿破仑进攻俄国的奥地利约克兵团的角色！

俾斯麦的话说得亲王面红耳赤，怒气冲冲地打断了俾斯麦的话说："这里根本谈不到陪臣和恐惧。"

俾斯麦反对同奥地利一起对俄国作战。他说：不愿"把我们快速和坚固的战舰同奥地利的陈旧战舰合作。"他另有打算。他指出："大的危机有利于壮大普鲁士的气候，我们要毫无恐惧地（甚至是无情地）利用这个时机，无论如何，事务在发展，支持我们的力量将增加。"

随后他去谒见普王弗·威廉四世。他同国王讨论4月20日条约。他建议："要利用这一时机把我们和普鲁士的政策从这种从属的、在我看来是不足取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并且要采取会使我们在德意志联邦中获得国情和取得领导权的立场；因为这些邦国和我们一起并通过我们保持独立的中立地位。我认为这是切实可行的。"他提出："只要奥地利要求调派军队，我们表示欣然同意就行了。"他提议调10～20万军队到西里西亚，不是到利隆，随时可以越过俄国边界或奥地利边界。"在这种时候，陛下就可以

主宰整个欧洲的形势，决定讲和条件，并在法国获得与普鲁士完全相称的地位。”

俾斯麦向国王分析了欧洲的形势。他认为，第一，法国正忙于克里米亚问题，无力威胁普鲁士的西部边界。第二，奥地利兵力都部署在东加里西亚，疾疫流行，俄国在波兰有20万兵力牵制它。第三，英国对普鲁士海岸的封锁，还不如丹麦对普鲁士的封锁危害大。他提出："如果我们和德国能获得独立，解除奥地利—法国同盟的压迫和威胁以及对位于两国之间的中北邦国的暴力侵犯，那么我们就会得到补偿。”

普鲁士国王弗·威廉四世微笑地说："亲爱的，这一切都很美妙，但是要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能采用这种暴力行为的，只能是拿破仑那样的人，我可不行。”

俾斯麦的理想，还没有实现的条件！

俾斯麦同拿破仑第三会谈

在任普鲁士驻联邦议会大使时期，俾斯麦逐渐形成了对欧洲格局的看法。首先是对奥地利的看法。普王弗·威廉四世、首相曼推菲尔和

列·冯·盖拉赫所以选中他任驻联邦议会大使，是认为他是同奥地利保持友好关系的合适人选。它们传统的看法是，要保持1815年以来欧洲的正常政治秩序，保持神圣同盟体系，其次是对法国和法皇拿破仑第三的看法。在普鲁士统治集团当中，法国是革命的中心，它损害合法王朝权益。拿破仑第三通过政变上台，推行波拿巴制度，皇帝个人独裁。他在法兰克福听说，拿破仑的统治还不稳固，人们的不满情绪在增长，有一天会起来推翻他。

俾斯麦决定冒险，秘密访问巴黎。

他原拟在1855年8月15日去访问巴黎，参加拿破仑第三的生日庆典并参加世界博览会。普鲁士驻法大使哈茨基尔德向他建议，把访问日期推迟几天，因为8月18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要来巴黎访问，这对俾斯麦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柏林当局不同意俾斯麦访问巴黎这个“罪恶的渊薮”。他遂请求到法国海滨旅游。其实他没有到法国海滨去，而是径直前往巴黎。

俾斯麦于1855年8月17或18日到9月5日逗留在巴黎。他在巴黎受到热诚的欢迎和友

好接待。8月25日，他第一次谒见了皇帝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三世对俾斯麦表示建立密切的普法亲善关系的愿望和意图。拿破仑表示，我们两个邻国由于它们的文化修养和结构而居于世界文明之首，需要互相支持。拿破仑第三抱怨普鲁士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没有支持西方国家，但皇帝表示：他不在乎这些，而是希望缔结一个普法谅解。法国皇帝对俾斯麦反对奥地利的政治计划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俾斯麦在给普鲁士首相曼推菲尔的报告没有谈到普法结盟问题，而是着重谈了法奥关系。他说，法奥关系已经患了感冒，奥地利大使巴特萨夫特·胡布纳没有参加拿破仑的生日庆典，没有讨论延长法奥同盟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法国不愿陷于同俄国的冲突。法国力求同普鲁士建立友好关系，以代替同奥地利的友谊。

俾斯麦在巴黎时期同法国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伯爵举行会谈，结识了拿破仑第三的异母兄弟。同时，俾斯麦对拿破仑第三的为人和政治立场有了初步了解，同以前在法兰克福听说的完全不同。他认为，拿破仑的皇位和法国的政局是稳定的。他在给盖拉赫的信中说："只要拿破

仑还在世——我相信——他的皇位是稳固的。”“对他的不满和反抗，根据我的观察，未必有好的前景。皇帝有足够的国民卫队和警察去控制巴黎。军官和士兵都很清楚地支持他的统治。”

俾斯麦在巴黎会见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同他们进行长短不同的谈话。

1855 年冬天，普鲁士国王弗·威廉四世同俾斯麦进行一次有趣味的谈话。国王带着讽刺的口吻问俾斯麦对拿破仑第三的看法。俾斯麦回答说：“我的印象是拿破仑皇帝是一位谨慎的、和蔼可亲的人，但是并不象世人所说的那样睿智。世人把一切发生的事情都记在他的帐上，甚至把东亚雨水不调，也说成是由于皇帝的恶意阴谋。我们这里习惯于把他看作是一种光神，似乎他心上时时盘算着怎样在世上制造祸乱。我认为，当他能在宫廷中欣赏什么美好事物的时候，他是快乐的。人们夸大了他的智慧而损伤了他的心地，其实他为人心地善良，谁要为他尽一点力，他是会感谢不已的。”

国王哈哈大笑！

俾斯麦继续说：“有一次，冯·卡尼茨将军在军事科学院给青年军官们作关于拿破仑几次

征战的报告。一位学习勤奋的听众问他：拿破仑为什么会疏忽了这样或那样的调兵。卡尼茨回答说：是啊，您看，拿破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一个心眼很好的汉子，就是蠢，蠢！当然，这番话引起了军事学院学生的哄堂大笑。我担心，陛下对我的想法类似冯·卡尼茨将军对拿破仑的想法。”

国王笑着说：“您也许有道理，不过我对现实的拿破仑不太了解，不能对您以他的心比他的头脑好这种印象进行争辩。”

显然，俾斯麦只想把拿破仑第三说成是一位好的政治家，唤起对他的同情，以便同法国结盟，反对奥地利。可惜，在普鲁士当权集团中还没有人理解他，支持他。

俾斯麦在 1857 年 4 月 5 日到 22 日之间对巴黎进行第二次访问，历时 18 天。

1855 年，德意志联邦同丹麦王国之间就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的争论尖锐化。1857 年 4 月，德意志联邦通过驻哥本哈根大使向丹麦王国提出抗议。为了弄清楚法国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的态度，俾斯麦决定亲自访问巴黎。他在给盖拉赫的信和首相曼推菲尔的

报告中都谈到访问巴黎的重要性，希望在丹麦问题上争取拿破仑的联合。他并且报告说，在汉堡海水浴场法国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对他表示了特殊的友好。拿破仑第三也邀请俾斯麦到巴黎访问，同他讨论由于丹麦问题而引起的政治争端。拿破仑第三认为，俾斯麦把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完全置于普鲁士政治势力之下作为着眼点，因此决定讨论共同的政治计划。拿破仑第三通过斯蒂凡尼大公让俾斯麦知道，他认为俾斯麦是“法兰克福唯一无二的政治领袖。”

俾斯麦这次在巴黎同样受到热情的接待，参加了推勒里宫的众多节日活动，特别是参加了皇子热罗姆·拿破仑诞生的庆典。

俾斯麦在巴黎期间，同拿破仑第三进行了3次会谈，两次正式会见，一次午餐时长谈。4月11日，拿破仑第三正式接见俾斯麦，长达一个小时。俾斯麦在写给妻子约翰娜的信和给首相曼推菲尔的报告中都谈到，法国皇帝精力充沛，身体健康，外传他重病是不真实的。俾斯麦认为，拿破仑的健康是个政治因素，整个法国战局都有赖于它。俾斯麦在报告中谈到法国政局。他认为，皇帝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政局稳定。拿

破仑是唯一能控制法国政治生活的人物，没有力量能够反抗他。

拿破仑第三在谈话中对俾斯麦强调说，诺恩堡问题由普鲁士自行解决，同时要同英国搞好关系，诺恩堡公国或称纳沙泰尔，1808年建立共和国。1815年前后普鲁士国王担任这个公国的公爵，同时加入瑞士联邦。1852年伦敦大国备忘录确认普鲁士国王对诺恩堡的权力。1856年9月诺恩堡保王党人起义，企图把公国归还普鲁士，起义在第二天遭到镇压。皇帝希望，这应成为同普鲁士广泛合作的起点。俾斯麦在报告中说，皇帝以巨大的热情和十分敬重的心情谈到普鲁士国王弗·威廉四世。他希望，《十字报》能最后解开1813年的回忆。拿破仑第三表示，他不追求占领政策，而主张保持现状，推行温和政策。他希望访问柏林，并参观一次军事演习，作为同普鲁士紧密合作的良好开端。拿破仑第三表示，他非常关心普鲁士宪法和内部状况、它的管理，特别是它的军事机构和后备兵法。他希望让外界把法普两国看作是联盟伙伴关系。

在第一次会谈中，皇帝也谈到丹麦问题。他

向俾斯麦建议，向哥本哈根派一名联邦委员，并允诺法国通过外交途径对丹麦施加压力，以支持德国的要求。他说，如果同丹麦发生武装冲突，他的立场则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成为丹麦君主的保护人，这是根据伦敦议定书的决定。

第一次会谈后，俾斯麦立即写信给盖拉赫，建议当年秋天向法国皇帝发出邀请，并请求迅速回电。可是，他没有得到回答。

4 月 16 日，拿破仑第三邀请俾斯麦到推勒里宫共进午餐。餐后他们进行长谈。主要涉及法国和普鲁士的各种利益以及大的欧洲政策 。

拿破仑的目的是争取法国国旗在地中海上占优势地位。他不仅在欧洲大陆占优势，而且要争取控制海上优势，向令人不愉快的英国霸权挑战。俾斯麦把他对巴黎的访问写成专书《总的印象》。书中说，拿破仑要求法国舰队在地中海占优势，现在舰队分散在布列斯特—土伦之间，这种状况应当结束。俾斯麦对盖拉赫说，拿破仑皇帝对他说，法国需要海，尤其是地中海，把海峡变成法国内湖，因此，要把法国舰队在那里联合，不断地单独地同英国对抗。法国争取海上优

势，向海外扩张，必然引起英国的敌对。因此，拿破仑需要盟友。在欧洲各国中能同法国结盟反对英国的只有俄国。英俄两国名义上是互助的，但实际上在海上进行敌对。同时拿破仑希望同普鲁士结盟。

俾斯麦同拿破仑的会谈，使俾斯麦对欧洲格局和普鲁士对外政策产生新的思维，新的看法，同传统路线、传统政策分道扬镳。

同盖拉赫的辩论

随着岁月的流逝，德意志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的分化，普鲁士统治集团内部也分化了。

以盖拉赫兄弟为首的宫廷党，是保守党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总参谋部里他们的代表人物在冯·劳赫将军死后则是列·冯·盖拉赫。老保守党还有顾问尼布尔等人。他们的刊物是《十字报》，坚持旧的路线和策略。

在宫廷党内出现了以贝特曼—霍尔斯格为首的反对派。贝特曼—霍尔斯格1820年在柏林任民法教授。1829—1845年任波恩大学民法教授。1845年成为国务院成员，1849—1852年入

贵族院，1852—1855 年当选众议院议员。他原是保守党的创立者。1851 年建立《周报》，形成以他为首的周报党。他们的靠山是罗伯特·冯·哥尔茨伯爵。他们以《周报》为阵地，攻击首相曼推菲尔，主要攻击奥尔缪斯之耻。他们之间互相交换备忘录，认为普鲁士是欧洲的先锋，应该追求的目标是：肢解俄国，把包括彼得堡在内的东海岸沿海地区各省划归普鲁士和瑞典，肢解波兰。为达此目的，他们主张采取亲英政策，把英国作为天然盟友，普鲁士军队帮助英国对抗沙俄。他认为，未来的欧洲有可能把 6000 万俄罗斯人看作是废物，可以随意虐待俄罗斯民族。

罗伯特·哥尔茨从青年时代就是冯·俾斯麦的朋友。他竭力争取俾斯麦加入同柏党。但是，俾斯麦拒绝了。理由是：他受到曼推菲尔的信任才获得驻法兰克福联邦议会大使的职位，利用他对国王的影响去推翻曼推菲尔是不恰当的。他认为，要是曼推菲尔逼得他非同他决裂不可，就是到这一步他也要对他进行挑战和公开说明理由。

但是终于形成了以俾斯麦为首的新的派

别，这一派别还包括毕洛夫——霍亨道夫、阿尔文斯累本——埃尔克斯累本等人。俾斯麦在回忆录中谈到1852年前后他脱离保守党顽固派时说："我发觉当时我们人数众多的这个派别——大约超过一百人——都完全受着他们的领导人制定的政治教条的束缚。自从我在法兰克福对奥地利采取防备的立场以来，我就走上了这一派别的领导所不赞同的道路，因此我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便脱离了上述领导的束缚；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危及到我们同奥地利的关系。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歧意见，总的来说，动摇了我对这一派别领导的信任。"

在外交上，曼推菲尔首相和盖拉赫集团执行亲西方和亲奥地利的政策。对此普王弗·威廉四世同样有不同意见。因此弗·威廉四世经常召俾斯麦到柏林来，协助他制定对德意志的政策和外交政策。1854年国王弗·威廉四世曾提名俾斯麦担任大臣职位，遭到宫廷党内老保守派的反对。不仅曼推菲尔首相不同意、政府顾问尼布尔也反对，议院议长盖拉赫认为，俾斯麦不是宫廷党内可靠的成员。盖拉赫声称，我和他必将分道扬镳，最终成为对手。

奥托·冯·俾斯麦形成自己的集团，他们同当权的曼推菲尔—盖拉赫集团的分歧究竟是什么呢？

他们之间的分歧涉及普鲁士外交路线的原则问题。

俾斯麦在回忆录中说："对于我同拿破仑的交往和不同来源于一个概念，或者准确地说，来源于'正统主义'一词。"

俾斯麦给盖拉赫的信中说："在对外政策方面我都不能顺从您的观点，照我看，这种政策的观点应当受到指责，因为它无视现实。"

俾斯麦接着说："您的出发点是，我为了个别我敬仰的人而牺牲的原则。对于所谓敬仰的人和牺牲原则这两句话我都要拒绝，此人绝不令我敬仰。"

他说："关于我牺牲的原则……如果您指的是应当应用于法国及其正统主义原则，那么我当然要承认，我是把这一原则完全置于我特有的普鲁士爱国主义之下，法国只有当它对我的祖国的状况有影响时，它才使我感兴趣，我们推行政策只能同现存的法国一起，而不能把这样的法国排除在这种组合关系之外。"

他继续说："对我来说，不管法国有谁领导，法国都不过是政治棋盘游戏中的一个棋子，而且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棋子；在这种游戏中，我的使命只能致力于国王和我的国家。""使国家利益从属于对外国的喜爱和痛恨的个人情感，依我看就连国王也无权这样作。"

他说："或许您认为我所牺牲的原则就是一个普鲁士人永远是法国的仇敌这样一个公式。"他回答说："我对外政策的态度并不取决于凝固的仇视，而是取决于据我判断能对普鲁士带来损害或利益的权衡。"

这里俾斯麦冲破了普鲁士统治集团中正统主义原则的束缚，对外政策的原则应是权衡国家利益得失，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凝固的仇恨、情感出发。这是一个突破。

而盖拉赫仍然坚持他的观点。他在 1855 年 5 月 6 日给俾斯麦的信说："对我来说，探讨原则之所以有极大的重要性，是因为我认为没有这样的原则，一切政治联合便都是有缺点的、不巩固的，极其危险的。"他举了许多历史上的例子谈原则问题。他认为 1000 年前查理大帝时期的政治原则是传播基督教，到近代同土耳其人

的斗争则是原则问题。当前的政治原则是什么？盖拉赫概括说："席卷欧洲的革命给欧洲的政治带来的原则，依我看至今仍然是有效，不能说忠于这种概念是不合实用的。"他认为，从1815年以来英国和奥地利都在遵循这个原则。他认为，维也纳会议没有根据这个原则，而把利益放在原则前面。

盖拉赫又说："我的政治原则现在是，今后也仍然是，同革命进行斗争。您说不服波拿巴不站在革命方面，他也不愿意站到别的阵营里去，因为那里有他的决定性利益。"他说："如果我的原则，如反对革命的原则，是正确的话（我想你也会承认它是这样一个正确的原则），那么在实践中就必须坚持……英国和按自己方式行事的奥地利在1793年至1813年期间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因此尽管法国人使它们遭受种种失败，但它们始终能够找到盟友。"

其次，俾斯麦对普鲁士外交政策进行评论，并提出他对普鲁士外交政策的方针。他认为，普鲁士的国力，特别是攻击能力远不如1806年。他用歌德的一句诗即引用牧羊人的话说："我走到了山谷之底，却不知怎样走来。"他认为其原

因是：我们没有结盟，也不执行任何外交政策，就是说，没有积极的外交政策，我们局限于收集落在我们菜园里的石块，并尽可能刷掉落在我们身上的尘埃。他反对普鲁士采取消极的对外政策、无计划的对外政策。他指出，普鲁士不要满足于别人还给我们的安宁。他形象地说：如果我们不设法成为铁锤，那么我们就将成为铁砧。

俾斯麦提出，普鲁士的外交路线应是，不受外国的影响而保障我的祖国的独立的利益，而外国势力影响的肥沃土壤是我国小市民对于英国的崇拜和对法国的恐惧，以及希望避免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是由于依从奥地利和英国的政策而进行的战争。

第三，分歧点关键是对奥地利的政策。俾斯麦在回忆录中说："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贝特曼·霍尔维格集团对曼推菲尔的攻击也重新恢复起来。首相反对与奥地利的决裂，反对如果向波希米亚战场那样的政策，在我国与奥地利友好关系的关键时刻，表现得最为强烈。"

盖拉赫在1854年11月15日给俾斯麦的信中谈论了奥地利的政策。他认为，奥地利的政策不是教皇权力至上说，也没有在东方的宏伟

计划，也不想要德意志皇冠。奥地利推行的是一种胆小如鼠的政策。根据是：第一，意大利和匈牙利形势的内外交困；第二，本国财政困难，法制破坏；第三，畏惧波拿巴，担心俄国报仇，惧怕普鲁士。他引用美廷多尔夫的话说："我的内兄布（奥尔）是个政治上的胆小鬼。他害怕一切战争，但是害怕同法国战争甚于害怕同俄国战争。"他认为，"那么在我看来，只要有可能就追随奥地利倒是个聪明办法。"

俾斯麦在给盖拉赫信中分析了普鲁士同奥地利和德意志各邦利益之间的关系。他说："迄今我们可能与之建立同盟的国家，其利益都是同我们的利益极其复杂地交错着的，甚至是互想冲突着的，也就是说同德意志各邦和奥地利的关系。"

俾斯麦具体地论述了奥地利。他说："我问您，在欧洲是否有一个内阁比维也纳内阁更为感到其切身的和自然的利益在于不是使普鲁士强大起来，而是削弱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影响？是否有一个内阁更急切、更巧妙地追求这样一个目标，更冷酷无情地把一己的利益当作自己政策的准绳，给我们、俄国人和西方强国提供众多

的和令人信服的证明它作为一个盟友的诡计和背信弃义的证据吗？难道奥地利还羞于同外国缔结任何符合它的利益的同盟，并以此来公开威胁德意志联邦的各成员国吗？您是否认为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一般情况下，尤其是在维护非奥地利的利益时具有牺牲精神和忠诚不渝的本性呢？您能从这一'原则'出发，在约瑟夫皇帝的布奥尔——巴赫 的统治方式和拿破仑的统治方式之间找到什么区别吗？"

俾斯麦给盖拉赫信中说："但是奥地利和各中等邦现在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方针是与普鲁士生死攸关的任务完全互不相容的，而且只要奥地利不采取一种对待我们有节制的制度，我们的政策便将毫无共同之处。"

俾斯麦谈到对德意志各中小邦的看法："我还要问您，而且在您回答时不要闪烁其词，除了奥地利政府，还有哪个政府比德意志中邦国更不乐意为普鲁士做一些事情。"他指出，在和平时期它们在德意志联邦中和关税同盟中扮演的角色，在战争时期则是惧怕和不信任。

俾斯麦也谈到德意志联邦。他说："还有一个问题：在发生战争时您和国王陛下究竟是否

相信德意志联邦及其军队？我指的不是法国为了反对与俄国结盟的德国而进行的革命战争，我指的是一场争夺利益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同普鲁士一起的德国和奥地利所能依靠的是它们自己的力量。”

俾斯麦谈到在现实外交斗争中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关系。他说：“我特别惊奇的是，在您的信中谈到，奥地利人声称他们在诺恩堡为我们获益而作的事比法国人还多。”俾斯麦认为这是谎言，并举出从法国人和基谢廖夫那里得到的消息，奥地利代表在一切场合都反对普鲁士。他指出，要提高普鲁士的威望，靠德意志联邦是不能达到的，不能让原则把我们的手脚束缚起来。”他指出，普鲁士“不能躲在布奥尔伯爵的怀里尽情吐露我们兄弟之情谊”。

俾斯麦说到普鲁士的德意志政策。他说：“至于我们的德意志政策，我认为，我们的使命是同各小邦表明普鲁士的优势地位，不能允许他们，例如在关税同盟以及其他许多事务中，直到狩猎邀请……一方面随心所欲地自行其事，在这里，就是说在德国，在我看来也必须是反抗奥地利的地方，但同时对奥地利也应避免任何

间隙。”

第四，对法关系，对拿破仑第三的态度，这同样是俾斯麦同曼推菲尔和盖拉赫的主要分歧点。

曼推菲尔—盖拉赫集团执行追随奥地利的政策，反对同法国拿破仑第三政权结成联盟。盖拉赫在1854年给俾斯麦信说：“但是与法国结成任何联盟的作法都会使这一可能性（即追随奥地利——引者）化为乌有。这种联盟，我们不论从道德上，从财政上还是从军事都不能接受。对我们来说，这就会是死亡。我们就会丧失我们藉以生存的1813—1815年的荣誉，我们就会把堡垒让给有理由不相信我们的同盟者。我们还要养活他们。”

1855年1月4日盖拉赫写信给俾斯麦，批评俾斯麦亲近波拿巴。他说：“向波拿巴，向自由主义讨好就是罪恶，但是依我看来在现成条件下也不明智。您忘记了（一种凡是离开这里片刻的人都要犯的过失）那些决定作用的人士，您怎么可以和一个完全没有原则、不可信赖、不自由地被引入歧途的大臣，和一个至少可以说是不可捉摸的奇特君主玩弄那种迂回的手腕呢？

请您考虑，弗（科）·狄（阿沃格）基本上是一个波拿巴分子。”

俾斯麦在5月30日写信给盖拉赫说：“我也承认为反对革命而斗争这一原则是我的原则，但是我认为路易·波拿巴看作是唯一的或者即使只是首要的革命代表是不正确的，而且我认为在政策中贯彻这一原则时不可能采取这种方式，即：使这个原则永远的贯穿其他一切政策中，使它可以说是成为纸牌中唯一的王牌，连其中最小的牌也可以击败其他花色牌中最大的牌。”俾斯麦举了许多国家的例子，证明他们是与革命原则分不开的。他接着说：“一旦他们不再对我们构成危险时，它们的不合法诞生也就被谅解了。随之，人们在原则上也就不再反对他们。”俾斯麦说：“无论对于他伯父征服狂的回忆，还是他的权力的不正当来源这一事实，都并没有理由使我有理由把当前法国人的皇帝看作是革命的唯一代表，看作是为反对革命斗争的最好对象。”

俾斯麦在1857年5月30日写信给盖拉赫谈到同法国结盟问题。他说：“我不过是要证明一下，和我们所承认的一个强国的君主建立更

密切的联系既不是罪恶也不是耻辱，如果政治事态的进程要求我们这样做的话。我并不是说这种联系本身有什么珍贵之处，我只是说，其他一切前景都更坏。为了改善这种关系，我们就应当和法国在实际上或表面上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只有用这一方式，我们才能使奥地利理智起来，使它放弃施瓦尔岑堡的过分野心，使它寻求同我们谅解，而不是为求诈骗我们；也只有用这一方式我们才能阻止德意志中等邦和法国继续保持直接的关系。英国也只有当他担心，它可能错过同我们结盟的机会从而有利于法国时，它才能认识到同普鲁士结盟的重要性。"

这里俾斯麦正是从欧洲实力对比关系出发来论述同法国结盟的重要性。

俾斯麦同盖拉赫争辩说："您对我说，这个人是我们的天然敌人，不久就会表明，他现在是这样的，将为必定也仍然是这样的。对此我要争辩说，或者同样有理由说："奥地利和英国是我们的敌人，情况就是这样，这早已是明显的事实，这在奥地利显得很自然，在英国显得还不自然。"

第五，普鲁士对西方的关系，法、俄、普三

国结盟问题。

俾斯麦不同意曼推菲尔—盖拉赫推行的西方的政策。他认为，为什么为了别国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普鲁士的利益，使我们同俄国的多年友好关系成为问题。为了普鲁士不相干的利益而反对俄国的话，那是由于我们惧怕西方和对英国卑躬屈膝的结果。首相曼推菲尔委托穆斯蒂埃侯爵说服俾斯麦，让他转向亲西方政策，在国王面前维护这一政策。

穆说："您奉行的政策会把您引向耶拿。"

俾回答说："为什么不引向莱比锡和罗斯巴赫呢。"气得他脸色发白。

俾又说："总而言之，每个民族打仗都有胜有败。我来不是为了和您研究历史的。"

曼推菲尔—盖拉赫集团反对同法国和俄国结盟。盖拉赫在信中说："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处于孤立地位，我认为不必惊异。"他谈到当时的英法结盟，法国还在采取同俄国结盟的步骤，奥地利和英国结盟等。他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同法国和俄国结盟来反对奥地利吗？这样的同盟必然会立即使法国在意大利占优势，使意大利完全革命化，同时会使波拿巴的影响在德

意志占优势。人们只让我们在一些次要问题上起一点作用，但不会很大，也不会持久。”

盖拉赫在给俾斯麦信中说：“法国、俄国、普鲁士三国同盟，普鲁士在加入时嘴里说：“请接纳我加入你们的同盟，在你们之中我当老三吧！’它仍然是三国中最弱的一个。奥地利和英国对它抱着不信任的防御态度，它却直接促成了‘法国利益”的胜利，即先统治意大利，然后再统治德意志。”

俾斯麦在给盖拉赫信中说：“1850 年有人称他是柏林的维也纳帮，后来又有人说他身上有俄国的皮革气味，是施普累河上的哥萨克，还有人说他是西方各国的，现在又有人说他是波拿巴分子。”他说：“这都是不公正的”他说：“我总是回答：我是普鲁士的。”他认为外交政策的理想是没有偏见，不要受对外国当权者好恶的影响。不论对法国人、俄国人、英国人、奥地利人开火，只要符合普鲁士利益我就满意。”

这就是俾斯麦的结论。

第五章　德国人的呼声

要求统一和自由的群众运动

从1859年开始，德意志各邦和阶层人民重新掀起争取国家统一和自由的斗争，到1862年形成了高潮。1862年，在德国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革命形势逐渐成熟。各阶层人民空前活跃，召开各种群众性集会，有科学界、经济界、政治界、文化界的各种代表大会，也有法律工作者、哲学家、经济学家、教师、自然科学家、医生、消防队员、商人、工业家的各种集会，各种群众团体的歌曲演唱会也不断举行。他们发出共同的要求，德意志的统一和宪政自由。

西南德意志各邦，在1848年是民主力量最强大，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地方。这里群众斗争重新开始，他们又喊出1849年的口号：争取帝国

宪法。他们仍然反对自上而下的由普鲁士王朝统一德国的道路。他们认为，德意志的统一，不能依靠政府的力量，而应依靠人民的力量。符登堡一位民主主义者在1860年写信给汉诺威的普兰克说："普鲁士大公们要领导德意志革命，他们能与普鲁士自身的、'天赐'的思想决裂吗？谁能真正相信这一点呢？谁能相信同盟的道义的力量能做到这一点呢？在任何情况下，首先都应该全部改变普鲁士政府，象50年前那样，甚至是废除普鲁士王朝。但这种废除只能由普鲁士人民进行。于是，我们只能走这条路：不要政府协助并且要反对政府。在西部和中部各邦，在广大民主派中，只能由德意志人民统一德意志的观念越来越普及，越来越深入人心。

从1860年起，在德意志各邦出现了各种体育联合会和射击联合会。他们组织各种体育活动和射击活动。他们遵照1813～1814年解放战争时代的传统。他们既进行体育活动，又对人民进行训练，以便用自己的力量求得祖国的统一和安全。参加这些联合会的有德意志各阶层的人民群众，有店主、手工业者、教师、技术员、银行职员、工商界职员、铁路员工、大学生。他

铁血与金钱

们举办体育竞赛、射击比赛，举行隆重的纪念日。各联合会加强联系，组成全国规模的德意志射击手联合会。这些联合会的领导大都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其中著名的有符登堡的卡连贝克、法兰克福的西吉斯孟·缪列尔、约翰—巴普吉斯特斯维泽等人。

体操联合会和射击联合会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性质。人们在各种大会和纪念会上，都发表纪念伟大的德意志祖国的演说，鼓舞人们的斗志。他们打起黑红黄三色旗，举行示威游行。他们还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计划由人民倡议召开德意志议会。他们设想，由联合会训练出来的“人民军队”将成为德意志议会的支柱。

1862 年 7 月 12 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全城张灯结彩，人民欢声笑语。市内最大的广场上建造了雄伟的节日大厅和能容纳 54 人的宴会厅、射击场和礼品大厅。在全城建筑物上面都高耸着巨大“德意志”雕像，庄严而肃穆。这里正召开德意志射击手第二次纪念大会。代表德意志各地的射击手 1. 2 万人参加了纪念会。纪念日历时 10 天（12—22 日）。这些天，法兰克福市万人空巷，热闹非常。

参加纪念大会的除德意志国内的射击手外，还有海外德籍人士，美洲的德意志射击手回国参加射击纪念节，瑞士也派出千人代表团。纪念会的主席是法兰克福市的民主主义者西吉斯孟·缪列尔。射击手的游行队伍，同广场上的合唱队互相配合。进行射击表演，同颁发奖旗，奖品交替进行。节日宴会隆重而热烈。代表们在宴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节日委员会委员帕森先生说："我们祝贺德意志人民的节日……在我们各族人民中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我们应当统一。"法兰克福宪法院副院长易耶格尔先生发言说："给这个节日的最高奖赏，这就是统一的思想。德意志同胞们，把这个崇高的思想带到你们的家乡去，向你们的同胞说，你们在法兰克福会见的，不是奥地利人，不是普鲁士人，不是巴伐利亚人，不是什瓦本人，不是萨克森人，你们会见的只有德意志人，只有团结在黑红黄旗帜下的同胞！"

参加法兰克福纪念节的各界人士，都把统一德意志的希望寄托于人民自己去争取。他们宣布说："尽快地复兴德意志，要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依赖王公，

依赖人民来恢复德意志统一万岁！”舍尔兹—清里奇说：“只有当人民自己把自己最神圣的利益把握在自己手中时，只有当人民自己在其自由和统一的问题上表现出政治首创精神时，只有在这时，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来自美国费城的德意志射击手代表哥列塞尔先生向德意志射击手们赠送星条旗，并且发言说：“你们将怎样取得德意志统一，我不知道。而我们希望你们用和平方式取得。但是如果内部和外部的障碍——但愿没有——迫使你们拔剑出鞘，扛枪上战场去夺取统一的话，那就请你们想起现在这个时刻，想真从海外赠送给你们的作为统一标志的旗帜，并在把所有36个部族统一起来的这面旗帜下，在黑红黄旗帜下前进！”

哈诺的科林先生发言说：“两年前，人们就谴责德意志青年，说他们远没有掌握1813年青年们所具有的那种卓越的射击术。我们德意志青年，理解这种责备。他们急速地走上了体操场，在那里锻炼自己的手臂，冶炼自己的心胸，直到自由思想和统一我们祖国的思想渗透他们全身。是的，我们的青年都懂得黑红金黄色，是

无数个家族用鲜血凝成的，也懂得把这面旗帜的颜色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它标志着 1848 和 1849 年进行斗争的人们所受的灾难。射击手们，朋友们，你们可以相信，因为我本人也是体操手。我们德意志青年所等待的，只是他们应该显示自己战斗决心的时刻。他们期待着，他们将能在山上重新点燃起射击信号的时刻。那时重新喊起来的呐喊声将响彻德意志民族：我们自由了！（好！）我们德意志青年们等待着那个时刻，到那时，我们将把德意志议会的代表们看成是我们的领导者。”

他们以 1848 年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自居。特里尔的卡尔·格伦先生发言说：“啊，1848 年是一个重要的、节庆的、最为神圣的、欢乐的年代！朋友们，弟兄们，那时候我们就为将德意志变成自由、伟大的德意志所要做的一切奠定了地基，这个地基的基础不是尸体，而油灰则用的是血。（好！）诸位，我们不会忘记我们的前辈在人民解放事业中的功勋。为表示我们坚决认真地继承我们伟大的死难者的事业，我号召你们从原地起立，脱帽高呼：已故者仍然活在人间！”

他们的斗争目标是恢复 1849 年帝国宪法。

库尔黑森的奥久斯先生说："请注意，我们有一部宪法，它象目前的宪法一样，是完全合乎法制的，这就是德意志帝国宪法。应该重新给我们这部宪法。我们要向这部宪法献出我的'万岁"。"他们要求召集人民议会。法兰克福的什威林先生说："如今，我们唯一的口号，我们的目的，就是由德意志人民用普选办法产生议会。未来的德意志议会万岁！"

统一德国的纲领和策略

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统一的策略：赶走各国君主，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

1859年意大利战争开始后，恩格斯写了《波河和莱茵河》，驳斥了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的论点，同时指出："我们德国人如果以波河、明乔河和艾契河以及所有意大利的废物换来德国的统一，那就是作了一件漂亮的生意，因为统一会使我们不再蹈华沙和布隆采耳的复辙。"恩格斯在文章中预料法国拿破仑第三在意大利战争后会入侵莱茵河。他说："在德国，大家凭本能正确地认识到，波河只是路易·波拿巴的借口，而莱茵河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他的主要目标。"恩

格斯指出："谁都不能肯定说，欧洲的地图已经最后确定。""如果欧洲的地图要重新绘制的话，我们德国人有权要求得到公平合理，不能再像以往所常发生的那样只让德国做出牺牲，而所有其他国家则在这样的重新瓜分中光占便宜，不牺牲任何东西。"

1859年法意对奥战争后，法国占领了萨瓦和尼斯两省。1860年2月，恩格斯写了《萨瓦、尼斯和莱茵》一文，再次驳斥了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的论点，指出："说莱茵河受到威胁，其目的在于保持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文章着重指出，俄国和法国的结盟其目的和基础就是瓜分德国，保持德国的分裂局面。恩格斯系统地论述了沙皇俄国干涉德国内政、瓜分德国和种种罪行。文章指出："就是现在，我们还受到法俄同盟的威胁。"他表示："我们希望德国能迅速地手持利剑来回答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能团结一致，就一定能把法国的御用军和俄国的'毛虫'一起驱逐出去。"

1860年4月，马克思写了《柏林的情绪》一文，对德国革命形势做了估计。他指出："现时的柏林——恐怕巴勒摩和维也纳要除外——是

欧洲最革命的城市。风潮遍及所有阶层的居民，而且看来比1848年3月的日子更强大有力。”最重要的是1860年5月1日马克思写了《为拿破仑在莱茵河上的未来战争作准备》一文。马克思首先指出：“此间社会上所有各阶级中盛行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路易·波拿巴正打算把德国问题提上日程。”并预言路易·波拿巴（巴黎人称他为巴登格）确定要在莱茵河上进行战争。文章指出，随着维拉弗兰卡和约的签订和萨瓦被兼并，法国在莱茵河上打胜仗的机会增加了。马克思指出：“难道路易—波拿巴不是已经在故作坦白的时候透露出几句话，说他知道德国需要统一，他就是可以使它统一的人，并且说用莱茵河各省换取这样珍贵的东西代价不算过高吗?”马克思在文章中论述了小德意志派。他说：“谁能相信，普鲁士政府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所想到的唯一办法，竟然是重新搬出建立以霍亨索伦王朝的一员为首的小德意志计划……”

1861年1月，恩格斯写了《德国的运动》一文，对德国革命形势做了估计。恩格斯认为，随1861年而来的震荡还是不够的。恩格斯指出，世界各地革命都在发展，如美国内战、中国太平天

国革命、奥地利帝国在崩溃、匈牙利处于公开革命前夕，加里波的发表了解放威尼斯的宣言等等。恩格斯断言，所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即将发生的将是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斯坦问题。恩格斯预言，普鲁士将面临对法国和丹麦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爆发必将引起德国革命。恩格斯说："这场大战是否在今年春天发生，还说不定。但是，这场战争如果发生（虽然哪一方都不值得同情），结果一定要发生革命，不管哪一方失败都一样。如果路易·波拿巴被战胜，他的王位必将垮掉。如果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败北，他们就不得不在革命面前退却。"

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预料，法国对莱茵河地区的入侵，必然会引起德国民族运动的高涨，从而在击败外国侵略者的同时，把对外战争变成国内革命，推翻各王朝的统治，建立统一的国家。他们号召德国人民："为了抵制外国的侵略意图，或者为了内部的统一和自由的成功，德意志应从内部消除王朝的统治。"

他们预料德国革命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即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普军退却，南德意志各邦君主叛变，这将使德意志各邦王朝

土崩瓦解，并可能在推翻法兰西第二帝国方面起推动作用。第二种情况，即在最不利情况下。运动的领导权被各邦君主掌握，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君主们积极或消极的叛变同样会引起德国革命，赶走所有君主，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

拉萨尔的口号：既没有奥地利，也没有普鲁士

1859年，当法意对奥战争开始的时候，拉萨尔写了《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一书，支持普鲁士用武力统一德国。

他认为，意大利进行的战争是最正义最神圣的战争，是为民主的独立和生存而战，它反对最强大的敌人，即专制的奥地利。他以1813年普鲁士同俄国结盟为例，说明法国拿破仑第三同撒丁王朝结盟援助意大利是容易理解，是合法的。他认为民族自由独立原则是整个民主概念的基础、由来、出处和根源，论述了民族自由原则和民主原则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着重揭露奥地利，认为奥地利与它的各族人民对立，倡导野蛮的原则。他批评《国民报》宣扬的“欧洲地

图不可修改”的原则，指出这是一条愚蠢而极其反动的原则，它维持一个腐朽的现状，代替合理的、及时的革新。他专门论述了反对路易·波拿巴的问题。他把路易·波拿巴的法国同奥地利相对比。着重揭露奥地利的反动。他认为，奥地利代表的是一个本身坚定的和始终一贯的反动原则。因此奥地利一向是自由思想最危险的敌人。路易·波拿巴是一个专制者、一个暴君，但他的统治赖以支持的却是民主原则。

他认为，一向阻碍德国统一的不是别的，正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两邦分立。他认为，德意志联邦没有建立统一的德国，它只不过是德国不统一状态的有组织的形式而已。他认为，德国统一之所以不可能，是由于两国的实际势力地位彼此均衡的缘故。他提出，究竟怎样才能最后达到德意志统一的乐土呢？他的回答：“既没有奥地利也没有普鲁士”。即必须把奥地利撕裂、肢解、消灭、粉碎，必须让它的骨灰随风四散。他认为，奥地利被消灭了，普鲁士就和德国相等了。

在谈到他的统一德国的纲领和普鲁士的任务时指出：

要是普鲁士说下面的一段话，这也许是唯

一的、有价值的和伟大的、既符合德意志民族利益也符合普鲁士利益的态度：

“如果拿破仑在南面按照民族原则修改欧洲版图。那么，我们就在北面修改它。如果拿破仑解放意大利，那好，我们就把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拿过来！”

随着这一声明的发表，我们的军队就派去攻打丹麦！

接着拉萨尔分析了欧洲的形势，认为当时有利于普鲁士用武力统一德国。

他认为，拿破仑在这场战争中不可能采取反对普鲁士的立场。一方面，意大利有足够的力量需要他去打垮，国内有足够的势力需要他去镇压，他又没有一个带有民族性质的口号煽动法国人民反对普鲁士；另一方面，拿破仑除了用外交方式外不能用其他方式反对普鲁士。他不能对普鲁士进行战争，因为普鲁士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所做的正是他在意大利所做的事情。拿破仑不能在同一时刻既维护又违背自己的宣言行事。

他估计，英国充其量只能用外交方式反对普鲁士，顶多提提抗议而已。因为英法矛盾的加

剧，它不可能同德国这个唯一的同盟者疏远而陷于孤立。

他认为，俄国是唯一可能成为真正抱敌对态度的国家。但他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假如俄国看到普鲁士以令人慑服的威力和决心，没有任何外交上的示弱表现而行动，看到它的事业完全依靠人民的热情的话，它是否在最后时刻不退却，是值得怀疑的。

他表示，不管外国对这一民族的切身业来抱什么态度，德国是终于能够不顾外国而亲自处理它自己的事务的。

他说："希望普鲁士政府，迅速地，毫不迟疑地，独立地，不惜用任何联盟阴谋，开始这场民族战争。"

他最后表态说："希望政府确信这一点。在这场既符合德国人民又符合普鲁士切身利益的战争中，德国民主派自己将打起普鲁士的旗帜，用只有民族热情激烈地勃发才能产生的膨胀力量去扫荡它面前的一切障碍。"

从1856年起，德意志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民主派都相继发表谈话，支持普鲁士统一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领导人温卢的话具有代表性。他说："公认的是：旧的关于大德意志和小德意志的争端是徒劳无益的。只有革命才能使奥地利的德意志省份和它分开，但是德意志革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削弱实力，并且可能引起瓜分德意志，就像昔日瓜分波兰一样。因此，德意志的统一，现在只能以普鲁士为首，才是可以想像的，并且甚至在普鲁士政府还不具有必需的毅力和决心时，也需要按照这个精神行动起来。"

从1859年6月起，德意志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就召开各种集会，要求改组德意志联邦。1859年7月17日，革命民主主义者在爱森纳赫召开会议，领导人是舒尔兹—德里奇。第三天，即7月19日，由鲁道夫。宾尼克逊领导在汉诺威召开自由派或立宪派会议，宾尼克逊领导在汉诺威召开自由派或立宪派会议。两个会议内

容虽然不同，但都提出把强大的中央政权归普鲁士并成立德意志国会的要求。1859年8月14日，两个会议的参加者在爱森纳赫召开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致德意志祖国的一切属于民主党或立宪党的朋友们》的宣言，号召将德意志统一摆在党的一切要求之上，并号召建立全国的统一的民族政党。它应根据爱森纳赫和汉诺威两次会议的精神，进行德意志联邦的改组。会后，他们在全国各地展开积极的宣传活动。

1859年9月15—16两天，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召开德意志自由派和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决定成立民族联盟。参加民族联盟的主要是中德和北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包括工业家、商业家、新闻记者、律师、教授、教师等2.5万人。汉诺威的自由派鲁道夫·宾尼克逊被选为委员会主席，温卢、叔尔兹—德里奇当选为委员。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翰·米开尔在联盟中起重要作用。

民族联盟是全德唯一全国性的政治组织，它提出了自己的统一德国的纲领。他们要求迅速地改组德意志联邦法案，成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统一管理全德的军事、外交和商业税务，

召开全德国会。纲领提出，从事这项工作的不应当是人民，而应当是普鲁士。民族联盟成立前，汉诺威自由派在一项会议宣言里宣布说："暂时在德国人民对宪法改革没有绝望、也没有在革命的高潮中找到摆脱内外危险的办法的时候，必须使两个德意志大国来着手实现我们联邦机构的改革。但是奥地利不能做这件事。它的利益不是纯德意志的，而且任何时候也不能成为这样。""因此，我们把我们的希望转向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的目的在本质上是与德意志的目的相符合……因此请普鲁士不再拖延，请它公开转向政府的爱国感和人民的民族精神，并在最近时期就采取步骤，促使德意志国会的召开，并在欧洲爆发新的、以更大的危险威胁无准备的而又分散的德意志的斗争以前，把德意志的军事、政治力量变成更统一的组织。"

民族联盟希望出现普鲁士国弗里德里希二世即弗里德里希大帝那样的领导人，用强力统一德意志。温卢说过："有一位顽强的人物领导普鲁士，一切危险就将成为过去，伟大的未来是广阔的。"他们认为，俾斯麦就是这样的人物。1859年俾斯麦在同温卢谈话中就阐述他统一德

国的观点。温卢认为，任命俾斯麦为外交大臣比什赫尼兹更合乎理想。温卢以民族联盟领导人的名义向俾斯麦声明说："对于我和我的朋友，民族问题是处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并且排斥任何次要的思想。由此，你可断定，如果真委托你为外交大臣，我们（包括宾尼克逊在内）将会真诚地高兴。普鲁士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多地需要明确的、坚强的和勇敢的政策。最勇敢相应的就是最安全。"

进步党统一德国的纲领：统一和改革

在1861年，德国争取统一和自由的斗争高潮中，在普鲁士成立了进步党。它是根据青年立陶宛小组的创议而成立的。青年立陶宛小组是普鲁士议会内的反对派。他们之中有1848年革命中著名的民主派人士雅科比、瓦尔德克、叔尔兹－德里奇等人。他们反对议会中温和派领导人乔治·芬克的优柔寡断，缺乏主动精神。他们主张采取议会所能采取的一切手段，恢复法制和权利。他们主张，普鲁士议会不应等待政府进行改革，应该更加主动，刚毅而无畏地推动政府

进行改革，在普鲁士实行立宪和法制。

进步党成立后很快发展全普鲁士的组织，普鲁士各地的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进步党。其中有工厂主、商人、银行家、自由化地主、律师、教授和医生。领导人有叔尔兹—德里奇、温卢、律师福肯贝尔、高维尔贝克男爵、工厂主维尔涅西门子、医学教授路德·维尔霍夫、柏林银行家阿达尔伯特·杰尔布留克、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莫姆金等人。他们都是资产阶级自由派，而不是革命派。他们称自己的政党为进步党，而不称为民主党。

他们认为，统一德意志是普鲁士的历史使命。工厂主维尔涅西门子，既是民族联盟的领导人，又是进步党的著名活动家。他积极参加争取德国统一的斗争。请看他同法国拿破仑三世的信徒、法国电讯事业总监德伏奇的一段谈话：

德问：德国人究竟要怎样？

西答：一个统一的德国。

德问：您以为法国能够容忍在它的国境上组织一个人口超过它的统一的国家吗？

西答：不，我们深信，我们只有抵抗法国，才能保护我们的统一。

德说：德国联合起来对我们作战，想的是很不错的。巴登、符登堡、整个南部德国，都要同我们一道对普鲁士作战。

西说：这一次不然了，法国的头几次炮声就要使德国统一起来了，所以我们不怕法国人的攻击，都有良好的勇气等待它。

西门子希望德国统一，但他当时还不相信普鲁士能够承担起统一德意志的重担，因为奥尔缪斯之耻还记忆犹新。他在回忆录中说："虽然对普鲁士的希望还存在，但所有的人都已不再信任普鲁士国家会取得德意志的统一，并把自己的一切希望寄托于自由主义方式在德国，特别是在普鲁士人民中间的最终胜利。"

进步党希望有一个自由主义的普鲁士，希望普鲁士进行改革。他们在1861年6月公布了自己的纲领。他们立誓忠于普鲁士的钦定宪法和三级选举制，没有提出普遍、平等的选举权。他们只进行宪法允许内的斗争，反对任何议会外的群众革命行动。但是，他们要求普鲁士进行改革，要求把全德政权交给普鲁士，召开全德国会，以实现全德国的统一和巩固。在普鲁士内部要实行英国式的责任内阁制，颁布责任内阁法。

要从根本上改革贵族院。在社会上要消灭各种不平等的等级制残余，取消领地警察，实行地方自治原则。法院独立，对政治案件和出版案件要实行陪审制，恢复公民婚姻和世俗教育。在军事上同意增加每年的新兵征集，但要保留两年兵役制和后备民兵制。

进步党要求普鲁士进行改革，但不敢发动人民革命，主要采取宪法允许的范围内，首先是使用国会批准国家预算的权力，作为实现其纲领的手段。他们制定的纲领规定："在立宪国家里，只有勇敢地彻底地和顽强地利用赋予人民的宪法权力才能达到。"一位进步党人在评论中说："我们不打算从原则上采取反对现政府的反对立场，但是我们应该肯定说，最近三年没有做足够的工作，以便把必要的改革付诸实施。应该说，遵守在最近几次选举中作为指导的措施和不急于实现这些措施的号召，是太长了并且是无例外地执行了。我们认为，新的议会应该坚决掌握主动权并很好行使自己的宪法权利，以便与强有力的政府并行巩固的和具有充分活力的社会生活，与秩序并行巩固进步的发展。"

普鲁士当局改革联邦的方案：同各邦君主协商，改组联邦

普鲁士国王弗·威廉四世和他的宫廷党、曼推菲尔—盖拉赫集团，经过了奥尔缪斯之耻，50 年代对于德意志国家统一和德意志联邦的改革采取保守主义立场。他们把反对革命作为首要任务，关心各邦君主制的不可侵犯性。对外，他们采取亲奥地利的立场，认为奥地利是欧洲一切保守势力反对革命的堡垒。他们拒绝同法国接近，认为拿破仑第三政权是合法的波旁王朝的"篡位者"和"革命者"。他们反对德意志各邦君主采取敌对态度，坚持维护各邦君主利益的君主主义原则。

1858 年秋，弗·威廉四世患脑软化症，不能亲理国事，他的弟弟弗·路·威廉亲王任摄政。1861 年弗·威廉四世逝世后，威廉亲王正式登上普鲁士王位，称威廉一世。

这时国内国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德意志和其他国家的民族运动重新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威廉一世同样希望改组德意志联邦，加强普鲁士的霸权。威廉一世很欣赏民族联盟领导

人对奥地利的批评和对普鲁士的颂扬。他认为改革民族宪法是一项民族要求，是完全正义而合法的。他支持民族联盟，反对各邦君主提出禁止民族联盟活动的建议。他写信给意大利的阿尔伯特亲王说："在意大利，人民只要求适当的改革时间，很可惜，君主们不善于及时地改革。这些君主们不善于及时行动起来，就可能使他们有被推翻的后果。这种情况可能会打开德国许多君主的眼界！相反地是，他们都将永远是瞎子。"

但是，威廉一世并不同意民族联盟提出的统一德国的道路。他不满意民族联盟领导人对各派君主的轻蔑态度。他写信给艾伦斯特伯爵说："我不能效法，企图在不尊重德国大公们的权力和利益的情况下，建立统一倾向。如果民族联盟从语言和行动上采取旨在反对我的观点的举动，那时我感到自己就应当反对它……例如如果关于召开某种预备会议的要求被接受，我就肯定要反对，因为这就会是可耻的1848年原则的重复。"

什德丁居民向威廉一世提出请愿书，要求建立强大的全德中央政权，召开全德意志国会。

威廉一世答复说，要局部地改善现行的联邦法案，首先要取得德意志各邦大公们的同意，并诚恳地尊重各邦利益的前提下，改革它的军事机构。政府关心在能够取得实际成就的领域内发展全德的普遍利益，首先是巩固祖国的武装力量，要比作出过早的关于改革联邦宪法的建议带来更多利益。”

俾斯麦同施莱尼茨的辩论

奥托·冯·俾斯麦在任普鲁士驻联邦议会大使时期，形成了他自己对德国统一的看法。

1859年，普鲁士最高领导拟定请俾斯麦担任外交大臣。因此摄政王召开御前会议，参加人有冯·霍亨索伦公爵、鲁道夫·冯·奥尔斯瓦德、施莱尼茨和俾斯麦。由俾斯麦阐述他对普鲁士外交政策的纲领。俾斯麦主要谈了下列4点：

第一，他首先指出：“我国政策最软弱的方面就是对奥地利的软弱无能。我们的政策，从奥尔缪斯协定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即在意大利危机时期，是被这种软弱所支配。”

第二，他谈到对德意志国家统一的看法。他

说："如果我们能和奥地利协商一致解决德意志的任务，那当然最好不过。但是，只有使维也纳相信，在相反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惧怕决裂和战争，才有可能。"

第三，他谈到同俄国结盟问题，他说："保持为我国政策所希望的与俄国的联系，在同奥地利对抗的情况下比同奥地利合作的情况下反而容易。但是据我对彼得堡宫廷及其中各派主要势力了解的情况看，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也并非决不可能。由于克里米亚战争和波兰骚乱，他们欠我们的帐，只要巧妙地加以利用，我们就可能既和奥地利达成谅解，又不致和俄国决裂。我所担心的是，与奥地利谅解由于那里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而过低估计普鲁士的力量而将会归于失败，至少只要奥地利不相信我们可能的决裂和战争已做好充分准备，是不会成功的。"

第四，他谈到奥地利对普鲁士的一贯政策。他说："鉴于近几十年来我国执行的那种政策，维也纳已不相信可能出现那种前景；在那里，人们早已习惯于奥尔缪斯协定所造成的状况，把它视为持久不变的状况，而没有看到，或者早已忘记，奥尔缪斯协定之所以产生，主要因为当时

基于人物分散而造成一时不利于我们的情势，还因为在奥尔缪斯协定时期俄国实力的全部重量都加大天平盘上的奥地利这一边这一事料。而在克里米亚战争以后，俄国的力量就不再加在那里了。但是1856年以后奥地利针对我国的政策依然苛求无厌，和过去尼古拉皇帝站在他们一边反对我们的时刻完全一样。如果我们屈从于奥地利的妄想，倒使人想起用粉笔画圈子把公鸡圈起来的实验。奥地利的自信、善于巧妙地利用舆论和一大笔秘密基金，这一切使布奥尔伯爵坚持奥地利的幻想，只要普鲁士准备冲破粉笔画的魔术，他也无视普鲁士所处的强有力的地位。”

俾斯麦发言后，施莱尼茨反驳俾斯麦的看法。他说：“如果我们不同奥地利保持关系（虽然这种关系使我们有正当的理由感到痛苦），我们就会遭到来自西方（巴黎）和我国内部的疑虑和危险的威胁。”施莱尼茨还谈到俄法结盟的危险将会发展。而普鲁士同法俄结盟则要受到舆论的谴责。

威廉摄政王最后表态说：为遵从祖辈传统，他决定赞同施莱尼茨的观点。

奥托·冯·俾斯麦没有授命担任大臣的职务。他在同罗昂和其他人的通信中，纵谈普鲁士的对外政策，批评它的缺点，主张进行改革。他给罗昂的信说：

“根据我的印象，迄今我国政策的主要缺陷就在于：我们在普鲁士是自由主义的，而在对外却是保守的，廉价地看待我们的权利，而过高地看待外国君主的权利。大臣们所主张的立宪方针和陛下个人意志赋予我国外交政策的正统主义方针这两者的二元领导的必然后果就是如此”。俾斯麦指出，普鲁士需要实行另一种色彩的对外政策。他指出，我认为只有我国对外政策的立场发生改变，国内的王权才能摆脱事实上不能长期抵抗的压力，虽然我不怀疑现有的抵抗办法也足够应付。”

俾斯麦认为，“由于我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我国的德意志政策缺乏独立性和能量，国王的权威蒙受到损害。公众对于军队和军官的不公正意见，他们对于军事措施和军费开支的反

对，其根源就在于此。”俾斯麦纵谈历史，从大选侯到弗里德里希大帝，赞扬他们的主动精神。俾斯麦分析了普鲁士对外政策失误的原因。第一是由于亲戚感，君主家族关系的亲热掩盖俄国的罪孽。第二，由于软弱者对于较强者习惯性的依赖。第三，还由于错误的认识，似乎尼古拉一世对我们也怀有亚历山大一世同样的情感。

俾斯麦对普鲁士国力进行了评价。他认为“在1866年以前，我们只能有限度地称自己为大国。”他指出，在1856年巴黎和会上是通过献媚奉承获得外国对这一资格的承认。他说：“我们承认，为了自觉是大国，就需要其他大国的证明书。”但是普鲁士当时还没有达到无需他国承认，就已显示出一个大国的标准。他认为，欧洲早就承认普鲁士是一个大国，但是由于普鲁士本身多年来推行怯懦的政策，致使普鲁士遭到削弱，这种削弱最终从曼推菲尔在巴黎扮演的那种可怕的角色表现出来。一个大国需要别人承认自己的大国地位，首先需要自己深信和承认自己是个大国。

俾斯麦指出：“克里米亚战争以后，紧接着出现的有利于我国政策的形势是由于意大利战

争造成的。”他指出，当时的执政者并没有利用这种形势。当时的执政者观察形势不是从进取的普鲁士政策的观点出发，而是从一种人们所习惯的企图出发，即：博得满意各邦君主、奥地利皇帝以及德国舆论的赞赏。还从一种模糊的企望出发，即凭借对德国的忠诚获得一种理想的道德上的酬谢；而对于目的轮廓、达到目的方针和方法全无明确的认识。

联邦体制的改革和反改革

普鲁士、奥地利和德意志中小邦君主都看到德意志联邦的改革势在必须，但都想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进行改革。

1859年末，普鲁士摄政王向联邦议会提出军事改革方案。主要内容是：在奥地利和普鲁士都用自己的全部军事力量参战的情况下，奥地利指挥南德两个兵团，普鲁士则指挥北德的两个兵团。

奥地利坚决反对这个改革方案。维也纳外交大臣莱赫别尔伯爵说：“北德意志各小邦归根结底要服从普鲁士的最高统帅，但是，在南德

巴伐利亚为反对从属于奥地利而设置了不可克服的困难。各中小邦君主更要保持自己特权，要求分权最高统帅。”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连表示：“巴伐利亚，无论如何是德意志的第三大国，就是我也不容忍让奥地利和普鲁士牵着鼻子走。”联邦军事委员会作出决定：“修改联邦军事宪法的固有的一般基础，没有任何必要。”委员会以多数票对一票（普鲁士）建议联邦议会拒绝普鲁士的建议。

艾伦斯特·科布尔克公爵在回忆录中说：“萨克森和汉诺威相当公开地宣布，他们认为，旧的联邦组织，对于满足德意志的真正需要来说，完全是良好的，够用的……他们几乎不掩饰自己对普鲁士的任何加强的深深厌恶。他们认为，威廉亲王的改革方案是对德意志基础的危险的震动，于是坚决拒绝。”

1860年6月，普鲁士摄政王在巴登同德意志各邦君主会晤。符登堡王国国王说：“为了更好地同革命分子进行斗争，普鲁士要给予我们保证乃是必要的。”巴伐利亚国王支持他说：“是的，这是我们的热切愿望。”符登堡国王继续说：“首先，问题在于这些人所共知的联盟。不能否

认，这些联盟向群众抛出了危险的信号，不管他们希望这个，或者不希望这个，但是他们在群众中传播这种叛乱的思想。”

威廉摄政王安慰各邦君主说：“对于我努力团结德意志人民力量的忠诚，不能存在任何怀疑。他们没有动摇包括德意志各邦人民一切权利联盟的目的。我不止一次地宣布过，联邦的改革，只有在诚恳地尊重各邦利益的前提下才能成功，并且我的政府的最后行动，对于在现时我不认为这种类似的改革是适时的这一点，没有留下任何怀疑。”事实上，摄政王这些话正表明他还没有决心和信心进行德意志联邦的改革。

1861 年 9 月，在奥斯坦会晤时，巴登大公向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提出改组德意志联邦方案。这个方案是由他的大臣冯·弗兰茨·罗根巴哈男爵制定的，故称罗根巴哈方案。主要内容是，建立以普鲁士中央政权和国会为领导的狭隘的联盟，包括奥地利在内，国会由人民选举。这个方案类似 1849 年 5 月 26 日三王联盟的方案。类似之处在于，加入这个狭隘联盟的邦国要听从德意志君主的自由裁决。

普鲁士当权集团围绕这个方案进行讨论。

外交大臣施莱尼茨反对这个方案，因为这个方案将使普鲁士政府屈从德意志国会，这是不能容忍的。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阿尔布希来特·贝恩斯托夫则表示赞成。普王威廉一世支持罗根巴哈方案。他打算同各邦君主协商改组德意志联邦。10 月 12 日，他撤消了施莱尼茨外交大臣的职务，由贝恩斯托夫接任。贝恩斯托夫是位保守党人，他主张普鲁士在德意志扩张。就职之前，他在给国王的备忘录中提出，普鲁士的德意志政策的目的不仅在于在狭隘的德意志联盟内的军事领导地位和外交代表权，而且在普鲁士确立执行权以后要在伯林召开由普鲁士国会和各邦议会组成的全德国会。民族联盟的领导人支持这个计划。

以奥地利为首的各中等邦群起而攻之。1862 年 2 月 2 日，奥地利、巴伐利亚、符登堡、萨克森、汉诺威、达姆施塔特、拿骚等七邦政府分别向普鲁士递交内容相同的照会。照会都是用侮辱的口气指出，任何联邦改革的原则都应是现有统一的德意志联邦法案的本身的发展，这就使普鲁士遭受第 2 次奥尔缪斯之耻。

各中等邦国力求维护自己的特权。1861 年

10月15日，萨克森王国外交大臣冯·贝伊斯特向德意志各邦政府提出改组德意志联邦计划。他提出用联盟会议（大臣会议）来代替联邦议会。联盟会议由德意志各邦政府代表组成，每年召开2次，每次4个星期。一次在南方的勒根斯堡，由奥地利担任主席；一次在北方的汉堡，由普鲁士担任主席。同时召开人民代表机构的会议，即德意志各邦议会代表会议，讨论有关德意志的各种问题。联盟的执行权由三人组成，形成三位一体制，即由奥地利皇帝、普鲁士国王和各中小邦选出的第三位君主。贝伊斯特的方案是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建立某种权力平衡，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保持各邦的独立和利益。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拒绝了这个方案。

奥地利当局同样在行动，力求保持它在德意志联邦中的领导地位。1862年7月，在维也纳召开了由奥地利、巴伐利亚、符登堡、萨克森、汉诺威、里森—达姆施塔特、黑森—卡塞尔和拿骚组成的8邦会议。由于普鲁士拒绝在联邦法案的基础上谈判改组德意志联邦，因此，8国会议决定向联邦议会提出召开各邦代表会议的建议。8月14日，这个提议提交联邦议会，普鲁

士驻联邦议会大使提出抗议，反对强迫它服从多数，但无济于事。9月18日，联邦议会委员会提出关于8邦提案的报告。联邦议会委员会以多数票对2票（普鲁士和巴登反对）通过决议，委员会建议联邦议会通过8国提案。接受这个提案已毫无问题。这样，普鲁士就面临着选择：或者服从多数决议，或者同德意志联邦议会决裂?!

第六章　受命组阁

“新时代”

1858 年秋，正是收获的季节。可是普鲁士国王弗·威廉四世玉体欠佳，得了脑软化症，而且病情日益严重，已经不能亲理朝政了。

1858 年 10 月，皇太子威廉以摄政王的名义接管了政权。他是普王弗·威廉四世的弟弟，1840 年立为王位继承人。1858 年任摄政时已经是 51 岁了。摄政王开始执政时，普鲁士经历了 10 年的反动统治。曼推菲尔—威斯特伐伦内阁对内恢复贵族特权，伪造选举，迫害自由主义者，宪法已变成一纸空文；对外屈从奥地利的压力，甘受奥尔缪斯之耻。王室和内阁的威信一落千丈，国内不满情绪不断增长，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激烈。

摄政王本人是位保守派和专制主义者。1848年三月革命中他逃亡英国，回国后任莱茵省省长，参加镇压巴登起义。可是，1858年任摄政王后却采取自由主义政策。他对巴登大公说："我不愿意研究是有利还是无利的问题。但是，哪里实施宪法，哪里就必须维护它，而不是用牵强的理解来捏造。我对曼推菲尔内阁用这种办法所造成的损害，已经欣赏够了。立宪主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反对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样做，必然证明政府对人民的信任。政府需要加强，但不是用这种表明不信任的限制宪法的办法，而是要用明智地削弱和紧缩借口的办法，这才能平息风潮。要加固堤岸，而不要把堤坝修得过窄或过宽，首先不要让它梗塞洪流。在英国它是过宽的，而在汉诺威和库尔黑森它又是过狭窄的。我希望在普鲁士，我们要作得适乎其中。"

他让曼推菲尔—威斯特伐伦内阁辞职，任命自由主义者安东—索伦索伦大公组成新内阁，吸收自由派著名人士卢特·奥尔斯瓦德为不管部大臣，自由派巴托夫为财政大臣，自由派什威林为内政大臣。同样保留了一些保守派在

内阁里，台尔·海特任商业大臣。希门斯任司法大臣，罗昂任军事大臣。

1858年11月8日，摄政王对新内阁发表纲领性演说：

“无论过去和将来，根本不可能谈论与过去的决裂，只是在我们看到有暴政或不合时代需要的东西的地方，需要伸出手来加以关心和改善。但是在这一点必须防止过激。要准确地履行自己已允诺的东西，不要拒绝改善，同时要勇敢地拒绝一切未允许的东西。首先，我愿意警告你们，要提防那种刻板的空话。即什么政府应该越来越多地为自由主义思想开路，因为不然他们自己将为自己开辟道路等等。”

资产阶级自由派把新政府的组成，看成是“新时代”的到来。他们心满意足了，恢复了对政府的信任。1858年11月议会选举中，他提出的纲领是：“选举自由！”“恢复公社和城市的自治！”“取消领地警察！”“颁布责任内阁法！”“取消高级贵族免税权！”甚至连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的要求都没有提出来。民主派同样欢呼“新时代”的到来。温卢、瓦尔德克、叔尔兹—德里奇、罗德伯尔杜斯、约翰·雅科比等人在选举中都

拒绝提名自己为候选人。瓦尔德克在一次选举会上说："普遍的愉快的期待，就是在将来真诚地保持和发展宪法，构成我们的政治生活的基础。""尊敬国王！尊敬国家宪法！我们愿意真诚地执行现行的宪法，并在合法的途径上和在自由主义精神中使其完善。"1858 年 11 月 5 日，哥尼斯堡民主派选举委员会发表《普鲁士大民主派宣言》，除要求选举平等外，其他要求都同自由派一致。他们已经抛弃了"1848 年的传统'，同自由派合流了。雅科比在竞选大会上说："我不否认，在 1848 年，我们党内有个别人认为采取与君主制不同的另一种统治形式，对普鲁士来说在当时是可能的。他们迷误了，并且由于自己的迷误而遭到严酷地惩罚……现在，在整个民主党中，没有任何一个人，除了君主制外，还希望普鲁士采取另外的国家形式。

1858 年 11 月选举结果，自由派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他们大力赞扬摄政王，使摄政王自身都无法承受。摄政王甚至说这样的话："我由于什么受到这样的社会赞扬?"他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走得太远了。因此，他根本拒绝进行任何改革。1858 年 12 月末，新内阁向摄政王提出实行

责任内阁法，遭到摄政王的坚决拒绝。他声称，这是英国的制度。他承认议会立法、议会监督，但不是议会制度。

如果说，“新时代”是转折的话，是自由派和民主派向右转，更加同君主制妥协了。因此霍亨索伦大公内阁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对未来毫无信心。他忧心忡忡地说：“我们站在好日子的门口，但是直到现在仍然站在门口，因为我们刚刚所经历过的黑夜是黑暗、可怕的，其后果是不可估计的。摄政亲王已前进了一大步，但他并不是破釜沉舟、坚决彻底的，因此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将来！”

是向国王宣誓效忠，还是国王宣誓忠于宪法

1861 年 1 月，普鲁士国王弗·威廉四世逝世，摄政王威廉正式登上王位，称威廉一世。威廉一世登上普鲁士王位，是臣民对他宣誓效忠，还是国王宣誓忠于宪法，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内阁和国会提出，国王应该进行忠于宪法的宣誓。这触怒了国王。他认为，他，全权的国王，

要宣誓忠于宪法，为什么全国不对他进行忠诚宣誓呢？他认为，这里隐藏着极端民主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国王只能是国家的当然公仆。他要求，按照1848年的老办法，用当时的誓词，召开各等级会议，宣誓对他效忠，只有这样的忠诚宣誓，人民才会被完全应有的忠诚和驯服的诺言所约束。对国王宣誓效忠，显示着虽然有一部宪法，但王权仍旧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专制政权。

大臣们不敢拒绝对国王宣誓效忠，他们建议举行没有誓词的宣誓典礼。同时提出，除国会外，任何其他会议都无权成为普鲁士人民的代议机构。

就宣誓问题国王和内阁之间的争论已经达到如此尖锐的程度，内阁请求辞职、国王也宣布，不希望用任何形式拒绝宣誓，否则他将退位，因为没有忠诚宣誓，王位的地位和作用就被削弱了。

军事大臣罗昂向国王建议更替内阁。他说："国王不能让步，除非把自己和王位都断送掉。""让上帝保佑，别让他让步。他若让步，我们就要满帆航行在国会制度的泥泞大海里了。"罗昂达到了目的，国王让他选择新内阁成员。他提出

的第一名就是奥托·冯·俾斯麦。

1861年6月27日，罗昂写信给俾斯麦说：

“关于目前严重的忠诚宣誓问题，整个情况你大概已经了解。事情已经激化到决裂的程度。国王不把自己和王位永远毁掉是不会让步的。大多数大臣同样不让步，不过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是不道德的剖腹自杀，在政治上毁灭自己。”

罗昂说：“昨天国王终于允许我为他物色其他的大臣。他的看法令人不安。他认为除施塔尔和某某外，再没有人同意在国王登基时举行忠诚宣誓。”

罗昂问俾斯麦：“请问，您是不是认为可以把历来的对君主的忠诚宣誓视为对宪法的攻击呢？如果您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就自认错了，因为我设想您的看法和我是一致的。如果您赞同这一看法，并且认为，我亲爱的伙伴们认为自己不能云云，是一种教义上的狂想，是遵循一种政治义务和一种党派的政治立场的结果，那么您也将没有犹豫地向国王进谏并且以适当的方式解决忠诚宣誓了。”罗昂在信中还问：他是想接替施莱尼茨的职位，还是接替什威林的职位。罗昂最后说：“时局令人担忧，国王苦恼

不堪。他家族最亲近的人都反对他，劝他委曲求和。上帝保佑，不要使他退让。只要他一退让，我们就会扬帆驶入议会主义统治的泥泞大海中。”

7月2日，俾斯麦给罗昂回信，表达了他对宣誓争论的看法。

第一，他说：“关于忠诚宣誓的争议，我不理解它对双方怎么竟会这样重要。如果国王按照传统的形式接受忠诚宣誓，那么我毫不怀疑国王的行动决不与宪法抵触。国王有权在他所喜欢的时间和地点让他的任何一个臣民、王国的任何一个团体作忠诚宣誓；但是如果有人对我们的国王想要行使并可以行使的权利有争论，那么我就义不容辞，要来捍卫这种权利，虽然我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举行这种仪式的重要性。

第二，随后他谈到对普鲁士内外政策的看法。他认为，普鲁士对外政策是保守的。他认为，只有改变对外政策，才能摆脱国内对国王的压力。他赞成解散议会的主张。他说：“但是在大多数人强烈的越轨行为之后，适时解散议会仍然不失为能使正常的血液循环得到恢复的十分

完善的、也许是最正确的一种方法。”

威廉一世没有接受罗昂和俾斯麦的强硬路线，他不愿意触怒全国，最后以国王和大臣们的妥协而结束。不进行对国王的忠诚宣誓，而是举行隆重的加冕典礼，这是普鲁士古老的登基典礼，既保卫了王权，又捍卫了宪法。1861 年 10 月 18 日，普鲁士国王在哥尼斯堡举行加冕典礼。加冕典礼充满了古老的色调，表明普鲁士王权的连续性。他对议会代表说：“普鲁士统治者是从上帝那里得到自己王位的，即上帝恩赐王权，王权的神圣性就在于此，它是不可侵犯的。”

军事改革

威廉一世即位后，着手进行军事改革。

普鲁士现行的军事制度是在反拿破仑的战争中形成的。它实行义务兵役制，每名士兵在常备军中服役 3 年，再在后备军中服役 2 年，然后再在常备民团中服役 14 年：第一次征召的常备民团服务 7 年，第二次征召的常备民团再服役 7 年。战时，由常备军、后备军和第一常备民团组成作战队伍，第二常备民团用于要塞保卫。这种

制度具有广泛的人民性，它使军队同人民群众广泛地联系起来，是反拿破仑解放战争胜利的原因之一。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形势的变化，这种军事制度也暴露出它的弱点。例如，在1859年法意对奥战争中，普鲁士也把大批军队集中到国境线上。因而在国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混乱。首先，大多数民兵都有家眷妻子儿女。参战后他们的家庭只能由公家供养。据统计每个家庭每月平均需要3塔勒。动员8个地区所有第一常备民兵国家每月要负担26.5万塔勒，每年需要300万塔勒。其次，征召常备民兵给工业、商业、农业带来巨大损失，无法用数字计算。

常备民兵的存在使普鲁士统治者常常感到恐惧，因为它使人民掌握了武器。罗昂将军这样说："如果你不是自己王朝的主人，在政府与被统治者或其一部分发生每一次冲突时，就必须估计和确定，可能引起人民武装部分即常备民团给予政府内外措施以攻击的效应。"文德温·曼推菲尔将军在1851年对国王弗·威廉四世说得更清楚："危险的不可容忍的情况是，使普鲁士及其王朝的命运多少从属于5万青年农民

的意志。”因此长期以来，普鲁士王朝及其统治者就力图取消常备民兵这种制度。

解放战争年代的三年兵役制在30年代已改成了两年。两年的兵役制已经满足不了军队人数和军事训练的需要。而且同人口增长的比例不相适应。1815—1820年普鲁士人口为1000—11000万，每年征召新兵4万人，正适应服役的20岁的青年。可是，1858年普鲁士人口为1800万，20—24岁青年为778454人，绝对符合服军役的为11万。每年征召的仍然是4万，只占适龄青年26%。这样，一部分应征士兵几乎要终生在军队中服役，一部分则根本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改变这种兵役制，受到军事预算的限制。因为1820年普鲁士国王弗·威廉三世允诺，没有未来的人民代表机构的同意，不能征收新税，从而也不能增加军事开支。因此，改革征兵制度，增加军事预算，必须议会批准。同时，普鲁士的军事装备、军事训练和武器同样需要改革，军官队伍需要清洗，清洗那些不称职的军官，使军队年轻化和现代化。

早在1858年6月，摄政王威廉就委托罗昂起草《对祖国军事组织的意见和方案》。论述了

军事改革的主要思想："最合理的是，把军队的平时编制增加一倍，同时从作战部队中取消第一次征召的常备民团，将来在后备军中给所有常备民团安置位置并且用它配备要塞卫戍部队。"摄政王威廉又补充了第三点，即兵役制改为三年。这样常备军可以增加一倍。摄政王说，只有三年兵役期限，才能训练出不是执行自己的意志，而是驯服地服从司令官的指示的有纪律的士兵。

罗昂对军队装备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在武器方面，用针发枪代替了后腔枪，用来复线大炮装备了3/5的陆地炮兵部队。1861年颁布了新的野战操典，废止了1847年的操典。从军队中清洗了年老的不称职的军官，任命年轻的海尔穆特·毛奇为总参谋长。

罗昂的军事改革方案遭到军事大臣波宁的反对。1859年11月28日，波宁辞职，摄政王任命罗昂为陆军大臣。1860年2月12日，罗昂向议会提出军人义务制的新方案。罗昂的方案规定，在常备军中服役8年，即骑兵头4年服役，步兵、炮兵、工兵、水兵头3年服役，辎重兵头半年服役。其余年份都编入后备军，每年在

军事监督之下征召进行训练(步兵在后备军中不得少于两次训练)。一切有军事义务的人都要在军事监督之下。这样,作战部队包括常备军和后备军,不再包括第一次征召的常备民兵。方案建议,每年征兵从4万人增加到6.3万人,计划新建36个步兵团和10个骑兵团。因此要增加军事预算。财政大臣巴托夫要求议会每年增加950万塔勒的军事预算,把1859年5月开始征收的国内主要税收,即所得税、等级税、屠宰和碾磨税增加25%,附加税征到1862年末。

罗昂的军事改革方案在国内遭到各方面的反对。

首先,增加军事预算和增加税收,引起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不满。拜伦哈第激动地说:"整个方案超过了国家的财力。我们没有公债不能进行战争。但是,如果国家事先已陷于枯竭,那依靠什么支付利息。必要的要塞还应当建筑,要巩固沿岸,还要加强舰队。"也有人评论说:"当政府的政策还不是坚决果断的时候,为什么要给自己承担这样的负担?"拜伦哈第还指出:"加之,所有这些牺牲都完全是无益处的,反正政府不实行彻底的政策,军队也完全没有需要。"

其次，取消常备民团，在资产阶级看来，是加强反对势力，取消自由主义政策。议会委员会在报告中说："从作战部队中取消常备民团，实质上是改变军队和人民的关系，和常备民团一起也取消了军队和人民之间的固定联系的人员。军队将在更大程度上敌视人民。国内布满了卫戍队网，并且被关在军营中的士兵，都将受到军团所固有的排他精神的影响。这些军官大部分是由贵族组成的；在步兵中保留3年的服役期限，而在骑兵中打算增加到4年，恰恰是为了把这种影响变成最切实有效的。在军队中贵族比城市资产者占优势，是对它的权利的侮辱和破坏，拟议中的增加常备军必将造成军队和人民之间鸿沟的加深。因此，他们反对取消常备民团，反对3年兵役制，反对增加军事预算。

从而，摄政王、内阁同自由派占优势的议会围绕军事改革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霍亨索伦·拜伦哈第大公在3月2日说："摄政王坚持己见，不想放弃任何自己的要求，只能完全接受各项军事建议，别无其他，不能删掉任何内容……如果建议不被接受，内阁就一定辞职。"摄政王同样以退位相要挟。艾伦斯特公爵在回忆

录中说："他对愿意听从他的意见的人说：如果建议被否决，他将退位。"

艾伦斯特·科布尔克公爵充当调停人。他在3月25日给摄政王的信中谈到反对军事的理由时说："反对是由于惧怕在接受改革法案之后，在给国家增加大量新的负担之后，将不可能采取积极的富有成果的外交政策……我确信，只要所希望的外交政策能够贯彻始终，政府所要求的一切都将全心全意地毫无反对地给予。因此，外交政策可能是解决困难的出路。"内阁多数大臣都主张要推行积极的对外政策，以缓和国内的斗争。这样就产生了上述俾斯麦同外交大臣施莱尼茨的一场辩论。摄政王在外交政策上丝毫不让步。他坚持同奥地利的传统友谊，要保持那个已经瓦解的神圣同盟体系。

自由派领袖们在对外政策上没有取得任何让步，他们就希望在国内问题上取得让步。艾伦斯特公爵说：他们"要求多数部长辞职，要求以更有威望的人物代替他们，要求限制警察总长的权利等等。对一些人实行赦免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向我提出一个名单，上百人都是亲王必须回忆的人的名字。"摄政王对此绝不让步。

他对艾伦斯特宣布说："他任何时候都不赦免对他举剑的人，因为这是对罪犯的示弱，……至于总长们，摄政王可牺牲其中两三位，但谈不到政治官员的普遍免职。"

议会选出专门委员会讨论罗昂的军事改革方案和巴托夫的预算草案。4月30日委员会提出报告，提出了议会的军事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是：同意每年征兵从4万人增加到6.3万人，否决了三年兵役制和取消常备民团。草案规定，在常备军中持续服役5年，骑兵、炮兵、工兵和水兵头3年服役，步兵头2年服役，辎重兵头半年服役，其余时间编入后备军。常备民团仍然分为第一常备民团和第二常备民团。每年征兵增至6.3万人，但服役期限为2年，减少军费开支。报告说："如果步兵每年新征4万人，服役3年，每年在各兵种服役的将是12万人，如服役两年则是8万人。由于每个步兵每年需国库74塔勒，如采用两年兵役制，步兵每年就节省300万塔勒。"

议会里自由派虽然反对三年兵役制和取消常备民团，但是在军事拨款问题上却妥协了。5月5日，财政大臣巴托夫向议会提出军事拨款9

万塔勒，在最近14个月内用于军队备战。同时决定在1861年6月30日前对重要税收增加25%的附加税。摄政王不等议会批准，在1860年5月5日下令取消36个常备民团，同时建立同等数目的联合步兵团（32个战地步兵团和2个近卫团），同时建立10个新的骑兵师团，即8个战地骑兵师团和两个近卫师团。这样就造成了既成事实。5月15日，议会以315票赞成，2票反对，5票弃权决定军事拨款900万塔勒，作为1860年5月1日到1861年6月30日的临时经费，并决定对重要税收（所得税、等级税、碾磨税、屠宰税）增加25%的附加税。

1860年7月4日，新建的部队正式命名，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大帝纪念碑前举行了新骑兵的正式授旗仪式。从1861年3月的报告中我们知道，普鲁士步兵已有9个近卫兵团、40个战地兵团。常备民团被取消了。1861年5月31日，议会批准了一年的军费。军事改革实际上在推行当中了。

我满身鲜血怎样去见上帝

1861 年 11 月 19 日，普鲁士进行了议员候选人的选举，12 月 6 日进行了议员的选举。在这次选举中，保守党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进步党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保守党的主要领导人罗昂、贝特曼—霍尔维格、施莱尼茨都落选了，连保守党领袖勃兰登堡和瓦格纳也未能当选。进步党在柏林的候选人全部当选。结果，在新的一届议会里，保守党只占 15 席（上届占 59 席），内阁党的格拉包夫派占 95 席（上届占 191 席），进步党 109 席，左派中心 52 席。进步党的所有领导人瓦尔德克、霍维尔别克、维尔霍夫、福肯别克、舒尔兹—法里奇都当选了。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格尔曼·贝凯尔，即红色贝凯尔也当选为议员。

1862 年 1 月 15 日，新议会在柏林开幕。财政大臣巴托夫向议会提出 1862 年的国家预算：收入为 1.36 亿塔勒，支出为 1.41 亿塔勒，固定支出为 1.344 亿塔勒，用于新建军队的临时支出或特别支出为 660 万塔勒。为了抵偿特别

支出，把1857年规定增加的主要税收再增加25%。在会上，军事大臣罗昂提出改革1814年普通义务兵役制法案的各项原则，即实行三年兵役制，从作战部队中取消常备民兵。

议会在讨论1862年军事预算时，正值2月2日七邦照会送交普鲁士政府，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七邦照会给普鲁士政府一记耳光，是第二个奥尔缪斯。这样，讨论军事预算，就同如何对待七国联合，普鲁士应执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联系起来。进步党人提出，推行强硬的对外政策作为批准军事预算的条件。《民族报》在2月9日发表文章指出："破产了的奥地利和被整个世界所抛弃的各小邦竟敢于坚决举行反普鲁士的示威，这怎么可能呢？"报纸指出："这是由于普鲁士政策的软弱和不坚定而引起的，普鲁士的政策又成为笑话。"

卡尔洛维茨在议会上发言说："和平，特别是兄弟民族之间的和平是美好的事业。但是权利高于一切。没有自由和权利的和平——这只是一些蟾蜍和蜥蜴所能满意的泥潭。我忠告外交大臣先生，要十分镇静地闭合上自己的照会文件夹，并对自己的同事——军事大臣先生说，

我做完了我的事情，请您执行您的任务吧！”议员凯尔斯特发言说：“如果普鲁士一枪不发就向奥地利屈服，那么它将永远放弃它在德意志的地位，而成为整个德意志民族所蔑视的对象。”议员们向政府保证，为了有力地反对奥地利，可无条件地批准军事预算。议员兰达高呼：“啊，如果这真的发生，如果真的进入库尔黑森和霍尔斯坦，那么他们就能立刻拿到他们所需要的款额。然而对于这样可怜的政策，我们不能给予这样多的经费。”

《民族报》写道：

“如果普鲁士愿意避免失败，如果它希望在冲突中成为强者，它就只有一个办法——用事实证明它没有被大德意志的进攻所动摇和屈服。对敌人的诡计只是一般的反对是不能从耻辱中拯救自己的。”

可是，威廉一世和普鲁士内阁都不敢于对奥地利采取坚定的步骤，回答奥地利照会时仍然坚持在德意志联邦中的狭隘联盟的观点。王太子的一位朋友在3月份写道：“果断的对外政策，总是由于国王的阻止而落空。他在战争思想面前发抖。当人们请求他发表有关这方面的意

见时，他就声称：他已经是一位老人了，满身鲜血怎样去见上帝！”

将军们同样坚持正统主义原则，怕对奥地利和各邦君主作战。内阁顾问马克·敦开尔对拜伦哈第说：“如果事情发展到同德意志各小邦和奥地利决裂的话，那么拿破仑就将建议由他来调解，而为的是调整国界——争取割让兰通和萨尔路易，以及同自己结盟。如果我们拒绝这一建议，他就要联合奥地利，那时我们就要处于7年战争的那种局面。”

是坚持在国内同议会的冲突，还是转而推行积极的对外政策，是当时斗争的焦点。拜伦哈第对罗昂说：“为了获得多数票来批准军事预算的唯一可能性，一切还在于积极的对外政策，这种政策旨在完成某种重大使命，使得民主主义者不可能拒绝政府所需要的经费。”罗昂回答说：“对外政策无济于事。有这样一个议会，有这样一伙人执政就永远不可能，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否定军事预算。我们将不得不解散它。”拜伦哈第说：“没有积极的对外政策，下次选举对于政府来讲将比这次还不顺利。”罗昂回答说：“我们应当设法获得较好的选举，然而积极

的对外政策对我们来说在这里将无济于事。”

1862年3月11日，普王威廉一世命令大臣们解散议会。议会同王权的斗争，即宪法冲突开始了。

俾斯麦再次拒绝组阁

1862年5月5日，普鲁士举行了新议会的选举。

与解散议会的同时，1859年组成的内阁也辞职了。3月10日文化大臣贝特曼·霍尔维格首先辞职。3月11日，霍亨索伦大公因病，上院议长霍亨洛埃—因格尔芳根任临时首相。3月18日，奥尔斯瓦德、巴托夫、什威林等都相继辞职。“新时代”至此结束。组成新内阁的是一批反动分子，布列斯特的警察署长任内政大臣，最高检查长楚尔·利贝伯爵任司法大臣，伊森普利茨任农业大臣，宗教法庭顾问缪列尔任文化教育大臣。罗昂继任军事大臣，贝恩斯托夫任外交大臣，冯·德尔—海特任财政大臣，他实际上成为内阁的领导人，因为霍亨洛埃不能复职，从5月28日实际上由他代替。

普王威廉一世和新内阁想采取各种措施，施加压力，能选出一个温驯的议会来。他们甚至采取暴力行动，迫使选民不选进步党人，而选举保守党人。但是，选举结果，进步党人比1861年12月的选举取得了更大的胜利：保守党12席、天主教党团32席、立宪主义者（芬克党团）24席，自由议会联盟19席，左派中心101席，进步党141席，波兰党团23席。

在这种形势下，军人党想发动政变，来解决国内的冲突。早在3月23日拜伦哈第就对罗昂说："我们置身于严重的危机基础之上，局势极其严重，笼罩着全国的愤怒情绪极其强烈，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这种情绪在各省农民中比城市更强烈。"罗昂回答说："您以为我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吗？我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如果选举结果不好，政府仍然不能就此罢休和退却。"拜伦哈第吃惊地说："这样的话，我们在6月份就可能出现那种情况，那时国家政变就不可避免。"罗昂说："关于这点，我已下定决心。"拜伦哈第说："您是否相信您所有的同事在决定的时刻都会坚定和勇敢呢？您是否相信您的高级指挥官敢于这样行动呢？"罗昂肯定地回答说："我相信我

的同事们，他们都已下定了决心。”拜伦哈第问道：“而国王呢?”罗昂说：看来国王是同意这样做的，但是到行动的时刻，他是否一定行动这当然是另外的事情。”

普王威廉一世不想接受军人党的意见。4月初一位宫廷官员谈到国王的情绪时这样说：“他像以前怕被内阁过远地引向自由主义方向一样，今天他又怕被现任大臣们过远地引向反动统治。”他想享有全国的信任，但又不愿损害容克贵族的利益。他惧怕立宪运动走得太远，但又怕国家政变，陷于极端矛盾状态。他优柔寡断，没有勇气，甚至想退位。4月1日弗兰格尔元帅激动地对曼推菲尔说：“国王要辞退王位，因为选举的结果不好，并且他不享有人民更多的信任。我对这样问题的回答是：陛下不能这样做，您在给办公室的一道指令中命令（1月16日秘密指令）我，要把任何为了维护自己的职位而在同民主主义者进行谈判，从而损害了军官荣誉的军官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因此，国王也就没有权利在民主主义面前离开自己的王位。”国王坚持自己的观点。弗兰格尔则说：“如果您按照您命令您的军官们行动的那样行事的话，那么我

就要向您宣布，我们为一名元帅就要和自己的全部军队一起离开您。我们所有的人都决心为国王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国王想以此来拯救自己时，我们就要离开他。”国王回答说：“退位的时刻还未到，让他去驳斥这方面的谣言。”

国王不想退位，但又不能让军人党搞军事专政和国家政变；他倾向于对议会让步，但又惧怕引起革命。曼推菲尔曾说：“在这之前，国王和我谈到放弃王位的问题，这时他引证了一篇来自伦敦的文章。那篇文章威胁说：如果继续违反人民的意愿，国王查理一世的下场，就将是他的命运。我回答国王说：4 年前我曾向您说过，我们是生活在革命的时代（我们都处于反对革命的斗争当中）；问题是他是否愿意和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一样，在事情未达到斗争迫近以前，他的政权就已被人夺去。今天他还有政权，还有军队，但是如果他取得了好的选举结果，靠牺牲军队利益而让步，那么他仍然得不到好的结果，得到的只能是军队对他的坚定信任的动摇。”

1862 年 5 月选举的结果公布后，军人党决定发动政变。罗昂写信给俾斯麦说：“我们必须进行战斗，并且即将战斗！”“必须斗争到最后一

滴血！"《十字报》提出了这次战斗的纲领："国王平静地关闭国会，并且不要预算而用现有的税收进行统治……学习不要新的税收和公债来进行统治，更好是没有新的法律，特别是没有新的组织法——这对于当时的国家的活动家来说，是多么一个伟大的任务啊！当王权将胜利地保证反对敌对的民主势力的时候，真正的新时代才会到来！"

他们搬出了"漏洞理论"，论证不要预算进行统治既不是破坏宪法，也不是国家政变。官方报纸这样来解释宪法：没有预算的统治变成了摆脱似乎存在于普鲁士宪法里的那一个漏洞的唯一出路。报纸写道："宪法要求国家预算要由国家和两个议院协议，每年提前确定。"但是在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之间不一致时怎么办呢？""很清楚，宪法本身有着漏洞，因为宪法没有加以明确规定应当怎样保证一致。"

这时俾斯麦从驻圣彼得堡大使任内应召回国，整个5月他都住在柏林。1862年3月代理首相霍亨洛埃就恳请俾斯麦尽快接管内阁，以便让他摆脱身心俱疲的重担。国王也同意任命俾斯麦组阁。俾斯麦同国王讨论了当前的政治

局势。俾斯麦一再说服国王，要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他说："如果为了支持民族联盟的某项政策，陛下同意使用军队，我断言，大多数人在军队问题上的敌对见解就会消失，并且所有为军队所需要的经费将不难被批准。"

但是国王还不能接受俾斯麦的主张，俾斯麦组阁的时机还不成熟。他的回忆录中说："当时我还不能满足他的愿望，而且对此也没有热心。"他谈到当时的形势时指出："当我从彼得堡被召回柏林时，我根据议会政治所经历的曲折变化中感到，这个问题即将提到面前。"这里指由他组阁问题。他谈到他的心情和决心时说："我不能说这种前景会使我情绪愉快，乐于尽力，我不相信国王能长久地顶住他的家庭的影响。"他又说："想到我面临一项艰难而又责任重大的职务，同时得放弃胜任愉快、不是必须负责又颇有影响的大使职位，我便感到忧愁。同时，在和日益高涨的议会统治的浪潮所作的斗争中，我在国王、王后和国内同僚那里得到多大程度、什么性质的支持，还不能确知。"

时机未熟难组阁。1862年5月22日，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为驻法大使。6月1日他在巴黎

推勒里宫呈递了国书。

俾斯麦在巴黎同拿破仑三世讨论普法结盟问题。1862 年 6 月 27 日，他在枫丹白露同拿破仑第三进行长谈。拿破仑第三问俾斯麦："你是否认为国王有意同他结盟。"俾斯麦回答说："国王对您怀有最真挚的友好情谊，早些时候在我国舆论中流行的对法国的偏见，已经几乎消除，缔结同盟要取决于形势，根据形势判断缔结同盟的必要性和有用性。每个同盟都以一种动机和一定目的为前提。"

拿破仑第三表示异议。他说："有些大国之间的关系良好，有的则不然。反对捉摸不定的未来，人们必须把他的信任寄托于某一方。"他认为，"在普鲁士和法国之间有共同的利益，正是在这里他看到了一种亲密而持久的协调一致的因素。"

拿破仑第三谈到他同奥地利的同盟问题。他说："您不能想像，奥地利在几天前向我作出了多么奇特的表白。看来，您的任命和冯·布德贝格是生来到巴黎这两件事合在一起，引起了维也纳的惊慌。梅特涅公爵告诉我说，他得到了那些指示走得如此远，连他自己也感到震惊；他

被授予昔日君主对他的特使才赋予的那种无限全权，在涉及所有我提到的问题上，他都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同我达成协议。这种表白倒使我有点不安了，因为除了两国利益毫无共同之处外，我还怀有几乎是迷信的反感，厌恶把我和奥地利的命运连结起来。”

俾斯麦摸到拿破仑第三的底牌！

或者改革军队或者放弃王位

新议会开幕后，围绕军事改革问题议会内外的斗争更加激烈了。内阁本身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劝国王不要预算进行统治。另一部分人则提醒威廉一世两百多年前英王查理一世的命运。在内阁里，海德、贝恩斯托夫和霍尔茨布林主张向议会让步；雅科夫、楚尔—贝利、伊森普利茨则主张继续同议会斗争。普王威廉一世处于矛盾状态。他不愿对进步党让步，但又害怕同他们进行斗争。他瞻前顾后，苦闷已极，坐立不安，寝食俱废，不断想起英王查理一世和法王路易十六的命运。他说：“我立誓要改革军队，我就不能背弃我的誓言。我或者改革军队，或者放

弃王位。”

以罗昂为首的军人集团主张采取镇压措施，解散议会，实行军事专政。罗昂在国内被称作独裁者和反动分子。斯特拉福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他也被吓倒了。他不再考虑炮击柏林的计划，而是坐下来研究起斯特拉福的历史。他对斯特拉福研究越深入，他的勇气越减少。他写信给贝尔斯特说：“我内心的情感，就象在受审的战士一样，在敌人面前我没有任何恐惧，但却害怕自身的软弱。”他继续说：“表决经费开支的宪法权力属于议会，这是毫无疑义的，因而目前的冲突必然在国内引起深刻的裂痕。在想到我们在国外的作用削弱了，继之而来的在国内又引起各种混乱的理解和不同的态度时，我的心就被血淹没了。”

从1862年7月份起，军事预算问题又成为议会讨论的中心。但是进步党内部也有不同意见。进步党左翼以瓦尔德为首完全反对增加新的军事预算。他们不接受1860年军事改革方案，要求恢复1859年的军事组织。另一部分人如亨利·纪贝尔、特维斯丁、斯塔文加根等人则认为：“如果我们完全取消军事预算，在宪法范

围内不能解决的冲突，就将要大为加剧。”同时他们还认为，军事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必需的和可行的。特维斯丁在众议院发言说：“我应当立即承认，我完全赞同新的军事组织，因为从1860年起，它实际上已经实行，它的基本方针就是扩大征集新兵，取消常备民兵，加强前线和野战军的后备。”但他们只提出一点修正，即服役期限为2年。他们向议会提出一个提案：众议院批准军事改革经费，取消常备民团，实行两年兵役制。

这样提案同样遭到抗议和叹惜。贝凯先生在柏林选民大会上说：“绝不能取消常备民团，常备民团是国家的宪法发展和公民自由的必不可少的。”舒尔兹·德里奇说：“如果我们想成为自由的人民，我们就应该成为武装起来的人民（鼓掌）。哪里有脱离人民的军队，哪里自由就不能发展（热烈鼓掌）。”柏林第一区的选民通过决议说：“必须把军事预算分为必备军费和额外开支，并删去额外开支，因为这种开支无任何法律基础。”

8月11日，柏林《平民报》提出同政府进行谈判的条件：第一，要从实质上改变内阁，特

别是要取消引导国家走向这次冲突的军事部。第二，关于军队改组，允许在缩短服役期限的基础上，扩大新兵征集。第三，在财政方面减少在任何条件下加重国家负担的开支，但为了提高民族的战斗预备以预防战争的开支除外。

议会委员会把瓦尔德克和斯塔文加根的两个方案调和起来，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删去军事预算中用于军队作战（改组）准备的经济之后，承认每年征召新兵为6.3万人，条件是：第一，巩固和保留常备民团和作为全民族受军事技术训练学校的常备军。第二，实行两年兵役制。

众议院关于军队改革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军事问题，而涉及到是实行专制国家，还是实行立宪国家；是国王专政，还是议会执政。舒尔兹·德里奇说："这里所说的，不是一项军事问题，而是关于人民代表权的全部宪政问题。如果我们让出宪法和法律允许我们有权占有并且应该占有的地位，那么在我们其余的一切活动中，这个地位就会永远丧失（好！右翼喊！）"。他继续说："我们为宪政自由的基础而斗争，为我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而斗争；我们只是为普鲁士利益而斗争，全德意志的眼睛都注视着我们，因为

他们知道：如果我们这里专制政体得胜，那么宪政生活在所有中小邦德意志都将永别（非常对！左翼喊！）我们要为整个民族的未来而斗争。”

9月16日，预算委员会删去被列为额外开支的部分的提案提交议会表决通过。众议院全体议员出席，表决结果以273票对63票决议，删去用于军队改革经费的第一部分。他们行使了宪法权利，同王权决裂。

俾斯麦受命组阁

众议院9月16日的决议，在内阁里引起极大的混乱。内阁的实际领导人奥古斯特·杰尔—海德主张同议会和解，实行两年兵役制。外交大臣贝恩斯托夫和商业大臣霍尔茨布林支持这个意见。雅科夫、楚尔—利贝、伊森普利茨则反对同议会和解，主张进行战斗。罗昂动摇了。内阁缺少一位坚强的领导人。他向国王建议由俾斯麦组阁。国王说：“俾斯麦坚持同法国结盟，他不会这样做。”罗昂建议对众议院进行让步，也被国王拒绝了。他决定不要预算进行统治。他说：“对于民主党派来说，问题不在于拨款的数

额，他们是想破坏军队的统一，想利用非战斗人员的软弱和服役期限短，以及把军官和下级士官混在一起的办法，来瓦解军队，以便消灭军队对国王和上级长官的忠心，从而使军队变成议会和军队 。”

9月16日晚，国王召开御前会议。罗昂提出一个方案，即根据什塔文加根的方案，在1862年预算中节约22.3万塔勒。威廉认为这个数字不大，并且可以换取对1862年预算的批准，就同意了，把兵役期限问题拖到一年后再讨论。

9月17日上午，罗昂在众议院宣布，政府同意什塔文加根的提案，并使人模糊地认为，政府实际上缩短了兵役期限，众议院感到满意。因而延长了会议时间，并同意预算委员会和政府提出的进一步讨论和解的具体内容。罗昂在预算委员会里说，增加超过期限的常备军的数额要作相应的补偿，这就意味着政府实际上同意实行两年兵役制。

9月17日午后，国王召集御前会议。罗昂请求国王原谅他上午在众议院擅自表态，因为不能用沉默来回避1863年的预算。杰尔—海德和贝恩斯托夫支持罗昂的观点。他们都认为，由

于冲突威胁着王冠和祖国，不能用让步来防止这种巨大的危险。不牺牲三年兵役制（虽然现在不能正式宣布），让步是无用的，它只能加强对政府的反对，并给政府造成损失。雅科夫、楚尔—利贝、缪列尔和伊森普利茨继续反对让步。国王则坚决不让步，并表示不跟随他的大臣可以辞职。9月17日晚，国王再次召开御前会议。罗昂说，他们决定不再把三年兵役制从立法上加以废除，但收回1863年的预算，并提出1864年把服役期限降为2年的方案。内阁没有直接接受什塔文加根的提案，但建议国王作出适应该提案的让步。国王一分钟也没有迟疑，立即拒绝了内阁的意见。

国王立即打电报给王太子，让他立即返回柏林。王太子正在莱哈茨布友埃尔恩斯特公爵家里作客。威廉一世前往巴贝尔斯尔格，写退位诏书。

9月18日上午，罗昂在预算委员会里宣布说：收回他前一天的承诺。当天罗昂和杰尔—海德也来到巴贝尔斯贝格，企图再次说服国王实行两年兵役制。他们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王太子已经被召来！

罗昂陷入绝境：大厦将倾，谁能挽狂澜于即倒！他认为，俾斯麦，只有俾斯麦！9月18日晚，他拍电报到巴黎，要求俾斯麦立即返回柏林，切勿拖延，拖延是危险的。

威廉一世退位诏书写好了。他说："我既不能和我们所固有的生活原则决裂，也不能与我亲爱的祖国光荣的过去断绝关系，所以我除了退位，并把它转交给与过去历史无关的、合法的继承人而外，别无出路。"

王太子返回柏林后同杰尔—海德会谈，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对议会作出让步。9月19日上午，王太子弗·威廉在巴贝尔斯贝格谒见国王。国王坚持退位，王太子坚持对议会让步。国王坚持说："如果大臣们坚持在两年兵役制上让步的话，他愿意退位。他反对少于3年兵役制期限。无论面对自己，还是面对世人，在33年间，他都没有做过前后不一致的事情。面对上帝和自己的良心，这个决定是不可动摇的。他要履行诺言：三年兵役制的原则和改组军队——这就是他与之共生死的信念。"王太子弗·威廉说："对于未来，这是一种危险的先例"，"这一步不谨慎，就将给王冠和王朝招来不可估量的灾难。"

父子二人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罗昂和海德提出一项新建议，把众议院会议推迟30天，以便在国内发生有利于政府的转折时，再解散它。国王同样拒绝了。国王说："必须现在决定，30天内一切都将失掉！"海德和贝恩斯托夫都提出辞呈，两次都被国王拒绝！

9月19日晚，召开有王太子参加的特别会议。内阁决定上疏国王，由各部大臣签署，9月21日呈递威廉一世。上疏说："威廉一世的退位打算乃是王权的自杀"，"如果普鲁士国王不是被大街上的革命所战胜，而是由于同人民代议机构的民主势力作斗争而抛弃了自己的王位和天赋的王权，那么就会给民主势力铺平道路。这将是王权的最惨重的失败，因为民主势力不是用粗暴的强力手段，而是用最便宜的办法就会取得胜利。此后，民主势力就不再公开革命了，相反地它有了把握和力量以权利和法制为幌子，用宪法去实现它的与王权利益相敌对的全部要求。既然在这样的斗争中，就有国王退位的先例，那么，王权的继承人，只要不屈服民主势力，也就会被迫照先例去做，而如果反抗的话，看样子，革命说法会被激怒的群众认为是不合

法的了。”

不退位，为了同进步党人进行斗争，谁来主持沉浮？俾斯麦！

9 月 22 日上午。俾斯麦回到了柏林。他先后会见了罗昂、贝恩斯托夫和王太子。第二天，罗昂进宫拜见国王，桌子上摆着海德和贝恩斯托夫的辞呈。罗昂向国王建议：“把俾斯麦召来吧，陛下。”威廉挥手说：“他不愿意，现在他不可能，他不在这，他不能同他们谈判。”罗昂说：“他在这，他乐意听从陛下的召唤！”

9 月 22 日，俾斯麦进宫谒见国王。威廉一世说：“如果我对上帝，对我的良心和我的臣民不负责的话，我就不想执政了。但我不能这样办，因为我应当根据议会大多数人的意愿而执政；而我找不到不使我和他们自己屈从于议会大多数人而领导我的政府的大臣。因此我已决定退位，并且根据上述理由，已起草了退位诏书。”退位诏书就摆在桌子上。国王说完话后表示，没有一个合适的大臣，他是不能执政的。

俾斯麦回答说：“陛下从 5 月以来就已经知道我准备参加内阁。我相信，罗昂也会同我一起留下，而且我不怀疑，如果内阁其他成员由于我

参加内阁而引退，我们有办法把人员进一步充实起来。”

国王沉思片刻问俾斯麦：“如果你担任内阁首相，是否主张对军队进行改革？”

俾斯麦说：“是。”

国王又问：“你是否准备抵抗议会多数派和决议而进行统治？”俾斯麦作了肯定的回答。国王说：“那么我的职责就是和您一起努力把斗争继续进行下去，我不退位了。”

随后，俾斯麦陪同国王到花园散步。在谈话中，国王拿出了一份8页的提纲，写出他的政府政策的全部设想。俾斯麦在谈话中使国王相信，问题不在于这种或那种色彩的保守派和自由派，而在于是君主统治还是议会统治，而且要无条件地避免议会统治，甚至不妨实行一个时期的独裁。俾斯麦对国王说：“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陛下让我做我认为不正确的事情，我也将把自己的这种见解和盘托出；但是如果您坚持己见，那么我宁可和您一起毁灭，也不能够在同议会统治进行斗争中抛弃陛下。”

9月23日，众议院对1862年预算进行最后表决。提出全部军事预算为3780万塔勒，其中

用于军事改革的特别预算为570万塔勒。众议院表决结果，以多数票赞成，两票反对，删去了特别预算。当天，国王威廉一世签署命令：任命冯·俾斯麦为国务大臣和临时内阁首相。

第七章　铁血与金钱

“铁与血”的演说

1862年9月23日，冯·俾斯麦被正式任命为国务大臣和内阁临时主席。10月8日正式任命为内阁首相兼外交大臣。

9月29日，俾斯麦在众议院发表简短演说，对议员反对军事改革经费的态度表示遗憾，强调军事改革的重要性，9月30日，从议院预算委员会开会讨论代表马克斯·冯·福肯贝克的1863年拨款提案，指出政府企图使用众议院决议否决的经费，是违宪行为。俾斯麦利用这个机会发言，否认众议院的权利。他否定宪法所规定的每年的预算都是议会预先决定的条款。他说，第97条所规定的，不是应该予先决定预算，而是应该规定款项的总额，并载入预算。他说，如

果有人不同意这个解释，而他是乐于相信这一点的。他说，解释宪法是困难的，它们是立法三要素的一项事务。他们是否同提案人福肯贝克的观点相一致，是值得怀疑的。他说，另一种解释宪法的方针是来自先例，来自实践与提案人相反的思想在我们这里已实行12年了。在这时期，预算从来都不是事先决定的。他说，当权利问题轻易变成实力问题时，超过这个实践是不合适的。他在发言中同样反对反对派所说预算问题决定权属于众议院的说法。他说，我们的宪法没有说批准预算，在宪法里没有这种说法。他说，我们的宪法讲的是协调一致的原则。众议院的使命不是批准预算，而是同国王协调一致。如果不能达成一致，那就决定于力量的现实对比关系。

接着，俾斯麦以最快的速度说："一看地图就可明了，普鲁士以它狭窄的躯体、不能长久地单独负担为保证德意志安全所需要的军事装备。这个军事装备应该平均地分配给全体德国人。我们要达到这一目的，不能通过演说、协会、多数派决议，这不可避免是场严重的斗争，一场只有通过铁和血才能完成的斗争。为了保证我

们在这一斗争中的成功，议员们应该把尽可能多的铁和血放到普鲁士国王手里，以便国王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把它投向这个或那个天平盘上去。早在1849年众议院关于大赦讨论时，我在讲坛上反对施拉姆的演说中就表达了这一思想。”

俾斯麦在回忆录中说：“我自己的思想活动在争取议员们赞同一项有力的民族政策的愿望和引起国王不信任我和我的主张（因为从气质上讲，他是谨慎小心，畏惧暴力措施的）的担心之间。”他指出：“我的话已很清楚地表明了我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俾斯麦对他的即席讲话并未加以注意，说完话也就忘记了。军事大臣罗昂同他一起参加会议。会后在回家的路上对他说：“类似的俏皮的离题话，对我们的事业并无裨益。”

第二天，报纸上以“血和铁”的标题刊登出来。全国一片哗然，引起进步党人的极大愤怒！代表福肯贝克写道：“俾斯麦—申豪森意味着：不要预算进行统治，对内是军刀制度，对外是战争。我认为，他是普鲁士自由和幸福的最危险的国家大臣。”众议院表示，他们不信任这位新上

任的国家大臣，拒绝给他经费。历史学家海因利希·冯·特赖乞希写给他的朋友威廉·诺克的信说：“您知道我是多么热爱普鲁士，但我听到像俾斯麦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容克结论铁和血并把它当作桎梏套在德国肩上时，这句话的荒谬更甚于庸俗。任何一个理想主义者，不管他多么向往统一的德意志祖国，都不会对呼吁赤裸的暴力行为表示欢迎。”

普王威廉一世正在巴登—巴登温泉休养。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俾斯麦演讲词和社会上抗议的消息，深为不安。他随即宣布，10 月 4 日返回柏林。10 月 4 日，距柏林 70 公里的小车站于特堡候车室人声嘈杂。候车室尚未完工，挤满了各种各色的候车人。在一辆翻倒了的手推车上坐着一个人，谁都没有注意他，谁也没有认出他来，他就是普鲁士新任首相奥托·冯·俾斯麦。他为了安定国王，对付新闻界可能对国王的影响，赶到于特堡，到于特堡来迎接国王。他几经周折，才从车上急性而孟浪的列车员那里打听到国王坐的车厢。俾斯麦看到，国王一个人独坐在一等普通包厢里。暮色苍茫，国王坐在昏暗的车厢里心情颓丧，闷闷不乐。俾斯麦请求国王允

许他报告国王不在柏林期间发生的各种事件时，国王说："这一切将会怎样结束，我完全精确地预见到了。有朝一日，在歌剧院广场，在我的窗户下面，有人先把你的头砍下来，然后就轮到我了。"俾斯麦猜想，国王在巴登停留8天，一定有人不断地向他讲述波林尼亚克、斯特拉福、路易十六的故事。在国王沉默时，俾斯麦问道：

"后来呢？陛下。"

国王回答说：

"后来吗？后来咱们都得死！"

俾斯麦接着说：

"是的，我们都得死，可是我们迟早得死，难道我们不能死得更庄严些吗？我本人在为我国陛下的事业的奋斗中，和陛下（您将用您的鲜血保证上帝恩赐您的君权）是在断头台上还是在战场上，为上帝恩赐的权利而英勇地献身，不同样是光荣的吗。陛下不必考虑路易十六，他是在软弱的情绪中生存和死亡的，在历史上没留下好印象。相反，查理一世拔出刀剑保卫自己的权力，斗争失败之后他不屈地用自己的鲜血巩固了自己的王权观念，这难道不会作为一种高尚的行为永留史册吗？陛下必须战斗，决不能投

降，必须反击暴力，虽然这样作有生命危险。”

他们在火车上的谈话继续下去。俾斯麦说得越多，国王就越加兴奋，诅丧的情绪一扫而光，进入了为王权和祖国而手执武器进行战斗的军官的角色。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遭到谋刺时，对于个人身处险境，他却表现出少见的、在他也是很自然的无畏精神。俾斯麦说：“同我会见之前，他一路上自己问自己，他是否正确地顶住王后的非议和社会舆论，坚持和我一志在选择的道路上走下去。我们在幽暗的车厢里谈话的作用与此相反，他主张从一个军官的立场出发，领悟了在目前的局势中他应该起的作用。他感觉到自己佩带武装带，象是一名军官，只有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守住某一阵地的任务。这种感觉使他又回到了他所熟悉的思路，在几分钟之内重新恢复了在巴登失去的信心甚至他的愉快心情。”“他对于可能来自舆论、历史以及他夫人对他的政治谋略所进行的‘谋略批评’的种种担心，已置之度外。”俾斯麦最后说：“我的判断的正确性的证据是：我在于特堡会见国王时，他疲乏无力。意志诅丧，精神忧郁，而在抵达柏林之前已经精神振作，可以说，处于一种兴高采烈和

渴望战斗的情绪之中。他的这种情绪在迎接他的大臣和军官们面前毫不怀疑地表露出来了。”

议会里关于预算的斗争更加激烈。10月7日，众议院宣布，使用未经议会批准的经费是违反宪法的行为，同时批准1862年的军事预算，从军事开支中删去了用于军事改革的经费。

俾斯麦和罗昂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名义上保留三年兵役制，但上中层阶级的入伍者第三年可以赎免。众议院也不同意这个方案，态度顽强。俾斯麦遂把预算问题提交贵族院。他设想，贵族院否决众议院决议后，就宣布由于两院意见不统一，需要国王填补这一宪法漏洞，由国家批准国家预算。

10月11日，贵族院否决了众议院批准的预算，并批准了包括用于军事改革经费在内的政府的预算草案。

10月13日，众议院宣布，贵族院的决议无效，因为它违反宪法第62条。该条规定，贵族院只能采纳或完全否决众议院批准的预算。众议院再次宣布，使用未被人民代表机构批准的经费，是违反宪法的。

10月13日，俾斯麦以国王的名义宣布，立

即解散众议院的会议，把议员赶回家去，不要预算进行统治。

进步党人愤怒已极！他们骂俾斯麦是“暴徒”、“冒险家”、“贵族”，宣布要永远捍卫被俾斯麦践踏了的宪法、法律和权利。但是，进步党人不敢进行勇敢的斗争，不敢发动人民革命。他们被革命吓破了胆，不敢进行任何冒险，不敢挑起战斗。他们要求安静，忍耐，反抗只能在精神上进行。10月19日在科伦召开了公民节大会，贝尔歇尔在会上发言说：“在争取权利的斗争中，人民手中没有刺刀，也没有任何暴力手段。但是，人民知道，有道义力量存在，道义力量在这次斗争中必将取胜。从普鲁士人民充满的道义力量中，不会产生任何喀提林的东西，以制造在国内运用军事力量的借口。谁愿找这些东西，他就应当随便到任何别的地方去找。”阿蒙先生在同一大会上说：“任何挑拨，都不应该促使我们采取不合法律的步骤。我们要坚决勇敢地立足于法律基础之上，而不应该对我们祖国的未来，悲观失望。我们相信神，我们也相信，法权终归胜利。”

在一片反对和抗议声中，在普鲁士和德意

志也不乏有识之士，支持俾斯麦的“铁与血”政策。民族联盟领导人温卢在回忆录中说：“俾斯麦所作的‘只有铁与血才能统一德国’的论断，毫无疑义是正确的。要是早就都能相信，他将为此目标而操劳，那么，军队改革实际上是会被赞同的。”民族联盟于10月6—7日在科伦召开年会。温卢在会上为俾斯麦辩论。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对我的普鲁士老朋友和德意志新朋友说过，当他们把俾斯麦看作是反动分子或反动工具时，他们就完全鬼迷心窍了。当然，他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的头脑却构思着与曼推菲尔及其同行们完全不一样的计划和想法。”温卢继续说：“我的一些政界朋友们，都倾向于批准用于军队改革的经费，至少在对俾斯麦的政策真正为了统一德意志抱有希望时是如此。但是，他们都承认，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把握，纵令俾斯麦本人想推行他1859年的政策（同奥地利作战），然而由于他面对国王，宫廷和强有力的奥地利政党，他能否做到，还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必须等一等，看看俾斯麦的行动如何。”

许多资产阶级人士同样预见到俾斯麦会取得胜利。康斯特·莱斯列尔在《1862年之后的

普鲁士》小册子中说："如果俾斯麦先生激励他自己领导的政府，使之勇敢前进，并在德意志问题上不后退的话，那么他在今天和昨天所说的、所做的和所允诺的一切，几天之内就都将被忘掉。那时，不仅消灭了反动势力，而且也消灭了反动派。在开始的反抗声中，巨浪滚滚而来 是被各种言论引向绝望了的民族呼声：让才能高强的人专政！"

俾斯麦同议会的斗争白热化。1863 年 2 月 17 日，众议院以 274 票对 45 票通过决议：大臣们应以他们个人和他们的财产对他们违反宪法的行为负责。因而有人建议俾斯麦把他的财产转交给他的哥哥。俾斯麦认为，这并非他所愿。为了保住在王位更迭时可能被没收的财产而将其转移给我的哥哥的作法会给人造成我懦弱和贪财的印象。俾斯麦把他的身家性命都赌上去了。

金钱：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

1859 年，俾斯麦被任命为普鲁士驻彼得堡大使。他赴任之前请银行家迈耶尔·卡尔·罗

思柴尔德男爵在柏林给他找一位可信赖的银行家作为委托人。迈耶尔·罗思柴尔德把格尔森·布莱希罗德介绍给俾斯麦。布莱希罗德遂成为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1861年布莱希罗德在贝伦兹大街63号修建了一座大楼，距俾斯麦在威廉街的住宅只有几分钟步行路程。

银行家格尔森·布莱希罗德(1822～1893)1822年生于柏林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父亲萨缪尔·布莱希罗德是德国银行家罗思柴尔德驻柏林的代理人，后来自己开办银行。1860年格尔森·布莱希罗德开办自己的银行，经济实力不断增长。据1861年柏林警察局的统计，格尔森·布莱希罗德年收入为23333帝国塔勒（相当于1600美元），其银行年纳税额是700万帝国塔勒。报告说他道德清白无瑕，政治上忠于王室。他同其他银行家一起组成辛迪家投资公司。他投资于冶金业、铁路，被任命为莱茵铁路和科伦—明登铁路的正式银行家。1859年摄政王邀请他参加科伦莱茵铁路桥的通车仪式，因为他在财政上支持这条铁路的建设。1859年法意对奥战争时期，普鲁士同样进行了战争准备。布莱希罗德和汉泽曼成为普鲁士财团合伙人，筹资

3000万塔勒，作为普鲁士动员之用。1859年普鲁士政府授予布莱希罗德四级红鹰勋章，1861年任命为政府商业顾问。布莱希罗德贝伦兹大街63号邸宅是普鲁士各界集会的场所，常来作客的有外交家、法官、艺术家及各界人士。

从1859年开始，布莱希罗德把俾斯麦家的经济事务管理起来，控制了俾斯麦的工薪及其他收入，替俾斯麦支付国内用度，在国外建立银行帐户，把俾斯麦的不动产变成资本投入企业。俾斯麦把各项政治信息提供给他。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结成伙伴关系。

1863年春，普鲁士的宪法危机继续深化。1863年5月，国会以285票的多数拒绝俾斯麦内阁的公债。国王极端气愤，俾斯麦对议会进行猛烈攻击，他给老朋友约翰·摩特来的信中说："这些胡言乱语的人不能管理普鲁士，我不得不进行抵制，他们缺乏聪明才智，过于自吹自播，太愚蠢，太傲慢了。"5月22日国会上疏国王，抗议政府继续违反宪法，并警告说，普鲁士在德意志，甚至在欧洲已经孤立。指出：每次同内阁的进一步谈判都增强我们下列信念："王室顾问们同国家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痕，这种裂痕只有

改变人事，甚至改变制度才能克服。”5月27日国会闭幕。6月1日国王颁布出版法，禁止发表对朝廷、政府和教会有损害的文字，以便使所有反对派报纸沉默下去。

到1863年底，由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引起的同丹麦的冲突已摆上日程。如何筹措战争经费，俾斯麦内阁也发生了分歧。财政大臣卡尔·冯·包德尔斯文格反对采取任何违反宪法的办法筹措战费。俾斯麦走投无路，他想到了他的私人银行家格尔森·布莱希罗德。1863年11月，布莱希罗德第一次提出出卖国有财产萨尔煤矿。但因普王威廉一世的反对而作罢。1863年12月9日，政府要求国会拨款1200万塔勒，以准备用于由于同丹麦战争的军事支出。国会组成专门委员会讨论政府的请求。委员会提议，首先要上奏国王，警告国王要防备俾斯麦的反德决志政策。俾斯麦则警告国会，如果同丹麦战争来临，普鲁士兵力削弱，他们要负责任。但国会仍然上奏国王，对俾斯麦的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1864年1月22日，国会以275票对51票否决了政府请求的款项。

对丹麦的战争日益迫近。俾斯麦绞尽脑汁，

讨论各种筹款办法。他从由法兰克福银行家拉伐尔·冯·埃尔兰格领导的南德借款团借到1500万塔勒。同时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建议，把已经国会授权但尚未发行的铁路债券抵押给私人银行家，他们再借款给政府，然后把债券卖给公众。对丹麦战争开始之后，俾斯麦急需战费。他同布莱希罗德会谈，要求无论如何要筹集1200万塔勒。银行家们为争夺给政府借款展开激烈竞争。普鲁士银行海外贸易公司同埃尔兰格签订秘密协定。布莱希罗德向巴黎的詹姆斯·罗思柴尔德提议，请求罗思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把已授权的2000万塔勒抵押给他。俾斯麦的这项提案遭到罗思柴尔德的拒绝。他们回答说，巴黎不冒这个风险！

丹麦战争结束后，如何补偿战费问题已成为严重的任务。1864年5月初，俾斯麦告诉布莱希罗德，他的内阁由于把普鲁士借款的4.5%抵押出去而陷于没有出路的境地。布莱希罗德告诉俾斯麦，由于高贴现率政府负担过重，应采取措施。他们两人讨论一个月也未出结果。6月12日俾斯麦召开内阁会议。会议一致决定，在找不到其他途径筹措战费之前，既不召开议会，

也不要求借款。但会议在其他问题却分裂了。第一，会议以5票对3票决定，在召开国会之前，取消正在审议的赋税借贷。第二，会议多数决定，不可能发行由国会授权的修建西里西亚铁路的贷款，不能把它用于其他途径。第三，会议决定，反对使用未经国会授权的贷款。关于是否召开旧国会，还是进行新的议会选举，没有作出决定。

1864年6月13日召开御前会议，继续讨论丹麦战争的战费问题。财政大臣包德尔斯文格报告说，到5月末丹麦战争共花费1700万塔勒，用1863年的盈余530万塔勒和国库的1600万塔勒加以补偿。包德尔斯文格主张另种筹款办法，即前一天大臣会议上被否决的办法。他主张，在国库空虚之前，应要求议会授权一笔贷款，以补偿战费，俾斯麦和罗昂反对这个方案。他们主张不要议会授权，而是采取紧急措施来贷款。俾斯麦提出，宁可由银行贷款，他们只要求由财政大臣签署或内阁多数人签署即可。他坚持接受其中一家的贷款。他主张，在未来的战争中，要越过国会，而不要根据国会的要求去取得战争经费。财政大臣包德尔斯文格和内阁多

数成员反对这种破坏1850年宪法的行为。包德尔斯文格指出："只要是国王陛下的大臣，就必须考虑要遵守对宪法宣誓的誓词，而不能考虑未经国会授权、同这个誓词不相容的国家贷款。"他更反对使用已被授权修建铁路的贷款用于其他目的。内阁多数成员支持财政大臣，反对俾斯麦，会议未作出任何决定。

对丹麦战争结束，1864年10月30日签订最后条约。之后两天，布莱希罗德写信给俾斯麦祝贺胜利，同时提出成立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国家银行，它享有发行货币的权力，以便为未来的战争筹措战费，并为修建东北海运河筹措资金。罗思柴尔德和索罗门·海涅的汉堡银行都支持这项计划。布莱希罗德要求俾斯麦给以优惠，但这家终未成立起来。

1865年1月，国会召开正常会议。内阁和议会的冲突重新开始。国王致开幕词，指出对丹麦战争的胜利是军事改革的结果，劝国会接受军事改革，履行宪法，结束宪法冲突。这时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自由派希望和解，俾斯麦和罗昂也想妥协。会议仍然就军事改革和预算两个问题进行争论。自由派虽然有所软化，

但在这两个问题上绝不让步。3 月 27 日，国会以多数票否决 1865 年的军事预算，提出军费要削减，社会和教育经费要增加。一个月后，国会完全否决了军事改革，罗昂陷入极端悲伤的境地。他说："我感到，而且确切地感到，需要行动。""如果行动证明是行不通的，那时我只能预言斯特拉福的命运（查理一世的大臣，1640 年被处死），突然的革命将取得胜利。"他说："我并未精疲力竭，但是我的忍耐和冷静已达极点，我是可有可无的，到该离开的时候了。"

1865 年 5 月份，财政大臣包德尔斯文格向国会提出丹麦战争的决算，总数 2250 万塔勒，其中一半出自国库，一半来自年度盈余。上月份军事大臣罗昂还向议会提出建设海军预算 1900 万塔勒（包括修建基尔港），以后 6 年内每年海军还需 1000 万塔勒。6 月 13 日，国会宣布，政府未经授权使用国库的储存是违宪行为，内阁要对这些经费负责。对于丹麦战争的军费和海军建设经费一律否决。同一天，俾斯麦猛烈抨击反对派，谴责代表们阻碍国王外交政策的推行，有利于普鲁士的敌人。6 月 17 日俾斯麦宣布国会闭会。他深有感触地说：会议的结果没有完成

众所希望的协定，而是把应该合作的那些力量再次造成相互分离。

在国会开会期间，俾斯麦同反对派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反对派主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科学家卢道夫·威尔绍质问俾斯麦是否诚实？俾斯麦向威尔绍挑战，两个决意决斗。布莱希罗德大为惊讶，当代的首相竟然要同反对派进行决斗，这种方式太古老了。他把事情通知凯德尔。经过他们的斡旋，决斗取消了。布莱希罗德写信对詹姆斯·罗恩柴尔德说，俾斯麦心情烦躁，反映他对继续冲突的不安。胜利并没有改变国会的态度，战费仍然没有解决。能否取得另次胜利？取得多少次胜利才能使国会同意军事改革，才能批准战争经费！？

1865 年 6 月，对奥地利的战争已经临近了。如何筹措战争经费？6 月 19 日国王召开王室会议，讨论如何对待国会的问题。国王提出三个方案：一是立即解散它；二是 1865 年秋天解散之；三是重新召开现在国会，如果它反抗就立即解散它。罗昂则主张要尽快地解散国会，然后由国王向全国发出呼吁。如果这也失败，就颁布新选举法。欧伦堡反对这个意见。他认为，这样一项

计划有可能削弱君主制，并可能造成实现普选权这一危险途径，无安全可言。俾斯麦则指出，"长期以来他就相信，现行的宪政普鲁士不能长期统治。对它进行重大的有深远意义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只是什么时间进行打击的问题。"他主张采取措施、并打击自由派。他认为，过多的选举只能煽动反对派的精神，意味着政府更多地依靠多数。因此，俾斯麦希望在1866年1月重新召开现德国会，并解散它，尽量推迟下一次选举。俾斯麦指出，这样的机遇可能造成外部形势的变化。他要求，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去削弱金融市场上给奥地利的贷款。国王同意俾斯麦的主张。

1865年6月初，俾斯麦正在考虑同奥地利战争的可能性，对国家的财政状况极为不满。他讨论了几个筹款办法，都遭到财政大臣包德尔斯文格的反对。俾斯麦指出，如果筹款不成，"我将向陛下说明，我将中止我们对外政策的整个事业。战争的危险在增长，新的奥地利政府证明是不调和的。"7月份，俾斯麦同布莱希罗德举行会谈。俾斯麦要求布莱希罗德动员罗思柴尔德领导一个借款团，把钱借给海外贸易公司，

公司再把钱借给政府。7月中旬，在布莱希罗德的调解下，俾斯麦同科隆—明登铁路公司签订协定，确定给政府提供大批贷款。国家在这家公司有1/7的股票，并保证铁路债券3．5%的利率，并有进一步动员股份的权利。布莱希罗德提出一份备忘录，主张国家出卖上述权益，遭到商业大臣的反对，认为国家由此会丧失3000万塔勒的收入，而布莱希罗德的计划只能提供1000万塔勒的补偿。几经周折，1865年7月18日，俾斯麦政府同科隆—明登铁路公司签订最后协定，政府可得到1300万塔勒的现金，取消了购买股票的权利。这1300万塔勒中，1865年10月1日前交现金300万塔勒，1866年1月2日前交270.5万塔勒，其余额重新作为政府股票。这一协定送交国王和公司股东们批准。

7月21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去加斯泰恩途中，在累根斯堡召开会议，研究对奥地利的政策。俾斯麦由于战费有望，对外政策采取强硬态度。他写信给王太子说："在累根斯堡会议上陛下作出决定之后，为了完全动员和1～2年内战争所需经费是足够的，大约6000万塔勒。一个星期后，罗昂对俾斯麦的老朋友莫里兹·

冯·布兰肯堡说："我们有钱了，足够让我们放手推行外交政策。如果需要，足够动员全军和支付整个战争的经费。这给我们对奥地利的立场以必要的冷静，以致我们可以希望他们将不要战争而接受我们的合理要求，我们没有人希望战争……钱从哪里来？不违反法律，主要通过同科隆—明登铁路的协定，我，甚至巴德尔斯文格都认为协定是有利的。"

7月17日，布莱希罗德报告说，卡尔·迈耶尔·冯·罗思柴尔德国海外贸易公司主席奥托·冯·康普浩森就接受1859年普鲁士900万塔勒贷款一事进行谈判。这笔钱还未从海外贸易公司帐户汇过来。罗思柴尔德同意接受未付款总数一半的98%，经过谈判提高到99%，最后达到99.5%。康普浩森坚持按票面价值付款。谈判破裂。政府仍然没有拿到钱！

俾斯麦所以同奥地利签订加斯泰恩条约，其中原因之一是政府还未凑足足够的战费。加斯泰恩条约签订后，俾斯麦任命布莱希罗德为普鲁士付给奥地利购买劳恩堡款项的代理人。条约规定，购买劳恩堡款项为250万丹麦帝国塔勒。普鲁士国库把钱付给布莱希罗德，布莱希

罗德再把钱付给奥地利的相应部门，即维也纳的罗思柴尔德银行，布莱希向德从中提取1%的佣金。

1866年1月15日，俾斯麦召开国会会议。政府同议会的冲突仍然没有和解的希望。政府连军事改革方案都没有提出来，因为估计议会不会通过。议会组成一个委员会调查政府同科隆—明登铁路公司签订的协定是否符合宪法。布莱希罗德的老朋友，反对派法学家爱德华、拉斯卡尔尖锐地就这个问题提出质问，他认为，允许政府不经国会同意就出卖国有财产，就等于给政府开一张空白支票，这样议会将让出批准预算的权利。委员会的报告明确指出："协定是不合法的，因为未经国会批准，政府出卖国家财产，以便有钱用于可能的冲突。一个议员已听到同样出卖萨尔煤矿的事件。"委员会的报告提出，双方都要负责任，因为这项协定可造成对法律的轻视。报告提出后24小时，俾斯麦突然宣布国会闭会。多数代表共同约定："不给本届政府一分钱！"并且要求政府把这些年未经国会批准的钱交出来。据说，奥本海姆要求，如果国会正式取消这项协定，政府要交还从科隆—明登

铁路公司拿到的钱。议会同样认为，购买劳恩堡同样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宪法规定，国王成为外国领土的所有者需要议会批准。

俾斯麦反驳议会的这些意见，嘲笑与谩骂相结合。他对议会反对派采取镇压措施。普鲁士最高法庭规定，议员要对在议会中的发言负责。议员卡尔·特维期丁由于在议会中的发言而被起诉。反对派的愤怒已达极点，宪法冲突越来越尖锐。布莱希罗德报告说："普鲁士的内部事务混乱不堪，政府和议会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

当时在普鲁士没人知道怎样解决这场宪法冲突。有些人像曼推菲尔仍然主张政变。有些人像哥尔茨则主张进行改革，推行更自由的制度，推行德意志民族主义政策，由他来担任首相。俾斯麦则采取另外的方针，即激化同奥地利的矛盾，转移国内视线，把内部冲突和对奥地利的矛盾结合起来，互相抵销。他在议会上宣布说：他的侵略性的对外政策是内部对国会斗争的一种手段。

国会闭会后几天，召开御前会议，决定：除非奥地利投降，否则就是战争。普鲁士紧张地进行军事和外交准备，但战争经费仍然准备不足。

财政大臣包德尔斯文格在筹款方面困难重重。国会寸步不让，柏林金融市场动荡不稳。在关键时刻，布莱希罗德多方为俾斯麦筹款。他首先找詹姆斯·罗恩柴尔德，希望他组成一个借款团，购买科隆—明登价值8000万塔勒的股票。但是被罗恩柴尔德拒绝了。他对布莱希罗德说："不为战争提供任何经费是我们银行的原则，即或我们无力阻止战争，至少我们的思想是明确的，没有给战争贡献什么！"

布莱希罗德从1866年1月起就同詹姆斯·罗恩柴尔德商谈出卖萨尔煤矿问题。这项谈判由俾斯麦直接指示布莱奂罗德进行，不让财政大臣和商业大臣知道。3月中旬，布莱希罗德给俾斯麦写好财政备忘录，但同财政大臣罗德尔斯文格讨论并达成协议。普鲁士在准备对奥地利进行战争。3月28日，俾斯麦说服国王增加军事力量，为一半炮兵购买马匹。3月31日举行内阁会议，听取俾斯麦提出的德意志问题的意见。4月9日，他提出重建德意志联邦的计划，建立民族议会，实现普选权。一天前，普鲁士同意大利签订军事同盟。

关键不是战费。3月末财政大臣包德尔斯文

格在公开场合出售政府的科隆—明登铁路股票，但是不降价卖不出去。3 月 24 日他通知内阁同僚，他可以筹集 400 万塔勒，为此需要国会批准一笔贷款。

到 1866 年 6 月份，普鲁士已决定对奥地利进行战争。军事大臣罗昂把对奥战争预算交给财政大臣包德尔斯文格，动员全部 9 个军团战费要 2400 万塔勒，国外每月要追加 600 万塔勒。财政大臣包德尔斯文格接到这个计划后，毫无办法，徘徊在动物园里，精神错乱。他去拜访贴现公司的首脑阿道夫·汉泽曼，征求意见并求得安慰。他接受了两项紧急措施：第一，为了解决严重的信贷缺乏，政府在 5 月 18 日同意成立各种公共信贷机构，计划出售 2500 万塔勒债券，以购买各种战争物资。第二，废除现行一切对利率的限制。这两项措施都未能顺利执行。债券的印刷推迟到 6 月底，它的推销遇到强烈反抗，人们高喊："不接受非法的钱！" 5 月 30 日，包德尔斯文格写信给俾斯麦说："他既没有足够的钱去支持战争，更没有足够的保证下两个月之后有的基金。"

政府出售债券困难重重。海外贸易公司准

备在巴黎出售债券，但没有一个人愿意购买。政府无法筹集战费。5月31日，俾斯麦接到财政大臣包德尔斯的辞呈。俾斯麦立即任命冯·海德为财政大臣。海德任命第二天，召开御前会议。海德主张，尽管困难重重，对奥地利的敌对行动要立即开始。他怕进步党人继续反战会影响人民的情绪。国王和俾斯麦同意这个观点，海德提议，由汉泽曼成立一个借款团，购买科隆——明登铁路公司股票。汉泽曼立即同布莱希罗德商量。两人都同意买价为110塔勒，而当时市场价格为117塔勒。其他人利用政府急需款项之机坚持105塔勒。康普浩森告诉海德，只有他和布莱希罗德愿意出合理的价格。海德决定通过海外贸易公司逐步出售。布莱希罗德在出售科隆—明登股票，为普奥战争筹集战费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俾斯麦未忘记，在战争即将来临之际，除汉泽曼和布莱希罗德外，普鲁士银行家都使他失望。

革命：俾斯麦和拉萨尔的会谈

1863年2月3日，拉萨尔的朋友、音乐家

汉斯·标洛夫写信给拉萨尔说："在一次有许多要人出席的招待会上，他听到关于拉萨尔和俾斯麦之间协定的意见。"拉萨尔看到这封信后非常高兴，赶忙回信说："从你的消息可知，我已经是俾斯麦的同谋。这样真好！如果有时间，请更详细谈谈。"

1863 年 5 月 11 日，俾斯麦写信给拉萨尔说：

"阁下：我最尊敬地通知您，由于目前正在进行关于劳工阶级状况的会商，听取研究这个问题，持有独立见解的人们的意见是合适的。因此，我希望阁下您能对我阐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冯·俾斯麦"

这封信没有确定是书面谈还是口头谈。从顾问齐特尔曼给拉萨尔的通知看，是决定口头面谈。通知说：阁下，最诚恳地请您在约定的时间光临。1863 年 5 月 12 日，拉萨尔去拜访了俾斯麦。这次会谈的内容从俾斯麦上述便笺和1863 年 6 月 8 日拉萨尔给俾斯麦的信中可看出。在会见中，拉萨尔向俾斯麦提出一系列社会性质的问题。如征收间接税，国家帮助组织生产

合作社等，他们同样谈到国家的政治状况。俾斯麦非常关心关于革命的说法究竟有多大现实性。拉萨尔让俾斯麦相信，即使政府走向绝对专制主义，现时起义也是不可能的。他们谈到国内形势有关的问题，谈到宪法冲突和德国统一问题。俾斯麦向拉萨尔通报了自己的打算：用“铁和血”统一德国。拉萨尔没有反对解决民族问题的这条道路，但是他指出，这个问题的解决要依靠群众的情绪，群众在和平时期由实行三级选举制的结果而丧失了政治力量，但是在军事时期却可以获得它。与此相关，也谈到改革选举法，实行普选权。俾斯麦告诉拉萨尔，国王不想从根本上改变宪法，但他，俾斯麦将说服国王实行普选权，同人民达成协议。

拉萨尔同俾斯麦会谈中也谈到建立工人组织问题。1863年6月8日，拉萨尔给俾斯麦信中，把全德工人联合会章程称作是“我国的宪法”。拉萨尔使俾斯麦相信，工人阶层就其本质来说不像所描写的那样民主。拉萨尔在谈到章程的原理时指出，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本能地趋向于专政”。拉萨尔告诉俾斯麦，工人赞成承认君主制为社会专政的体现者，如果他们相信，

它是为他们的利益的，如果它从特权阶层的王权变成社会革命的王国的话。拉萨尔要求普鲁士君主制成为社会王国。

1863年5月23日建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当选为主席。6月8日，拉萨尔写信给俾斯麦，要求第二次会见。

第二次会见是在1863年6月8日和15日之间进行的。这时，5月21日俾斯麦刚刚解散议会，6月1日颁布出版法。在会谈中，拉萨尔警告俾斯麦，不要采取这些强硬措施，因为“他们引起这样的不满，以致不能同人民建立某种联盟”。这时正在进行议会的选举。拉萨尔再次提出实行普选权，他认为这是取得选举胜利的唯一办法。他甚至吓唬国王和俾斯麦说：“进步党人要推翻王位。他们谈到在选举中一起反对“共同敌人”的问题。拉萨尔写信告诉洛贝尔图斯，他从瑞士回来后立即开始反对进步党人的运动。

1863年9月，拉萨尔在佐林根和莱茵地区其他城市发表反对进步党人的演说，即《庆宴、报刊和法兰克福议员大会》，即所谓《莱茵阅兵演说》。关于拉萨尔这篇演说，当代人和历史学

家有许多评论，这里把它如实地介绍出来，让时人评说。

拉萨尔首先谈到对普鲁士宪法冲突的看法。他说："当政府实际上取消了议会的预算批准权，不顾政府开支项目已被议会拒绝，一意孤行坚持军事改革的时候，我就作为民主党派的一个代表在自己的小册子《现在怎么办》中要求议会发表声明，只要还有那种被议会否决的开支，在普鲁士实际上就没有宪法，并要求议会能够因此进一步决定，议会休会并拒绝任何议会磋商活动，直至政府拿出证据，证明它已停止支付被议会否决的开支。"

他在演说中批评进步党人的无限软弱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了。他说："当举国应该悲哀痛绝的时候，他们却在举行庆宴，法国人几乎总是在革命胜利后才举行庆宴的，他们却是在自己失败之后举行庆宴。为了逃避现实的斗争，他们举行庆宴，这些残兵败卒酒足饭饱之余唱起凯旋曲来了。"

关于德国统一，拉萨尔表明下列观点。

第一，反对民族联盟和进步党人维护1849年帝国宪法。他说："回到法兰克福帝国宪法

——这不是我的观点，不是我们的观点，对于我们来说，恢复法兰克福帝国宪法的想法，只能是一种反对的空想。对于我们来说，法兰克福帝国宪法在1849年颁布之日就只是最终表明联邦虚弱无能的证据。”

他继续说：“因为一种德国的统一，一种统一的最高的中央权力，同时存在着二十四个不同的特别的主权，这是自相矛盾的，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正如黑外衣不可能同时又是白色外衣一样。主权，不管它在君主或人民手中，就其本性来说是不可分割的，正如一个人的心灵是不可分割一样。”

第二，他主张：“要谈德意志的统一，我们就必须真正做到使二十四个独立的特别的主权不复存在，并沉没到唯一的主权中去。”

他说：“我们的人民，通过巨大的、延续几个世纪的共同劳动，已经获得了精神上的统一。我们不知道什么普鲁士的诗歌和奥地利的诗歌。不知道什么南德意志科学和北德意志科学。不知道什么奥地利艺术和普鲁士艺术等等。在精神生活的一切领域，我们确实达到民族统一，达到作为德意志人的存在；因此，我们还必须要

求和达到的，就是在历史和政治方面同样的统一。同样的民族存在。”

第三，他反对联邦制。他说：“联邦制一般说来从来也没有能够产生出一个统一的民族。”他引证德国伟大的思想家菲希特的话说，联邦制从来没有产生一种民族感情。他同样以美国为例，说明华盛顿确立的联邦制，结果是产生分立的倾向。”

拉萨尔对普鲁士议会选举的态度。1863年9月3日，普鲁士政府解散议会，进行重新选举。他认为，面临的选举没有原则意义。因为，第一，普选权尚不存在；第二，现行的普鲁士宪法是不合法的。他详细论述了1850年普鲁士宪法不合法的理由。但是他认为，目前面临的选举却对我们有极大的策略意义。他对听众说，这种策略意义要求你们，凡是在进步党人不是本来有绝对把握取得胜利的地方，要投进步党人的票，理由是：在这斗争中我们必须支持弱者。”他又说：“从我们这方面讲，必要时，必须注意不要让反动派把进步党人吞掉。”

拉萨尔的演说受到当地进步党人市长的干涉。1863年9月27日拉萨尔拍电报给俾斯麦

说：

“进步党人市长在10名武装宪兵和许多手持出鞘军力的警察陪同下，刚才毫无根据解散我所召集的工人大会。我根据结社集会法进行抗议，但是没有用。我勉强制止了人群（包括射击协会大厅里的五千人和外面的数千人）动武。宪兵们和以为我被捕的数千人民群众伴随我来到电报局。埃菲尔工人的旗帜被没收了。请尽快地依法给以最严肃的处理。”

俾斯麦谴责了该市市长。

1863年10月22日，拉萨尔从莱茵省回到柏林。10月23日他写信给俾斯麦，要求再次会见。信说：

“阁下：根据报纸上消息来判断，佐林根市长在他提交的报告中歪曲了那里的事件。

从那些促使我就此问题直接给阁下拍电报的考虑出发，我现在更希望有机会亲自向阁下更详细的说明。

因此，阁下，如果您能给我指定您方便的时候（星期一的晚间除外）进行谈话，那我将感谢您。”

10月23日，俾斯麦马上回信说：

“阁下，如果您能在今天12点光临，我将十分感谢；如果这对您不方便的话，那就在明晚8点。

致崇高的敬意。”

1863年10月23日，拉萨尔同俾斯麦进行第三次会谈。会见前他获悉，他的著作在杜塞尔多夫被没收。谈话的第一个内容是从佐林根事件和警察没收他的著作开始的。他请求俾斯麦保卫他的鼓动和他的著作，俾斯麦答应了他的请求。拉萨尔随后要在柏林进行宣传鼓动，他请俾斯麦注意警察的行动。俾斯麦认为促进拉萨尔的宣传鼓动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既然它不反对国家的利益。谈话的第二个内容是同1863年10月选举有关。俾斯麦为了保证保守党人在选举中胜利，企图建立保守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联盟。俾斯麦说：“由于你们的选举人很少有希望当选，你们为什么不同保守党一起投票呢？”俾斯麦说：“在反对资产阶级取得权利这点上，我们的利益同你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你们从你们的立场去奋斗，正如我们从我们的立场去奋斗一样。”拉萨尔回答说：“阁下，看来工人党和保守党之间的联盟现时有可能性，但是我们

共同沿这条道路只能共进很短路程，然后我们将比以前更加激烈地反对。”俾斯麦说：“我明白您的意思，我们两人的问题是谁同魔鬼一起吃樱桃，我们将来见分晓！”看来是句玩笑话，但俾斯麦却理解为，在苏尔兹—德里奇及其他进步党人提名为候选人的那些地方，拉萨尔要促使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投保守党人的票。谈话结束时，俾斯麦讯问拉萨尔的各项工作，关心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人数和活动。

1864年1月8日，柏林已传出要解散议会的消息。1月9日拉萨尔写信给俾斯麦说，如果这些消息有某种理由，那么他希望在公布选举法甚至在制定选举法之前能进行会见。他信中说：

“目前谣传，议会行将解散，同时钦赐普遍的直接选举权。如果这些谣传好坏怕有一点根据的话，我希望赶紧同您面谈，无论如何要在公布选举法甚至在制定条文本身以前。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因迫使我这样做。我请求阁下在这种情况下给我指定对您最方便的时间同阁下进行商谈。

致崇高的敬意！

忠实于阁下的斐·拉萨尔”

1864年1月12日，拉萨尔同俾斯麦进行第四次会谈。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改革选举制度。他们讨论了选举的细节和技术问题。俾斯麦准备实行普选权又打算限制它。拉萨尔则主张：“被选权必须绝对地授与所有的德意志人，这是一种极大的权力手段，这是真正‘在道义上’征服德国。”在谈话中很可能确定由拉萨尔起草一部选举法，然后把它交给俾斯麦。从1月13日信中可以看出，拉萨尔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委托给他的工作。他说：“关于选举的技术，我昨晚把全部法国立法史翻阅了一遍。”他说：“我经过深思熟虑，现在确能向阁下呈献所希望的仙方，以防止选举弃权和选票分散。这些方法十分有效，丝毫勿庸置疑。”1月16日信再次强调他的仙方的有效，希望亲自同俾斯麦面谈，并提出1月17日（星期天）去拜访俾斯麦，并要求选择一个我们都不会被妨碍的晚上。

拉萨尔起草的选举法草案共25条。第一条规定，实行普遍的和直接的选举权。第四条规定，凡按国家法令规定达到成年的选举人，在他有永久住址或住过3个月的该乡镇享有全部公

民权者，都是选民。第五条规定，凡享有全部公民权并年满25岁的德意志人都是选民。第六、七条规定，候选人可由政府提出，任何人也可以主动提出，由区长在选举前一星期加以公布。第八条规定，实行不记名投票。把全国划分为拥有10万人口的选区，每选区选5名议员。每选区再分选段，每选段有500选民。同时规定了具体的选举办法和程序。这些规定还够不上普遍的选举权。居住不满3个月的工人和手工业者被剥夺了选举权。

拉萨尔把拟好的选举法送给俾斯麦，屡次要求讨论这个方案并作出最后决定。俾斯麦始终未予答复。从1864年1月21日拉萨尔给俾斯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没有会见。信中说："如果您，阁下，再审阅一遍不久以前呈上的草案，就请您通知我，而且在那种情况下请允许我同阁下更详细说明对于目前只是拟议中的电报条例的意见。"

拉萨尔同俾斯麦的第四次会谈是在1864年1月初进行的。会谈的时间很短，因为这时俾斯麦很忙。在会谈中俾斯麦答应即将实行普选权，但没有确定时间。拉萨尔坚持要在战前实施

普选权。1月末拉萨尔写信给俾斯麦说：

"阁下：

因为看到您非常忙，我确实不愿意把今天的交谈继续下去。这次交谈迫使我再次向您提出内心的告诫。您一定会对这告诫给以您认为应有的重视。您应当在战前就赐予普遍的和直接的选举权，因为无论在战时或在战后您都不可能赐予这种权利。"

拉萨尔同俾斯麦的第六次会谈是1864年4月。现在还不清楚这次会谈是谁提出来的。1869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杂志《旅行家》上刊登一篇署名文章《俾斯麦与拉萨尔》。文中谈到他们会谈是在4月份进行的，丹麦战争刚刚结束以后，拉萨尔从柏林动身（5月8日）以前不久。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以及选举改革问题。拉萨尔对普奥共管两公国表示不满。他对俾斯麦说，还在1859年他就主张把两公国统一于普鲁士，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俾斯麦回答说，在当前实现这一点是有困难的，因为奥地利不同意。俾斯麦说，这意味着同奥地利战争，这在当前是不希望发生的。

拉萨尔向俾斯麦指出，同奥地利战争不可

避免，早晚都要发生。因此他认为这不能成为放弃吞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借口。拉萨尔再次重复自己的要求：推行普选权，进步党将被战胜。俾斯麦说，国王惧怕公开修改宪法。俾斯麦认为，解决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和改革问题只是改组整个德意志联邦的手段。俾斯麦也对拉萨尔谈了他自己的改革计划，主要是规定实行直接的选举权，所有德意志人，不论出身都有选举权。拉萨尔接受这个计划。他同俾斯麦告别时说："我把兼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列入自己的纲领。"俾斯麦回答说："看来你们的纲领的这一点要执行，但要晚一点。"

后来，俾斯麦在帝国议会里说："作为私人，拉萨尔身上有某些东西极大地吸引着我。在与我交往的人中，他天才横溢，雄心勃勃，胸怀大志……我们的谈话持续几个小时，我总是以谈话结束而遗憾……我想，我会仍然赞同，我是一位虚心而聪明的听众。"

第八章　纵横捭阖

外交形势纵横谈

德国地处欧洲中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东有沙皇俄国，对它虎视眈眈；西邻法国，力图称雄欧洲，占领莱茵河左岸土地。一个多世纪以来，俄法结盟，以牺牲德国为条件，瓜分世界，称霸欧洲。德国的分裂状态，正是正统主义和维也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争取德国的统一，不仅要战胜国内的反对势力的分立势力，而且要反对外国，或者依靠外国的帮助。俾斯麦在统一德国以前，对欧洲的形势，对欧洲各国的力量对比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从而为他制定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

首先是沙皇俄国。俾斯麦指出："对于普鲁士在德意志前途来说，俄国的态度是一个具有

重要意义的问题。一种俄国对波兰的友好方针会有助于鼓励从巴黎和约甚至更早时期起就有时企求的俄法联系；而这种在七月革命以前就一直酝酿着的对波兰友好的俄法同盟会使当时的普鲁士陷入困境。为了我们的利益，就必须为反对俄国内阁中同情波兰的一派而斗争。”俾斯麦说：“我就任大臣之后，内政问题起先比外交问题来得更突出；在外交方面，由于我不久前的经历，我对俄国的关系感到特别亲近，我努力使我们的政策在彼得堡象以往那样尽可能保持住影响。”

他说：“沙皇的援助，正如尼古拉皇帝对匈牙利远征所表明的那样，在一定条件下会超越善意的中立。不能指望他们为我们的利益有所作为，但是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在法国企图干涉各国问题时，亚历山大皇帝为了制止这种企图，至少会在外交会上给予我们支持。”

他说：“因此，根据我的见解，我们有一切理由在培育亚历山大二世不顾其许多臣民和高级官吏的反对而对我们怀有的任何同情，至少为了尽可能防止俄国加入反对我们的阵营，这种培养也是必要的。当时不可能有把握地预见：

沙皇的友谊这笔政治资本在实际上能否使用，如果能使用，那么究竟能使用多长时间。”

其次，谈法国。俾斯麦说：“法国不可能长期对我国的强大和德意志的统一抱有真诚的良好愿望，但是这种信念不应该妨碍我们实用主义地接受暂时的、拿破仑由于错误的考虑而给予我们的支持和鼓励。”

然后他谈到英国。他说：“从英国那里，我们除了能得到柏拉图式的良好祝愿和教训式的书信、报刊文章外，未必还能指望别的什么东西。”

最后关键是奥地利。他对奥地利的估计是：“显而易见，普鲁士在德意志方针中的政策当时不能期待得到奥地利的任何支持。”“在德意志领域，当时首先和普鲁士敌对的是奥地利……”

阿尔文斯累本协定

俾斯麦常常说，每一个人，因而也是每个外交家，往往是：他很幸运，但是幸运走近他时，他却让幸运远远离去。他认为，巧妙的外交家和笨拙的外交家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能及时

抓住他身边飞过的幸运女神的衣襟，而后者则由于忽略而把幸运错过。

1863年1月23日，柏林收到了波兰起义的消息。俾斯麦认为，波兰问题对于普鲁士来说非常重要。他说："1863年元月1日爆发的起义不仅关系到我们东部各省的利益，而且还关系到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这就是，统治俄国内阁的是一条对波兰友好的还是反对波兰的方针，是追求俄国人和波兰人之间结成泛斯拉夫的、反德意志的同盟，还是一种俄国和普鲁士互想支持的政策。"因此，俾斯麦采取反对俄国内阁中同情波兰那一派的方针，力求俄国和普鲁士互相支持。波兰起义爆发后，普鲁士派4个军团到波森和西普鲁士周围。

波兰起义开始时，他看到俄国想放弃波兰，他就想占领波兰。他说："那时我们一定要开始行动，占领波兰，再过3年，那里就会德意志化。"普鲁士议会副议长贝伦兹对首相这些话表示怀疑，问他是正经话还是开玩笑？俾斯麦回答说："我所讲绝非笑话，是我正经地讲了正经事。"但当起义已经无望成功时，俾斯麦遂决定帮助俄国镇压波兰起义。

1863年2月第一周，普鲁士派古斯塔夫。阿尔文斯累本将军去彼得堡。2月8日（1月27日）阿尔本斯累本同俄国外交大臣哥恰可夫签订规定，共同镇压波兰起义。协定规定，普鲁士就在东部边界集结军队，军队有权在必要时越过俄国边界，俄国军队同样有权越过普鲁士边界追击波兰起义队伍。协定还规定一项秘密条款，规定两国政府交换有关波兰政治阴谋的情报。

俾斯麦对阿尔文斯累本协定的评价是："古斯塔夫·冯·阿尔文斯累本将军1863年2月在彼得堡签订的协定，对于普鲁士政策来说，外交上的目的高于军事上的目的。在俄国沙皇内阁中，这项协定表明了普鲁士的政策，即支持俄国镇压波兰起义的政策，战胜了以哥恰可夫、康斯坦丁大公、维洛波尔斯基和其他有影响人士为代表的波兰政策，即支持波兰起义的政策。"他认为，"这项协定在军事上无足轻重，在军事上俄国并不需要这个规定，俄国军队是够强大的，但在外交上对普鲁士来说则是一次成功，它决定了俄国内阁内反波兰和亲波兰斗争的结果，即以前者胜利而结束。"对于俾斯麦来说，它

防止俄法结盟。

阿尔本斯累本协定引起英法两国的关注。英国大使对俾斯麦说："欧洲绝不允许普鲁士军队去帮助俄国人。俾斯麦镇静地问："谁是欧洲?"大使回答说："各大国。"俾斯麦问："他们要联合起来吗?"英国大使未作回答。俾斯麦顶住了英法两个大国的干予。

在国内，普鲁士议会里的自由派同样反对阿尔文斯累本协定。议员特维斯丁、瓦尔德克、威尔绍等人在议会发言激烈反对这个协定。他们说："当俄国人宣战时，政府抛弃500平方里拉（每里拉为3英里）土地遭受战争的恐怖蹂躏。"他们说："普鲁士的血不应为这样一种政策而流淌。"他们说："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由于牵涉到一场可怕的人猎当中去而受拖累。全部欧洲都憎恨这场战争。俾斯麦反驳说："一个独立的波兰能让她的邻国普鲁士占领但泽和托伦吗?牺牲祖国而取悦于外国民族主义的倾向是德国特有的政治病!"

阿尔本斯累本协定引起波兰人民的极大愤怒。俾斯麦收到一封来自波兰的信，信用黑色带子捆着，装在一个小盒子里，信中宣布判处俾斯

麦死刑。另一封信来自西班牙的巴塞罗纳。信中说："革命宣传下列署名的委员会把你交付审判法庭。法庭一致宣判你死刑，并决定下月第一个星期内执行。"

普王威廉一世对国外的反应也感到惶惑。2月23日，星期一，俾斯麦甚至想辞职不干了，但威廉一世不同意，他要求首相在自己政策的废墟中拯救普鲁士。

阿尔文斯累本协定并未经过批准，实际上也未执行。还有的说，俾斯麦根本不知道签订这个协定。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12年来俾斯麦梦寐以求的是，同俄国结盟，避免俄法结盟，争取在德国统一中沙皇俄国的中立。俾斯麦利用波兰起义的时机，利用奥地利和英法共同反对俄国的时机，同俄国结盟，这是一着决定性的棋。这是一步妙棋，显出俾斯麦外交家的本色。它改变了维也纳会议以来欧洲的政治格局，为德国统一创造了条件。俾斯麦说："阿尔文斯累本协定是他的通盘政策的主要支柱。协定意味着柏林和圣彼得堡政策的巩固。若不消除东方的后顾之忧，普鲁士是不敢在南方和西方进行战争的。"

同拿破仑第三的会谈

1862年9月，俾斯麦担任普鲁士王国首相兼外交大臣。当年10月最后一周，他重返巴黎，向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递交召回国书。仿佛这是一次例行的外交礼节，是一次愉快的旅行。10月30日，俾斯麦同凯蒂·奥洛夫在枫丹白露的特鲁别茨科埃庄园度过。3天后，他去巴黎参加正式的告别仪式，受到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和皇后欧仁妮的盛 情接待。此间，俾斯麦同拿破仑第三进行亲切友好的会谈。这时普奥两国关系逐步恶化，因此俾斯麦力图了解拿破仑第三对即将发生的普奥军事冲突的态度。俾斯麦得到印象是，皇帝不想在德意志内部冲突中偏袒任何一方而对自己不利。俾斯麦在11月21日写信给贝恩斯托夫说，拿破仑非常热心调节我们国内冲突，同时竭力阻止普鲁士在德意志扩大势力，鼓励奥地利在法兰克福召开大德意志会议。俾斯麦对拿破仑第三说："我们国内虽然有250名代表在喊叫和同样数的捣蛋鬼，但我们国内没有任何困难，一切顺序。"

俾斯麦了解到，拿破仑第三为了在海上同英国竞争，很想依靠普鲁士、意大利和丹麦的海上力量。因此他竭力促进解决这三个国家的民族问题。但是第三个国家单靠自己力量无力解决这些问题，而是要依靠他的支持。他希望普鲁士像意大利一样，同法国结盟，依靠法国。

俾斯麦了解到，拿破仑第三十分关心普鲁士的内部冲突，这样就会使普鲁士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同时鼓励德意志各中小邦，同奥地利站在一起，保持德意志的分裂状态。这样普鲁士就要谋求同巴黎结成同盟，使德意志的统一事业要依靠法国，争取拿破仑第三的恩宠，服从巴黎的指挥棒，普鲁士成为法国的卫星国，由此建立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并在他的卫星国的帮助下进一步削弱英国的海上势力。

俾斯麦摔杯子：法兰克福君主大会

1863 年 8 月，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接受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的邀请，在首相俾斯麦的陪同下，来到奥地利的加斯泰恩进行疗养。

8 月 2 日，加斯泰恩阳光灿烂，气候宜人。

俾斯麦坐在瓦尔岑贝格庭院的枞树底下，悠然自得。小河流水潺潺，从庭院旁边流过。俾斯麦手里拿着表，观察树上山雀窝里的鸟儿一分钟给小鸟叼回几条毛虫或其他害虫。同时他看到普王威廉一世正坐在河对岸席勒高地一条长凳上。午饭时间，俾斯麦回到寓所，看到国王写给他的一张便条，说他在席勒高地等俾斯麦商谈会见奥地利皇帝事宜。俾斯麦急忙赶到国王寓所，这时两位君主的会谈已经开始了。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邀请普王威廉一世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参加由奥皇召集的各邦君主大会，讨论奥地利提出的改组德意志联邦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准备成立由六位君主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奥地利担任主席，普鲁士担任副主席。同时成立帝国议会，分为诸侯院和人民院。奥皇建议 8 月 16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各邦君主大会，请威廉一世与会。

普王威廉一世对这一邀请犹豫不决。奥皇的印象是，威廉一世并不讨厌这一计划。俾斯麦在回忆录中说，普王喜欢这一计划可能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君主团结起来同议会进行斗争这一因素，因为他本人在柏林正受到议会里自由派

的逼迫。俾斯麦很后悔。他说："如果我观察大自然少耽误一点时间并能早点见到国王的话，那么皇帝的建议给国王的最初的印象就可能会不同。"

俾斯麦坚决反对国王威廉一世参加这样一次会议。他指出："如果我放弃反对国王前往法兰克福的意向，顺从他的愿望陪同前往，在各邦君主大会上把普奥间的竞争转变为反对革命和立宪主义的共同斗争，那么普鲁士在外表上会依然一如既往，自然在可能通过联邦议会的决议在奥地利的主持下，以类似汉诺三、黑森、梅克伦堡以及利佩、汉堡、卢森堡已实行过的方式，修改自己的宪法；但是这样一来也就关闭了民族德意志的道路。"他认为国王"没有察觉到在这次突然袭击的邀请或者说限期很短的邀请所包藏的贬抑"。

俾斯麦下定决心说服国王不去法兰克福。俾斯麦陪同国王从加斯泰因前往巴登，在中途的毕尔巴德遇见王后伊丽莎白。王后也赞同俾斯麦前往法兰克福。俾斯麦回答说："如果国王不改变决定，那么我就去，并在那里料理好他的事务，但是我不再作为大臣回柏林了。"这句话

使王后不再在国王面前反对俾斯麦的见解了。

俾斯麦同国王乘一辆小敞蓬马车从毕尔巴德前往巴登，同车还有几个人坐在马夫座上。俾斯麦用法语同国王交谈。他对国王说，这次邀请意味着一次侮辱。他说，国王在奥地利的疗养地进行水疗，可是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并没有正式拜会他，就宣布在短短几天内召开各邦君主大会，使普鲁士对这样重要的一次会议都来不及准备。威廉一世对拿破仑一世对他父亲（弗·威廉三世）的蔑视和1812年德累斯顿会议上受到的侮辱记忆犹新。因此他接受俾斯麦的建议，拒绝了奥皇弗兰茨·约瑟夫的邀请。他们到达巴登时，俾斯麦一块石头落地，放心了。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各邦君主大会在奥地利主持下如期召开了，庄严而隆重。但是会议一开始就笼罩一层阴影。各邦君主感到，没有普鲁士国王参加，要想通过一项德意志计划是不可能的。他们决定派遣萨克王国国王前往巴登再次邀请威廉一世。萨克森国王约翰深受普王威廉一世的钦佩和敬重。这样就再不存在侮辱的问题了。威廉一世很想接受邀请。他说："30位君主，还有一位国王当信使，我怎能拒绝呢？"巴

登离法兰克福只有150公里，坐火车3小时就可到达。俾斯麦提出新的反对理由。他说，如果国王去法兰克福接受会议的决议，那就意味着放弃一支独立的普鲁士军队，意味着在同议会议员的争吵中失败，因为与会就等于承认普鲁士军队只是联邦的辅助部队，那就不需要钱来加强军队了。俾斯麦费尽心机，口干舌燥，直到午后才说服国王保持拒绝态度。两人都精疲力竭，威廉一世签署了给萨克森国王的拒绝信，倒在沙发上痛哭起来！俾斯麦情绪紧张而激动，他离开国王寓所，关门时竟把门把手拉断了。

俾斯麦亲自去会见萨克森国王约翰，把威廉一世的拒绝信交给他。萨克森国王临别时对俾斯麦口出不逊，俾斯麦忍而未答，但没有按礼节送客。萨克森国王刚刚走到隔壁的大厅里，就听到打碎玻璃杯的哗啦声。这个声音来自俾斯麦的房间。俾斯麦回到自己房间后，拿起一只玻璃杯向墙上掷去。他向秘书承认：

“我必须损坏什么东西！”

“现在我又感到舒服了！”

俾斯麦的这些举动，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得到了确实的报告。

8 月 31 日，俾斯麦陪同威廉一世回到柏林。奥地利和各中小邦君主以改组为名保持德意志联邦为实的一幕闹剧，又被俾斯麦揭穿了。

第九章　丹麦战争

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是我的最大外交成就

1863年，在欧洲北部出现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两公国的归属问题。这在欧洲外交史是个复杂而疑难重重的问题。英国首相帕麦斯顿说："在全欧洲，还在不久之前，只有三个人了解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阿尔伯特亲王（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一位丹麦老人和我。但是不幸，阿尔伯特亲王不久以前过世了，年老的丹麦人进了疯人院，而我呢？却完全忘掉了那里的问题究竟何在。"

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两公国，加上劳恩堡，地处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的日德兰半岛的南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只要在基尔开一条运

河，就可以把波罗的海和北海联接起来。这里农田肥沃，有广阔的荒原。什列斯维希居住的丹麦人多于德国人，霍尔斯坦和劳恩堡则主要是德国人的居住地。从 1640 年以来，丹麦国王兼任两公国的大公，但两公国并不属于丹麦领土，它们只是共戴一主而已。这在历史上叫做君合国。1815 年维也纳会议又肯定了两公国的现状，霍尔斯坦成为德意志联邦的成员国，劳恩堡并入丹麦版图。1848 年革命中，两公国人民要求脱离丹麦，加入德意志联邦，成立了临时政府，发展为普鲁士和丹麦之间的战争，以签订马尔摩停战规定而结束，两公国问题仍未解决。1852 年 5 月 8 日，英、法、瑞典、奥地利、普鲁士签订伦敦议定书，承认两公国同丹麦国王个人结成君合国，但霍尔斯坦和劳恩堡仍是德意志联邦成员国，保证各公国不可分离。

1863 年 3 月 30 日，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希七世否定伦敦议定书的规定，提出丹麦对霍尔斯坦和劳恩堡享有特权。同年 11 月 13 日，丹麦议会通过新宪法，准备吞并什列斯维希。11 月 15 日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希七世逝世，克里斯蒂安九世继承王位。11 月 18 日他批准新宪法，称为

丹麦—什列斯维希新宪法。但是什列斯维希公国人民不承认他的继承权。两公国归属问题重新提上日程。

霍尔斯坦拒绝对克里斯蒂安九世宣誓，呼吁德意志联邦议会承认弗·冯·奥格斯腾堡成为独立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劳恩堡大会。奥格斯腾堡公爵回到两公国，发表宣言，开头是：敕谕我的臣民，自行宣布他是两公国的公爵。这里同样有一段历史的争论。400年来统治丹麦的是奥尔登堡家族，弗里德里希七世是这个家族最后一位男嗣继承人。伦敦议定书同意把王位传给弗里德里希七世的堂妹夫克里斯蒂安·冯·格吕克斯堡亲王。两公国人民根据5世纪末6世纪制定的继承法不得传给女嗣的规定，主张把王位传给16世纪初统治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三世的后裔奥格斯腾堡公爵。

德意志联邦议会也主张把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劳恩堡组成独立邦，由弗里德里希·冯·奥格斯腾堡亲王统治。奥格斯腾堡亲王是德意志人。这样两公国就成为德意志的领土，加入德意志联邦。

在德意志各邦，民族主义者展开广泛的运

动，指责丹麦企图同化占30%的德意志人。普奥两国在11月18日向丹麦提出抗议，各地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丹麦放弃新宪法，遵守伦敦议定书。12月2日，普鲁士下院以231票对63票通过决议，要求普鲁士政府废除伦敦议定书。

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十分尖锐的时候，俾斯麦给他的老朋友丹麦首要布来森男爵写了一封信。他说："现在我在这当首相，还有本钱。你若把斯堪的纳维亚结合成一个帝国，我将用同样方式统一日耳曼。然后我们成立一个斯堪的纳—日耳曼同盟，它足以统治全世界。我们宗教相同，文化相同，我们的语言也没有多大差别。请告诉贵国人士，如果他们不倾向于我的计划，我将不得不促使他们采取行动，免得当我去攻打其他地点时，我背后有一个敌人。"

布来森把这封信读了两遍。他们是老朋友，常常相伴打猎。初读起来，俾斯麦是在讲笑话，因为俾斯麦向来好讲俏皮话，但实际上这些话是俾斯麦的政治策略。布来森很了解俾斯麦的为人。丹麦人也时时在观察它的邻国——普鲁士的政治风云。俾斯麦的话实际上是针对什列

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讲的。

俾斯麦并不关心把两公国变成德意志联邦成员国，认为这样只能扩大反对普鲁士的势力。他所关心的是扩大普鲁士。他想利用两公国人民和德国人民要求统一的热情，把两公国变成普鲁士的两个省。他说："归根结底，我常常坚信：'同丹麦个人联合比现状好；一个独立的统治者比个人联合好；同普鲁士联合比一个独立的公国好。只有事变才能表明哪一项能成功。"

俾斯麦主张夺取两公国的领土，国王威廉一世看着俾斯麦说："但是，对这两公国我并没有权利。"俾斯麦问道："从前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国王在普鲁士和西里西亚有过任何权利吗？整个霍亨索伦家族都在开疆扩土。"国王没有回答。王太子举手向天，仿佛怀疑俾斯麦是否已经发了神经病。阁员们都不表示意见，连一向支持俾斯麦的罗昂也没发言。

这时正在召开国务会议，俾斯麦在宣读会议日程时发现他的提议没有列入议程。秘书解释说，根据国王的命令删去了这项议程，陛下认为冯·俾斯麦不愿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俾斯麦说："陛下似乎相信我中餐吃得太饱了，不愿再

听我说过的话，而我坚持把我的提议记录在案。”

俾斯麦把德国国内支持奥格斯腾堡亲王的运动称作“民主派大起义”。普鲁士驻巴黎大使哥尔茨伯爵在报告中建议国王支持奥格斯腾堡亲王以顺应民情。俾斯麦在圣诞节晚申斥哥尔茨说，在报时要根据事实，而不要修改政策。俾斯麦确定自己的外交路线是：普鲁士应该作为大国独立行动，而不是作为德意志联邦的成员国去支持奥格斯腾堡，去“追逐德国的虚假名声”。他说：“我们力量的加强，不可能来自议会政治和新闻政治，而只可来自基于实力的强权政治。”他说：“我认为现在把奥地利拉到我们一边是正确的；分道扬镳的时刻是否会来到以及由谁发难，这一点还要等着瞧。”他说：“如果伦敦和巴黎啤酒馆里那种高谈阔论的热情颇为壮观的话，这使我非常高兴，这完全合我们的心意，但是这种热情还没有因此就使我感动，并且在斗争中也不会给我们提供一发子弹和一分钱。”他说：“哥尔茨不应该听到这种诱惑人心的陈词滥调而动摇自己的判断能力。我强调说，普鲁士必须领导别人，而不是追随别人。”

普奥联盟

夺取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堡两公国，不仅涉及同丹麦的关系，而且涉及欧洲各大国的利益。因此俾斯麦采取的策略是："我今天在外交政策上的方法同我过去打水鸟时使用的方法一样。在我用脚小心试探以前，我绝不把重心放在草丛上。"就是说，他办理外交要试着一步一步前进！

他分析了欧洲各大国的态度。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普王威廉一世和俾斯麦抱有好感。因为在镇压1863年波兰起义中普鲁士支持了他。同时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国际威望下降。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奥地利反对俄国，因此同普鲁士联合，以报奥地利之仇。当时俄国国内正处于改革高潮中，内乱频仍，无暇他顾。

俾斯麦要安抚英法两国。他对英法两国表示，他绝不想把易北河两公国并入普鲁士版图，请英国首相帕麦斯顿不必担心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落入比丹麦更强大的普鲁士手中。1863年

圣诞节晚上，俾斯麦在柏林接见了法国拿破仑第三的特使。他表示对从莱茵河到波兰，他持克制态度，并希望拿破仑第三主持会议讨论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并表示不久将来把莱茵河左岸土地割让给对普鲁士抱友好态度的法国。

俾斯麦最担心的是奥地利。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认为，如果单独由普鲁士来解决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普鲁士无疑会成为统一德意志的霸主。如以他和他的大臣们竭力阻止俾斯麦的计划。因此他才在1893年8月召开各邦君主大会。

作为现实的外交家，俾斯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从反奥立场转而采取同奥地利结盟的政策。1864年伊始，俾斯麦就向奥地利驻柏林大使提出结盟问题。奥地利外交大臣莱希贝格伯爵从1863年君主大会失败之后也转变了态度，认为同普鲁士达成协议比同中等邦达成协议更为容易。莱希贝格伯爵认为，普奥联盟会使俾斯麦改变主意而支持奥格斯腾堡。莱希贝格提出，两国在条约中规定，只有在双方一致的条件下，才可以放弃伦敦议定书。俾斯麦则主

张，他的国王绝不会死抱着伦敦议定书不放。他建议普奥联盟的内容是：如果因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而开战，这两个公国的前途只有通过普奥两国协商来解决。

1864年1月17日下午，在柏林威廉街签订普奥同盟。前一天，普奥两国向丹麦克里斯蒂安九世提出最后通谍，限48小时内宣布刚刚公布的新宪法无效。

对丹麦进行战争，还要克服国内的阻力。

首先是议会中的反对派。在议会辩论中，议员普鲁道夫·威尔绍说："国王必须被告知，危险已迫在眉睫。首相在较短时间内朝秦而暮楚，采用各种不同的立场……他没有罗盘针就把快船驶往外海……他没有指导原则……那是他的弱点……他不理解人民发出的呼声……他用激烈的手段损害了德意志和普鲁士的最神圣的利益。他卖身给魔鬼，他永远逃不出魔鬼的手掌。"

俾斯麦说："今天，由350名议员组成的议会，作为最后的手段，不能指挥一个强国的政策，不能给政府规定一个必须奉行到底的纲领……不是专门从事政治工作的政治家以为在棋盘上每走一步都是下棋的结局。因此，他的幻想

是，目的是不断变化的……政治不是一门严格的科学……我不怕民主制，如果我怕民主制，我就不下这盘棋。（一个议员喊，一盘棋，一盘棋）如果议会拒绝投票赞成预算，我们必须尽我们可能筹措它们。”1864年1月，议会否决了战争贷款。他解散了议会。

关键还在于说服普王威廉一世。威廉一世举棋不定，左右为难。俾斯麦对国王说：“唯有一项强硬的对外政策，才能使军事改革的反对派闭嘴。”威廉一世郑重地问俾斯麦：“你不也是日耳曼人吗？”俾斯麦听国王这样说感到很绝望。他写信给罗昂说：“我有一种预感，王室已经没有反对革命的原因，因为国王相信他的反对派，而不相信他的臣下，听从上帝旨意！二三十年后它对我们已是无关紧要，但对我们的子孙却不同。不出现奇迹，就要输掉这盘棋，而我们要负责任……听上帝意志。他知道普鲁士继续存在多久。上帝知道，如果普鲁士亡国，我将是遗憾的。”最后他终于说服国王进行这场战争。

1864年对丹麦战争

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拒绝了普奥两国的最后通谍，他把希望寄托在英国支持上。可是，英国首相帕麦斯顿以女王和内阁不同意为借口，非常抱歉地拒绝给丹麦以任何援助。在这以前，英国外交大臣约翰·洛赛利同法国外交大臣特鲁恩·德·刘易士讨论干涉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也被后者有礼貌地拒绝了。这样，丹麦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1864年1月最后一周，普鲁士军队同汉诺威和萨克森军队一起进入什列斯维布—霍尔斯坦。2月1日，普奥两国军队到达什列斯维希。3周后它们已占领了日德兰半岛，4月中旬普奥两国军队已控制了丹麦的所有军事阵地。4月18日发生居培尔战役、丹麦军队遭到惨败。

1864年5月12日，丹麦同普奥两国缔结停战协定，10月30日签订维也纳和约，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和劳恩堡划归战胜国。

对丹麦战争结束后，俾斯麦把奥格斯腾堡公爵请到柏林。他先让国王和王太子同公爵盘

桓一天，到半夜他接见了公爵。他对公爵提出：两公国不能成为自由派进行鼓动的避难所。公爵一心想成为两公国的统治者，因此毫不犹疑地答应了俾斯麦的全部要求。他认为他的地位已经巩固。他在国王的餐桌上酒喝得多。他说，根据他的宪法条文，所有这些条文都必须得到他的所有臣民的同意。由于这一点，他的宪法等于无效。

1864 年 8 月 21 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和首相俾斯麦作为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客人来到维也纳的善布龙宫。普王、俾斯麦同奥皇以及奥地利外交大臣莱希贝格同坐在一张餐桌上。他们都带有胜利的微笑。但微笑后面，进行着智力与阴谋的斗争。约瑟夫皇帝和俾斯麦镇定自若，威廉一世和莱希贝格却惴惴不安。

俾斯麦说："现在历史已经让我们结成政治同盟。只要我们行动一致，接受德意志的领导，对于我们双方在王朝上和政治上都是极为有利的，只要我们联合起来，德意志就在我们手中。"他说："假如我们共同所得不是在霍尔斯坦，而是在意大利，假如伦巴底由两国来处理，我将说

服我们的国王绝不把我们的希望同我们同盟的希望对立起来。”

约瑟夫皇帝说：“那么，把两公国变成两个省份，或者说，普鲁士可在两公国获得某些权利。”

双方都未发言，会谈陷于停顿。威廉一世一句话也不说。

俾斯麦说：“我高兴陛下当着我国君主的面问我这个问题，我希望，我现在将听到他的意见。”

威廉一世稍加犹豫，然后说：“我其实对两公国没有任何权利，我不能要求任何。”

俾斯麦听后很不高兴，非常失望。他大喝哈布斯堡家族窖藏陈年老酒，借酒消愁。会谈双方表面仍然是和和气气非常融洽，互相以“你”相称，“陛下”“贵大臣”叫个不停。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在善布龙宫作了3天客人。俾斯麦想要求奥地利允许普鲁士两公国放手去干，而在欧洲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意大利取得补偿。约瑟夫皇帝要求得到格拉茨省，作为让出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一部分土地的报酬。威廉一世拒绝放弃这块对于霍亨索伦家族非常重要的土地。8月

24日，莱希贝格建议，普鲁士保有什列斯维希，奥地利保有霍尔斯坦，两国组成防御联盟，一旦奥地利重新获得伦巴底，就把霍尔斯坦让给普鲁士。两国君主都不同意这个计划，因为这样势必要同法国拿破仑第三进行战争。俾斯麦则对奥地利人说：维也纳和柏林的同盟不是按固定比例分红的公司，而是一次狩猎，每个参加者都拿走他自己的猎获物。

善布龙会议只达成两国共管的协议。但是问题并未解决。善布龙会谈后维也纳外交大臣易人，门斯多夫—波伊利将军代替了莱希贝格。在奥地利仍然有许多人同情奥格斯腾堡公爵。1865年2月，俾斯麦向门斯多夫提出解决两公国问题的三个条件：一是奥格斯腾堡的武装力量必须听从普鲁士的指挥；二是最重要的港口和要塞要交给普鲁士；三是允许普鲁士在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开一条运河。奥皇称三个条件完全不能接受。普奥关系紧张起来。到7月间，奥皇决定让步，派驻巴伐利亚公使布洛梅伯爵同俾斯麦秘密接触。8月第2周，布洛梅前往加斯泰因，普王威廉一世和首相俾斯麦正在那里。在这块奥地利土地上，布洛梅表示：在不影响两

国对该公国权利的情况下，暂定什列斯维希归普鲁士，霍尔斯坦归奥地利，劳恩堡卖给普鲁士，价钱250万塔勒。同时，普鲁士还可以利用霍尔斯坦的两条军事公路以及修建北海—波罗的海运河。奥格斯腾堡两国在加斯泰因正式签订协定，6天后在萨尔茨堡批准。后来一位奥地利政治家称加斯泰因协定是“猜不透的迷魂阵”，因为一看地图就明白，奥地利管理霍尔斯坦中间隔着普鲁士其他邦。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心满意足了，俾斯麦被封为伯爵，授黑鹰勋章。

第十章　普奥战争

比亚里茨会晤

加斯泰因条约签订后，欧洲舆论半不高兴半开玩笑地问："永远不分开吗?"俾斯麦回答说:"我是最后一次玩纸牌15点。我玩得如此粗野，每一个都十分惊奇；布罗姆伯爵说过，了解人的性格的最好方法是同他们玩纸牌。我想让他看看我，我输掉几百塔勒，这笔钱应作为我的办公费报销。我成功地欺骗了他，因为他相信我比他更勇于冒险，就让了步。"俾斯麦也曾对布罗姆伯爵说："可是，我绝未相信，我能找到一个奥地利外交家愿意签订这样一个文件。"普鲁士用250万丹麦塔勒买了劳恩堡后，俾斯麦很高兴地说："奥地利由于这笔买卖而声望低落。买者声明卓著，廉价卖者被人轻视。"

加斯泰因条约签订后，奥皇弗兰茨·约瑟夫想用霍尔斯坦换普鲁士的格拉茨省，被俾斯麦拒绝了。约瑟夫皇帝如梦初醒，方才明白了俾斯麦的用心，迷魂阵刚刚猜出。他开始寻求盟国、准备战争。

俾斯麦同样在准备对奥战争。他最担心的是两个国家，一是沙皇俄国，一是法国。他极力同俄国交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采取支持普鲁士的政策。对俄国他可以放心。他唯一担心的是法国。

1865 年 10 月，法国皇帝和皇后正在比亚里茨海滨度假。俾斯麦在 10 月 3 日也到达这个海滨温泉圣地。他让人们传出消息，他来此地因为夫人约翰娜身体不好，需要疗养。他选择的住处同拿破仑三世的行宫很近。出发前他就对法国驻普使馆一位秘书说，对于法国在讲法语地区扩张其疆界，他都予以承认。这里所指包括加拿大、瑞士、卢森堡和比利时。这是放出一个信息！

俾斯麦到达比亚里茨第二天即 10 月 4 日，拿破仑三世在欧洲仁妮别墅接见了他。一周后，两人共进午餐，举行第二次会议。11 月初，他们在圣克卢进行第三次会谈。俾斯麦这次旅游，

无暇去观看汹涌的海上波涛，享受柔和的海滨阳光，一心谋求同拿破仑第三的会谈。他们两人在海岸的高坡上走来走去。俾斯麦刚满 40 岁，精力充沛，两眼炯炯发光，不论向前走或者转弯，他都走在拿破仑的左侧。拿破仑比俾斯麦长 7 岁，虽不到 50 岁，但脸色焦黄、驼背、走路缓慢、神色不宁、膀胱病情严重，已经是老态龙钟了。

他们在海滨走来走去，边走边谈，斗智斗勇。俾斯麦反复想，拿破仑究竟要什么？德国一寸土地也不能送给他。他对拿破仑表示，要互相帮助，互相有所贡献。他对拿破仑暗示，普鲁士为了换取法国的中立，欢迎把卢森堡并入法国领土。拿破仑表示冷淡，未作回答。他说："很难把外国领土送给一个不想要的人。"俾斯麦随之谈到瑞士法语区、莱茵河左岸的德国土地以及德里弗里和兰都。他暗示："我们不能把土地送给你，但是如果你自己去占领，我们不阻拦。"拿破仑并未表示要占领什么领土，只是谈到："我们将欢迎从农奴制解放出来的更强大的普鲁士。"俾斯麦回答说："一个怀有远大志向的普鲁士将把法国人的友谊看作是极端重要的；一

个遭受挫折的普鲁士将不得不寻找反对法国的盟友；此外，我们不能创造时势，我们只能让时势走向成熟。”

拿破仑第三说：“一旦环境允许达成紧密的和更亲密的协商，贵国陛下就能充满信心地同我协商。”拿破仑第三明确表示要占领比利时，即在普奥战争中法国中立的条件是允许他占领比利时。俾斯麦想，如果接受这个建议，这就使整个莱茵地区受到威胁；如果拒绝，就将面临两面作战。因此，俾斯麦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拿破仑再未提起此事。拿破仑的策略是，静等普奥相争，他渔人得利。那时普奥两国两败俱伤，他可乘机占领卢森堡、比利时和莱茵河左岸土地。俾斯麦看无法达成协议，便告辞，拿破仑彬彬有礼地送走客人。俾斯麦在给威廉一世的报告说：“我总的印象是，法国宫廷现在的情绪是有利于我们的。”

俾斯麦从比亚里茨回柏林后，着手准备对奥战争。为了迫使奥地利两面作战，他向意大利提出结成军事同盟。意大利国王维克多·艾曼埃尔犹豫不决。他认为，新建立的意大利王国军队不足以对抗奥地利军队。俾斯麦则认为，在未

来战争中意大利军队是一定会被打败的，但这无关宏旨。他向意大利保证，不管南部战场结果如何，威尼斯都将交给意大利。意大利国王仍然犹豫不决。俾斯麦则威胁说，如果意大利国王这样的优柔寡断，他就向意大利公民呼吁，号召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和加里波的协助。这样，意大利国王才答应了俾斯麦的条件。

情报立即送到巴黎。拿破仑第三不愿普意同盟。法国军队还驻东罗马，意大利国王不能不听从法国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重返比亚里茨。他对拿破仑第三说，在任何情况下，普奥战争对普鲁士来说都将是长期而艰苦的，是消耗战，请拿破仑安心。1866 年 4 月 8 日，普意同盟正式签订双方负有不单独性的义务。意大利要求普鲁士一亿二千万法郎，俾斯麦立即同意。

俾斯麦把对手奥地利孤立起来了。

俾斯麦说：我最大的希望是把日耳曼统一为一个国家

十年前，俾斯麦对乔特尔说过："我只关心

普鲁士王室。”而今天俾斯麦对乔特尔说:“我最大的希望是把日耳曼统一为一个国家。”俾斯麦已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

统一德国,最大的障碍是奥地利。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神权不可侵犯!奥地利是德意志联邦议会主席。正统主义原则的代表者,维也纳体系的支柱。能侵犯吗?必须找到正当的口实。

奥皇弗兰茨·约瑟夫不甘心困在俾斯麦布下的迷魂阵里。他很想把霍尔斯坦卖给普鲁士,把威尼斯卖给意大利,价码是400万意大利里拉。但他还不敢冒这样大的风险!但他却允许奥格斯腾堡公爵在霍尔斯坦进行鼓动。俾斯麦终于找到了口实,因为加斯泰因条约规定,普鲁士在两公国都有发言权,两国共管吗!

艰难的工作还在于说服普王威廉一世。他向威廉一世报告说,普鲁士的各项权利受到侵犯。他对法国大使贝得提谈到威廉一世的性格时说:“国王的性格是这样的,如果我劝他去要求一项权利,我必须向他证明,其他人正在争夺这项权利。在任何人敢于限制他的权利时,他就可望作出果断的决定。”

俾斯麦对国王的说服终于成功了。1866年2月28日，召开御前会议，俾斯麦向国王指出，当前是对奥作战的大好时机，主要是签订普意同盟和法国善意中立的前景。国王在会上发言说："我不希望挑起战争，但是我不惧怕战争。"他继续说："两公国的所有权是值得一战的。""我们必须谈判和等待，我希望和平，但必须一战时，我决心战斗，我把战争看成是一桩正义事业。现在我乞求上帝给我指出正确的道路。"会议一致同意国王的旨意，决定，除非奥地利投降，否则就发动战争。会上只有王太子持不同意见。同王太子争论十分激烈。当晚俾斯麦坐在窗前对乔特尔说："如果门斯多夫重新推行旧日的政策，我必须在他面前卖弄小小的黑红黄。什列斯维希问题和日耳曼问题是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果要决一雌雄，我们必须一道去解决它们。一个日耳曼议会仍然要把中小邦保持在联邦之内。"停了一会他继续说："如果或者有一位厄菲阿尔提[①]，伟大的德意志运动将打倒他和他的主人。"然后他站起来走出房间，他已下定决

---

① 公元前5世纪60年代雅典那进派领袖，他的改革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心。

在普鲁士宫廷内部，俾斯麦的政策遭到激烈的反对。奥古斯塔王后，太子和太子妃都激烈反对战争。查理亲王、森菲—比尔塞克、包德尔斯文格、盖拉赫，全体虔信派，都一齐站出来反对俾斯麦。只有总参谋长毛奇一个人说：奥地利兵力的报导夸大其词。俾斯麦评论说："奥古斯塔的策略在这些天是如此反民族的：当战斗已在波希尼亚战场打响时，遵照王后旨意，在柏林还要讨论许多问题。"

王太子妃在3月末写信给她母亲说："重要的是你必须知道，因为国王希望弗里兹写信给你，那个恶人愤怒得发狂。……那是使不得的。是干扰他的计划，是一种不必要的干扰，总之一句话，他确实很生气，现在他竭尽一切努力防止其他方面的干扰。我想您应该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直接写信给您的原因。虽然这可能是阴谋（里通外国），我是憎恨阴谋的。"

宫廷内的反对，使俾斯麦神经极度紧张。人们看见他，吃饭时两手抱着头低声说："我想，我们都疯了。"

但是，俾斯麦坚持推行他的战争政策。1866

年 3 月 28 日，俾斯麦说服国王增加军事力量，为野战炮兵购置马匹。3 月 31 日，俾斯麦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关于德意志问题的动议。4 月 9 日他提出改组德意志联邦的建议，建立民族国会，实行普选权。

1866 年 5 月 3 日召开御前会议。威廉一世回顾了从 2 月份以来的普奥关系越来越恶化了，提出采取强硬措施，实行总动员。王太子和毛奇同意。但是欧伦堡和其他大臣都强烈反对。俾斯麦被骂为专制者。但是，动员令还是发出了。奥古斯塔王后提出抗议，离开柏林。王太子是高级军官，是不能离开的。但他说，兄弟阋墙是不合理的，不会有好的结果，会失去西里西亚和莱茵河土地！

威廉一世说："我知道，他们都反对我。他们每一个人！但我将手握宝剑率领我的军队，我宁愿战死也不愿这次普鲁士让步。"

俾斯麦也说："我知道，我被普遍咒骂。正像人们常说，命运无常。我拿脑袋作赌注，那怕我上断头台，也要赌到底。普鲁士和德意志都不能保持原状，两者都必须走这条路，别无他途！"

罪过，谁是功臣，谁是罪人，让历史评说！

俾斯麦遇刺

1866年5月7日，柏林的政治气候已经相当炽热了，反战的情绪不断上涨。俾斯麦大病一场。刚刚病逾去见威廉一世。从王宫回家途中，他悠然自得，走在菩提树大道上。突然，他听到身后两三声枪声。他急转身看到一位青年正向他射击。说是迟，那时快，俾斯麦一个恶虎捕食，跳将过去，一手抓住青年的右手腕，一手扼住青年的喉咙。刺客用左手拿过手枪，再向俾斯麦射击两枪，一颗子弹打在俾斯麦的褂子上，一颗似乎打中了。俾斯麦使出一个猎手的全部本领，又住青年的喉咙。这时一位行路人和两名士兵赶过来，捉住刺客，俾斯麦天助神佑，安然脱险！

俾斯麦肋部隐隐作痛，但他还是走回官邸。夫人约翰娜正陪客人用餐。俾斯麦走进书房，给威廉一世写了个简短的报告，然后走进餐厅，吻了夫人的前额，说："小宝贝，你不要害怕，一个人开枪打我，感谢上帝，"像讲故事一样，"我本来是个打猎的老手，我对自己说过：最后两枪必定打中，我是个死人了。我却能好好地走回家

来。回家之后，我周身检查一遍我的外衣、褂子、背心、内衣都有了洞，但是枪子从我的绸内衣外面滑过去，未伤及皮肤。我的一条肋骨有点痛，好象是枪子打的，但很快就不痛了。野兽的肋骨被枪子打，有时肋骨有凸凹力能够屈曲。后来由于擦掉几根毛，我才能看见子弹打的地方。我猜我的肋骨也是这样屈曲的。也许那两个子弹未发挥威力，是因为枪口紧靠我的褂子。”

刺客费迪南·科恩—布林德，是蒂宾根大学的学生，是1848年巴登起义中激进派卡尔·布村德的继子。他认为，杀了俾斯麦可免受战争之苦。被捕第二天，他在狱中自杀。

俾斯麦遇刺，震惊朝野。威廉一世拥抱他的首相，以示慰问。许多人跑到威廉街向俾斯麦欢呼。俾斯麦在夫人陪同下走上阳台，高呼“君主万岁！”表示谢意。

布林德的子弹表示人们的反战情绪。俾斯麦原来保守党的许多老朋友反对战争，离他远去。路德维希·盖拉赫在《十字报》上发表文章，反对俾斯麦把德国推向战争的边缘，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几天后，盖拉赫会见俾斯麦。他说：“他脸色苍白，态度生硬，情绪激动。我

警告他要当心，不要进行一场如此不幸的战争，提醒奥尔缪斯之辱也有他的部分责任，请求他不要由于意见不和而损害我们长久的个人友谊，但他并没有满足这一请求。他流露出焦虑不安的绝望情绪，谈到上帝和祈祷。他说，整个事情只是他和上帝之间的事情，朋友或政治盟友与此无关。”他们连手也没握就告别了。

许多人向国王奏疏、要求撤换俾斯麦。贝持曼—霍尔维格上疏说：“只要这个人还在陛下左右，蒙陛下信任，和解是不可能的。其他各国由于这个人的各种活动，失去了对陛下的信任。时间紧迫，只要流血的骰子一掷出，后悔就太晚了。”

在普鲁士和欧洲其他国家，同样增长着对俾斯麦的不满。3月末，一个国际性的密谋组织科堡密谋，力图劝说威廉一世解除俾斯麦的职务。这个组织里包括一些俾斯麦的同行。约翰·罗素勋爵对维多利亚女王说：“只有一个药方，一个确保和平的办法，就是由国王解除俾斯麦的职务。”4月1日，《科伦日报》发表文章，主张用格拉茨交换霍尔斯坦。这种思想受到许多普鲁士人的赞成。俾斯麦将被解职的谣传不胫

而走。4月4日王太子写信给俾斯麦的一位大臣说："罗思柴尔德惊动宇宙万物去反对俾斯麦，金融家在发抖。"

俾斯麦决心进行战争，他不允许议员们在国会里随便发表意见。他派两员检查官去起诉议员滥用自由发言权。这遭到议员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说："你可以把普鲁士国家颁布的全部勋章授给你的裁判员们。你的勋章不能掩盖这些人自身荣誉所受的创伤。不能对当代人或后代人隐瞒他们的伤痛！咳！他们同样伤害了祖国的荣耀。这种做法引起悲痛情绪，对国家是危险的。人们暗暗想到，将来只能是一个复仇的好时机。"

俾斯麦回答说："如果这样，我们将把议会变成比最高法院还高的上级法庭。若是这样，我们将给议员们超过其他公民的特权，这是一种连容克阶级都梦想不到的特权。如果你可以随便乱说，那么议员们就有资格进行任意的辱骂和诬陷。"

战争日益逼近。连俾斯麦的好友和他的私人银行家布莱希罗德都力图通过和平方法解决争端，即用格拉茨换取霍尔斯坦。但是一切努力

都落空了。

可是，在普鲁士自由派里也有人看到俾斯麦的眼前远大。自由派作家鲁道夫·哈乌姆写道："谁还不承认这个人的幸运和天才，他粗暴蛮横！"

重重阻力，无法阻止俾斯麦朝着战争道路走下去，这是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天授大命于俾斯麦，历史是前进而不能倒退的。

普奥战争——伟人还是坏蛋

由霍尔斯坦引起的普奥争端不断加剧。1866年4月9日，俾斯麦向德意志联邦议会提出一项改革方案。主要内容是：实行普遍、平等和秘密选举，召开全国国会，改组德意志联邦。建立全德管理机构。德意志公民在全德境内自由居住，确立德意志公民权，实行全国统一的关税和商业立法，统一外交政策，建立全国统一的军队。

奥地利则把两国的争端提交联邦议会。普鲁士认为，这违反了加斯泰因条约。它通知奥地利，两公国应按条约缔结前加以处理，即由两国

占领。6月7日，普鲁士军队开进霍尔斯坦。由于4月9日普鲁士提出的联邦改革方案没有得到答复，它又提出一项新的联邦改革方案送交各邦政府，在这个方案里把奥地利排除在德意志联邦之外。

6月11日，奥地利在德意志联邦会议上号召联邦军队对普鲁士军队作战。联邦议会没有接受奥地利的建议。巴伐利亚提出一项比较温和的建议，即选举一位联邦军事领导，结果以9票对6票获得通过。普鲁士代表当即站起来表示，由于这一投票，德意志联邦已经瓦解，号召各邦加入普鲁士领导的新联邦。

1866年6月16日，普鲁士军队正式对奥地利军队展开进攻。站在普鲁士方面的只有北德几个小邦，是少数；站在奥地利方面的有巴伐利亚、萨克森、汉诺威、符登堡、巴登、黑森、拿骚、法兰克福，是多数。

战争开始后，俾斯麦神经紧张。他同英国大使在外交部园里走来走去，他谈起匈奴英雄阿提拉。他说："阿提拉终归是一位比你们下院的约翰·布里特更伟大的人物。"时钟敲了12下。俾斯麦拿起表来看了看说："这时我们的军队正

进入汉诺威和黑森。斗争日益严重。普鲁士可能被打败。你可以相信，我们将勇敢战斗。如果我们被打败，我就不回来啦。我将在最后一次冲击中死去。人只能死一次，如果一个人被打败，最好去死！”

6月24日，意大利军队在库斯拓萨被奥地利军队打败。但普鲁士军队却顺利地进入萨克森、汉诺威、库尔黑森各邦。站在奥地利方面的各中小邦相继投降。1866年7月3日，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军队相遇于捷克境内的柯尼希格雷茨附近的萨多瓦村。集中在萨多瓦的普鲁士军队为19.1万人，奥地利为23.8万人。意大利和加入普方军队的总兵力为63万人，奥方总兵力为58.5万人。普军总参谋长为海·毛奇，他指挥军队很快占领了霍尔斯坦、中部和南部各邦。奥军总司令是L·贝奈德克，萨多瓦战役结果，奥军大败，伤亡被俘4万余人，普军损失约1万人。

在萨多瓦战役中，普王威廉一世和首相俾斯麦站在附近的一个小山上。乔特尔写道：“俾斯麦骑在一匹褐色大马上，身着灰色外挂，头带钢盔，两眼炯炯发光，神色奇异，使我想起孩提

时代听到的来自冷冻时代的巨人的故事。”他走过尸横遍野的战场时对乔特尔说：“将来有一天，赫伯特也许这样卧在沙场上，想起来令人痛心。”

战役结束后，一位副官对俾斯麦说：“大人，您现在是一位伟人啦。……如果太子来得太迟，您将成为最大的坏蛋！”俾斯麦听后哈哈笑！

布拉格和约

胜利了，普鲁士终于胜利了！将军们挥动军刀，进军维也纳。他们已经看到维也纳的屋顶，荣誉引导他们进军！可是，俾斯麦在胜利欢呼声中却冷静下来。他看到今天的胜利，他更想到明天、后天。不，不能进军维也纳，不能使哈布斯堡王朝受辱。必须立即停战，不损害奥地利，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

在杰那霍提普军大本营里，正在召开军事会议。俾斯麦迟到了，将军们并不重视他。国王告诉他，两星期内大炮即可运到。大炮一到，立刻进军维也纳。俾斯麦看完地图以后说：“不必攻打维也纳，不如向普勒斯累进军，渡过多瑙

河，把奥军引向东方，使奥军退入匈牙利，不战而弃维也纳。”威廉一世接受了他的主张。

几天后，另次军事会议在布隆召开。俾斯麦在会上提出同奥地利媾和。他说：“倘若敌军放弃维也纳，进军匈牙利，我们必定要追赶。如果我们越过多瑙河，我们正当的办法是驻扎在右岸，因为在这个坚固的隘口不能骑马追击。但是只要我们一过河，我们就将失去同后方的联系。于是最好是进军君士坦丁堡，建立一个新拜占庭帝国，普鲁士随它去了。”

法国大使突然来到俾斯麦的房间，站在他的床前。萨多瓦战役以前，维也纳就采取外交步骤，答应法国，只要它阻止意大利参战，就把威尼斯让给法国。拿破仑第三在他的大臣们的压力下，决定进行干涉。他的要求是：萨克森必须保留，反对成立一个日耳曼帝国，保持南北分离。沙皇俄国同样表示要分享胜利成果。法国大使贝内得还进一步要求莱茵河左岸土地。

欧洲列强之间的对比关系已经发生变化。现在必须同奥地利缔结和约，不是明天，而是今日。

1866 年 7 月 27 日在尼科尔斯堡召开军事

会议。俾斯麦说：

"我考虑了全部环境之后，我决定作为一项内阁事务接受维也纳提出的和谈条件。地位是艰难的。将军们不愿意停止他们胜利进军，而这些天国王继续受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影响。他听从他们的意见，而不听从我的意见。我不比其他人更能预料未来将是怎样的，世界今后将要怎样评论，但是只有我一个职务在身，在发表意见，说明这个意见，拥护它……我知道在参谋部里我被说成是营房里奎斯登贝格[1]，把我说成是瓦伦斯坦阵营里战时帝国议会的议员，使我难于承受。"

在军事会议上，军人们要长驱直入，进军维也纳。国王支持军人的意见。俾斯麦回忆说："我几天几夜努力思考，神经紧张过度，精疲力竭。我站起来，一言未发，走到附近我的房间，我放声大哭。这时我听见邻室军事会议已经散会。"

俾斯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带病强打精神给国王写奏章。并有附言：如不接受，他就辞

① 盖拉赫·奎斯登贝格（1580～1646），奥地利战时内阁秘书。

职！

第二天他把奏章呈送国王。奏章说："如果奥地利受到严重损害，它就要同法国联合，甚至同俄国联合，以便寻求对普鲁士复仇。"他指出："奥地利的毁灭就会造成一个缺口，将为新的革命开辟道路。"他表示："普鲁士不需要奥地利德意志。德意志的奥地利同普鲁士合并将不是一项成功。维也纳不能作为柏林的藩属来统治。"他要求："在法国有时间对奥地利施展进一步影响之前，我们必须尽快解决问题。"

国王对俾斯麦表示，这些理由是不够的。国王坚持，奥地利必须割让西里西亚，还要从德意志其他邦取得几块土地。俾斯麦回避谈这些问题。他劝国王，面对不可信任的盟国的复仇心，不要伤害上述国家。国王是位军人，无法驳回俾斯麦的建议，耸耸肩膀说："主要罪犯必须得到惩罚，误入迷途者可从轻发落。"

俾斯麦争辩说："开庭审问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关心德国的政策。奥地利敌对普鲁士，并不比普鲁士敌视奥地利值得惩罚。我们的事情是建立普鲁士国王领导下的德意志民族统一或者向这一点迈出第一步。"

国王还是不听他的意见。俾斯麦说："我不能继续说了，我认为他已不听我的话，我走出房间。"俾斯麦回房后很想从四层楼上跳下来摔死算了。

这时王太子走进来！双手搭在俾斯麦的肩膀上说："你知道，我过去是反对战争的。你认为必须打，并为此负责。如果你现在相信，目的已经达到，必须缔结和约，我支持你同我父亲谈话中的意见。"

王太子去见国王。半小时后，王太子弗里德里希回来对俾斯麦说："我们辩论得很厉害，但是我父亲同意啦！"国王在俾斯麦奏章上批示："由于我的首相把我置于面对敌人的危境，并且在这里我不能撤换他，我同我儿子讨论各种问题。他的意见同首相相同，我很伤心，在我军取得辉煌胜利之后，被迫吞下这棵酸果，如此慷慨地接受和约。"

就这样，1866 年 7 月 20 日普奥两国缔结停战协定，8 月 23 日签订布拉格和约。和约规定，解散德意志联邦，由普鲁士领导成立一个北德意志联邦，把奥地利排除在外；普鲁士获得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奥地利付一小笔赔款；承认

南德各邦独立和自主；普鲁士合并汉诺威·库尔黑森、拿骚、黑森—洪姆堡和法兰克福市；奥地利领土得到尊重。

第十一章　北德意志联邦

补偿法案

战争像是一场赌博。萨多瓦战役的胜利，不仅战胜了奥地利，也打败了国内的资产阶级。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反对声变成欢呼胜利，一切反对、抗议、抱怨都消失了！人们成群结队拥向王宫，向威廉一世祝贺胜利。威廉一世站在王宫的阳台上，俾斯麦和罗昂站在左右。他们感谢人民的支持！民族统一的旗帜，终于把德意志民族团结起来，统一起来！

首相从罪人变成了功臣。他从王宫坐马车回家。欢呼的人群把马卸下来，人拉车把首相送回省邸。上万人聚集在他家门口。人们高喊："欢迎外交战场上作出勇敢行为的将军"。俾斯麦偕夫人约翰娜站在窗口对群众说："很明确，

国王终究是正确的。”这时一声雷声响彻天空，掩没了俾斯麦的声音。他大声喊道：“上苍向我们欢呼致礼啦！”

对奥战争胜利了。摆在俾斯麦面前的任务是解决国内的冲突了。俾斯麦决定在国内进行选举。百废待兴，俾斯麦日夜操劳。夏日夜晚，俾斯麦的官邸微风徐徐，他邀请国会的两名领袖特维斯丁和温卢讨论当前的形势。在宫邸的花园里，他们边走边谈。温卢说：“宣言里并未提到报酬、立宪政府的问题。”俾斯麦非常激动。他说：“人民认为我什么事都能办到，有面临许多很少有人领会的困难。我不能说服国王做我所喜欢的任何事情。我们认为那是当然的，而国王却说：这篇宣言同宪法一样坏。根据这篇宣言，战后他们可以裁减我的军队，我不许他们裁减！”温卢说：“我们今天的形象很像七年战争前普鲁士的形势。但是我尊敬国王。”俾斯麦回答说：“局势相同，但是没有弗里德里希大帝！好！我们仍然要尽力而为。我们能说服普鲁士国王采取召开一个德意志国会这样的行动而感到骄傲。但是这样一种政策不能用演说和决议来进行。它必须由50万士兵来解决。”温卢问俾斯

麦："每个人都奇怪，为什么王宫上还挂着旗帜！"俾斯麦说："我几次问国王什么时候他下令开始，他不高兴地回答说，他将自行决定。因此你看，我不能随我所愿安排各种事情。国王已年迈7旬，王后反对我。"温卢问："如果遭到失败怎么办？"俾斯麦回答说："那时国王将退位。"

战争是胜利了，但是战争是没有经过议会批准的，战争的经费是没有经过议会批准的。战争胜利后按照英国的习惯要求议会免于追究，实行赦免！国王威廉一世说："我一刻也不承认我做了什么错事。"俾斯麦说："按照当时的情况，政府和国王都作得好。所谓要求就是要求承认这一点。"他主张这句话必须写在国王的第二天的演说里去。他后来回忆说："谈话持续几个小时，我已精疲力尽，因为我必须谨慎地说。屋里只有三人：国王、太子和我。太子没有公开支持我，虽然在表情上看他同我所想是一致的，这就加强了我对他父亲的态度。最后，国王让步了，虽然并不情愿。"

谈话不久，8月5日议会开幕。政府请求免于追究未经批准经费的责任。俾斯麦在谈会里说："我们要讲和，我们要同你们合作解决当前

任务。在这一点，我绝不拒绝根据宪法所作的保证。”他接着说：“当前政策的各项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军队的辉煌成功仅仅是增加了我们的赌注。我们比以前失去更多。确定无疑，在欧洲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个国家喜欢促进为德意志建立新的和普及的生活。因此，诸位先生，我们的事业就是保证整个国家的统一，事业上和外表上都是这样。”他说：“我恳请你们把眼睛转向国外，不要忘记，我们需要并肩对外。”在议会里大多数议员投票赞同免于追究。1866 年 9 月 14 日，议会通过《补偿法案》，承认了宪法纠纷时期政府的一切开支。宪法纠纷至此结束！

在柏林举行胜利阅兵式的晚上，威廉一世通知俾斯麦，由于他在战斗中表现了勇敢和军人气概，授予他终生军籍和后备军铁甲骑兵第七团少将军衔，并赠款 40 万塔勒。他用这笔钱购买了波美拉尼亚的瓦尔青庄园。这里距波罗的海海岸为 42 公里，距但泽为 150 公里。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

普奥战争开始后，恩格斯写了五篇战争短

评，刊登在曼彻斯特卫报上。指出战争的性质和普军胜利的原因。恩格斯指出："对于普军这样一支长期处于和平状态的军队来说，这一次的确打得很漂亮。当实际宣战后，普军士气大振，这主要是因为西北德意志各邦的一小撮君主都被驱逐出去了。这使军队产生了这样的思想——无论是否正确，我们只指出这是事实——认为他们这一次是为德意志统一而战，先前犹豫不决的预备兵和后备军士兵高声欢呼地进入了奥地利国境。这是他们所以打得这样好的主要原因。"

1866 年 7 月 25 日，普奥战争刚刚结束，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指出了战争的性质、意义、缺点和应采取的态度。

恩格斯说："自从俾斯麦利用普鲁士军队实行了资产阶级的小德意志计划而获得巨大成就的那一瞬间，德国的发展就这样坚决地采取了这个方向，以致我们只好和其他人一样承认这个既成事实，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

恩格斯论述了事件的性质。他说："至于事件的民族方面，俾斯麦无论如何要把小德意志帝国建立在资产阶级所说的境界以内……"

恩格斯谈到俾斯麦统一德国的意义："这件事情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使局势简单化了，同时由于他消除了各小邦首都之间的争吵，而且无论如何是加速了发展，所以革命就容易发生了。归根结底，德意志议会的确和普鲁士议会不一样。"

关于俾斯麦采用这条道路统一德国的缺点，恩格斯指出："主要的缺点是普鲁士主义在德国不可避免地泛滥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其次是奥地利的德意志省区暂时分离……可惜这两件事是无法阻止的。"

马克思在7月27日回信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就是说，必须原封不动地接受这堆垃圾。"

北德意志联邦的成立

萨多瓦战役后，普鲁士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空前活跃。保守派认为他们推翻宪法，至少要修改宪法的时机已到。他们蜂拥而至，来到大本营。他们主张向自由派进攻，拔掉自由派的牙齿。他们向国王建议，现在是动手的时候了。普

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也认为，俾斯麦没让他惩罚奥地利这个外部敌人，回过头来应该惩罚自由派这个国内的敌人了。俾斯麦不同意国王和保守派的意见。他说："在那种情况下，在德意志所有那些对胜利不满的人都要离开专制者的普鲁士，各新的省份将要加入反对派；我们就要进行一场征服普鲁士的战争，但是普鲁士的民族政策将半途而废。"他向国王进言说，胜利之后说是强调宪法的时候了。1866 年 9 月的一个下午，俾斯麦把拉萨尔的朋友洛塔尔·布舍（1817～1892）找来。由他口述，由布舍执笔起草一部宪法草案。晚间布舍把草案加以修改润色。第二天送交内阁讨论，并尽快送交各邦大使。文件一印出来，油墨未干，就送交议会。

1866 年 12 月，各邦代表同意宣传草案。1867 年 4 月经普选产生的制宪会议通过，北德意志联邦正式成立。

这部宪法是俾斯麦根据德国的国情，即德国的实际力量对比而制定。历史学家海因利希·冯·希贝尔在北德意志联邦议会讨论宪法时指出："需要考虑三种力量：①强大的普鲁士国家的要求；②受到地方情绪支配的德意志各邦

的要求；③社会舆论的力量。向我们提出的宪法草案，给每种力量提供一个机构；给普鲁士，普鲁士王室任联邦主席职位；给各小邦是联邦议会；给社会舆论，是帝国议会（公众代表）。”

根据宪法，联邦内各邦保持独立。立法机构由两院组成：联邦议会，由各邦代表组成，共43个议席，普鲁士占17席。在联邦议会里，普鲁士首相即北德联邦首相主持联邦议会，像以前德意志联邦议会一样。联邦议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既有立法权，又有执行权。帝国议会是由各邦通过普遍、直接和秘密选举产生。但帝国议会的决议只有通过联邦议会才能生效。

普鲁士国王是北德意志联邦的主席，普鲁士首相任北德意志联邦首相。他只对国王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议会不能罢免他。国王同时是联邦的最高统帅。

第十二章　德法战争

日耳曼更广泛的联合只有用武力才能获得

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是俾斯麦统一德国的决定性步骤，但统一大业并未完成。俾斯麦面前还是阻力重重，关山险阻。

1870年，北德意志联邦同南德四邦签订贸易和关税协定。但南德四邦为了保护他们的特权，坚决反对统一。俾斯麦提出南德四邦加入关税同盟，南德四邦群起反对，认为这是成立日耳曼帝国的预备阶段。反对最激烈的是南德四邦中最大的邦—巴伐利亚王国。巴伐利亚王国的领导人克洛特维格·霍亨洛埃亲王反对加入北德意志联邦，宁可同奥地利联合，维持邦联。他在谈到德法之战的可能性时说："在那种情况

下。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将站在法国一边进行战争。”符登堡王国同样反对国家统一，他们“宁可变成法国的而不成为普鲁士的”。黑森大公在1868年秋天就告诉斯特拉斯堡长官，现在正是法国进攻普鲁士的好时机。黑森大公答应，如果拿破仑第三用巴登土地给以补偿，他愿意把莱茵河西岸黑森的港口让给法国。南德四邦中只有巴登大公是普王威廉一世的女婿，不反对他岳父的政策。

俾斯麦并没有急于去统一南德四邦。1870年春末，俾斯麦还对符登堡大使说：“从策略上说，同南方联盟并未加强我们。很难说谁是普鲁士最坏的敌人，是你们的独立派，还是你们的民主派。对于稳健的政治家来说，必要的事情是第一位的，希望的事情次之。”他说：“在我放置诱饵打鹿时，我并不放枪打第一个来闻诱饵的鹿，而是等到鹿群都来才放枪。”

普奥战争后，法国拿破仑第三追悔莫及。拿破仑第三也想扩大领土，占领威尼斯、布鲁塞尔、特来维斯、兰都、卢森堡都可以。俾斯麦始终在玩弄他。俾斯麦想把卢森堡让给拿破仑第三。他宣布说，德意志联邦已经解散，普鲁士占

领卢森堡的权利已经失效。他认为，满足法国的最好方法是，30年间担任卢森堡大公的荷兰国王用几百万法郎卖给拿破仑。俾斯麦对法国大使贝内得提说："请尽快签订购买条约，然后告诉我们。"但是，荷兰国王拒绝出卖卢森堡。沙皇俄国提议召开伦敦会议，宣布卢森堡中立。

拿破仑第三感到他上当了。德法关系逐渐恶化。巴黎力图同意大利和奥地利结盟。俾斯麦指出："报纸必须更加不客气，更加威胁，更加进攻。"他说："手枪放在口袋里，手指扣准板机，我们必须紧密注视我们可疑的邻居的双手。他必须知道，只要他越过我们的边界，我们就立即射击，任意杀戮。"他估计德法战争即将来临。1868年他对一个客人说："拿破仑政局不稳，将使战争不可避免。可能在两年内发生。"他对另一位客人说："德意志人多数的更大的联合只有用武力才能获得，否则共同的危险将使他们发狂。"可是他又估计："总之，即使普鲁士战胜法国，结果会怎样？假使我们占领了阿尔萨斯，我们还要保持我们占领的，并永远占领斯特拉斯堡，那时我们可能有艰难时刻。"

埃姆斯电报

1868 年，西班牙发生革命，推翻了女王伊萨贝拉政权，她逃往法国，政权落入资产阶级右翼政党手中。新政权在 1869 年 6 月 6 日颁布一部宪法，在西班牙确立君主立宪制。西班牙莫里姆将军内阁提议由霍亨索伦家族的旁支列奥波德·霍亨索伦亲王继承西班牙王位。列奥波德是查理—安东·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亲王的儿子。1849 年西格马林根把扎格马林根公国割给普鲁士，而列奥波德正是这个公国的继承人。1870 年 7 月 10 日，西班牙内阁在报纸上公布了这一消息。第二天，法国报纸上发表了拿破仑第三的抗议，认为法兰西帝国不能容忍同一个霍亨索伦王室既在普鲁士掌权，又继承西班牙王位。这对法国的安全构成两面威胁。这件事在法国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认为法国外交当局特别是驻普鲁士大使贝内得提过于畏惧。政论家艾蒙德·阿布在报上发表评论说："如果俾斯麦先生认为 3800 万法国人都同贝内得提一样，他就陷入迷途了。"

7月4日，北德意志联邦外交部就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发表简短声明："内阁对此一无所知。"因为普王威廉一世把列奥波德的继承看作是纯粹的家族内部事务，与北德意志联邦和内阁都没有关系。

7月6日，法国外交大臣格拉蒙特在立法院发表演说，他声明：

"我们并不认为，对邻国人民权利的尊重可以使我们有义务容忍另一个大国委任自己的一位亲王来继承查理五世的王位，危害法国的利益和荣誉。"他说："我们深信，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就会懂得……毫不动摇地和毫不示弱地履行我们的职责。同那个敢于想要复活查理五世帝国的国家开战。"

俾斯麦同样认为，这纯粹是王室内部问题。他对国王说：

"如果德意志把西班牙从巨大的无政府危险中拯救出来，他们会十分感谢我们的。至于同法国的关系，在法国另一边有一个同情我们的国家，将是一件好事，法国是会估计到他的情绪的。"他进一步讲，"这个计划将使普鲁士节省一两个军团。"

西班牙革命后一星期，正在瓦尔青庄园休假的俾斯麦拍电报给外交部，指出西政牙危机可能提供刺激法国的机会。1868年圣诞节，他派两人去马德里调查那里的情况，一是洛塔尔·布赫尔，一是一名陆军军官马克斯·冯·费尔森少校。1869年春，特奥多尔·冯·贝恩哈迪作为普鲁士政府的非正式代表派往马德里。1869年5月已传出西班牙将把王位传给霍亨索伦家族的一员。拿破仑第三指示驻普大使质问此事。俾斯麦采取环顾左右而言他的策略。1868年9月，西班牙政府派密使萨拉查·伊·马萨雷多博士前往瑞士魏因堡，会见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家族的卡尔·安东亲王，建议由他的长子列奥波德继承西班牙王位，被安东亲王拒绝，但安东表示，如果拿破仑第三和普王威廉一世提名还可再议。

1870年2月24日，萨马查到杜塞尔多夫会见卡尔·安东亲王，代表西班牙摄政普里姆元帅正式提议列奥波德亲王继承西班牙王位，同时把这一提议送交普王威廉一世和首相俾斯麦。卡尔·安东亲王第二天对俾斯麦说：霍亨索伦家族成员进入西班牙，必然在欧洲引起反普

怒潮，必须加快或推迟悬而未决问题的解决。列奥波德亲王则声称，作为一个普鲁士人，他完全服从普王威廉一世的命令。

普鲁士宫廷内部意见分歧。王太子持反对态度。威廉一世顾虑重重，倾向于不接受。俾斯麦、罗昂和毛奇三位要臣则主张接受。3 月 9 日，俾斯麦上书国王，列举了接受的各种好处。他指出，如果霍亨索伦家族拒绝接受西班牙王位，西班牙王位就会落到依靠法国和罗马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手中。国王不为所动。威廉一世指出，今后同法国的危机不可能指望西班牙，40 年来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的国家，一个外来的王朝很快就会威信扫地。3 月 15 日，国王和王太子请西格马林根亲王、俾斯麦、罗昂、毛奇及其他三位大臣到宫中赴宴。宴会上大家劝国王接受西班牙的建议。王太子支持俾斯麦，但威廉一世仍然反对列奥波德亲王接受西班牙王位。

俾斯麦并未就此罢休。他设想，如果列奥波德亲王拒绝接受，由他的弟弟弗里德里希代替。他派往西班牙的两名代表，即布赫尔和费尔森的报告都认为应当接受。他们两人积极推动列奥波德亲王的父亲卡尔·安东接受王位。在他

父亲的推动下，列奥波德改变了主意，重新考虑提名问题。俾斯麦知道这种情况后，马上向马德里发了密电。6月8日他去瓦尔青庄园休养，不处理公务，不看电报，不答复来信。关于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他说，这是霍亨索伦家族私事，由他们自己进行，而不是北德意志联邦首相的事情。这时，普鲁士一片宁静和平的气氛。国王在埃姆斯温泉，俾斯麦在瓦尔青庄园，毛奇在西里西亚，列奥波德在巴伐利亚。可是，马德里在紧张地等待，西班牙议会在开会，只要普王威廉一世和列奥波德亲王同意，议会就选举新国王。

形势急转直下。6月19日，列奥波德亲王同意接受王位，两天后得到普王威廉一世的批准。当夜，西班牙军政府代表萨拉查向马德里拍密电，说他29日左右返回马德里。但电报译成7月9日前萨拉查不会回马德里。因此，西班牙摄政王在6月23日宣布议会休会，11月复会，可是3天后萨拉查乘火车回马德里时，议会已经休会了，无法通过列奥波德当选为西班牙国王的决议。事情在混乱中被泄露出去。

7月3日星期天，消息传到巴黎。从7月4日星期一开始，法国各报对普鲁士进行猛烈抨

击。7 月 6 日法国外交大臣格拉蒙特发表演说。7 月 7 日俾斯麦在评论格拉蒙特的演说时指出："这看上去象是战争。"但是他仍然采取沉默的态度。他让柏林外交部宣布，列奥汉德的提名是王室和西班牙人之间的事情，与普鲁士政府无关。7 月 1 日晚 6 时，他拍电报到外交部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听之任之。"

在法国抗议的形势下，普王威廉一世主张放弃西班牙王位。7 月 11 日晨，他派副官冯·施特兰茨上校前往西格马林根，劝说卡尔·安东和列奥波德放弃提名。两位亲王接受这个意见。卡尔·安东致电拿破仑第三，通知他放弃提名。7 月 12 日俾斯麦回到柏林，才知道列奥波德放弃王位的消息。

7 月 12 日晚，俾斯麦请罗昂、毛奇和内务大臣欧伦堡进晚餐。罗昂和毛奇都认为，现在开始战争对普鲁士有利。当晚，俾斯麦拍电报到埃姆斯，请求国王从巴黎撤回普鲁士大使。他强调说，德国舆论要求对格拉蒙特演说作出解释。

俾斯麦研究了国内外形势。格拉蒙特 7 月 6 日演说，引起了维也纳和伦敦对普鲁士的同情。德意志各小邦也同样激起德意志民族情绪。俄

国外交大臣哥查科夫向他保证。俄国在外交上和军事上不会进行干涉。陆军部向他报告，动员的准备已经开始。

一切准备就绪，只欠东风。

7 月 13 日星期三晚，俾斯麦再次邀请罗昂和毛奇共进晚餐。俾斯麦在交谈中谈到他要辞职，罗昂和毛奇的情绪也非常懊伤。他们正在边吃边谈，俾斯麦得到报告说，俾斯麦来了密电，正在翻译中，有枢密顾问阿贝肯的签字。密电约二百字左右。电文译出后，俾斯麦得知，电文是阿贝肯根据国王的旨意拟就并签署的。他把电文念给罗昂和毛奇听，两人更加懊伤，以至再也无意于酒食了。这时看到国王陛下授权他立即把法国大使贝内得提的新要求和国王以这一要求的拒绝通知普鲁士驻外大使并在报刊上公布。于是俾斯麦问毛奇：他对我们武装部队、装备抱有多大信心，在战争危险突然降临时，部队需要多少准备时间？毛奇回答说：如果战争需要进行，那么他认为期望拖延战争的爆发对我们不利；即使开始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能够立即掩护我们莱茵河左岸的全部领土以反对法国人的入侵，但我们的备战会很快超过法国；然而再

往后拖延，我们这个优势就会遭到削弱。所以他认为，迅速爆发战争比拖延战争在全面上对我们更为有利。

于是，俾斯麦当着两位客人的面，拿起笔来，对电文进行了删节。

原文是：

贝内得提先生在散步时拦住我，最坚决要求我授权他立即往巴黎拍电，我负有义务保证将来任何时候绝不再批准可能再提出的霍亨索伦家族的候选资格。我拒绝同意这一点，最后有些严肃地告诉他，没有人敢于和能够保证这样的永久义务。自然，我告诉他，我还没有收到消息，由于他从巴黎和马德里得到的消息比我早些，他能够容易理解为什么我国政府再次不介入这件事。

然后，陛下收到亲王（卡尔·安东）的电报。由于陛下已通知贝内得提伯爵，他正等待亲王的消息，并征求欧伦堡伯爵和我的意见，他决定不再接见法国大使，并通过副官告诉他，陛下已从亲王那里收到贝内得提从巴黎收到的新闻报道。他已经没有什么话对大使说了。陛下请您决定，是否把贝内得提的新要求和他的否决通知

我们的大使和公诸报端。

代印A（阿贝肯）13. 7. 70

俾斯麦的删节文：

在西班牙王国政府将霍亨索伦亲王放弃继承王位的消息正式通知法兰西帝国政府之后，法国大使在埃姆斯向国王陛下又提出了要求，授权他向巴黎发电报说，如果霍亨索伦家族重提自己的王位继承问题，国王陛下有义务在将来永不予以同意。此后国王陛下拒绝再次接见法国大使，让值班副官告诉大使，国王陛下已不再有任何事情通告大使了。

他把删节文读给罗昂和毛奇听。毛奇说："语调变了。原来的听起来好象是退兵号，现在的就象迎战的号角！"毛奇和罗昂立即高兴起来，突然食欲大增，又吃又喝，兴致勃勃地谈起来。罗昂说："老天爷还在，他不会让我们蒙受耻辱。"毛奇望着天花板，拍着胸脯说："假如我还能在这样的战争中率领我们的军队，那么即使战后魔鬼马上亲自把我这副老骨头收去也行。"

7月14日，俾斯麦把删节的电文在报上发表。巴黎各报出号外刊登这一电文。

当晚巴黎街头出现游行示威，高喊“打到柏林去！”7月15日法国议会批准战争拨款，7月19日法国正式宣战。

民族的防御的战争

德法战争是什么性质的战争，是王朝战争，还是民族的防御的战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是弃权，参加，还是反对，在工人运动内部是有分歧的。

在北德意志联邦议会讨论战争拨款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投了弃权票。李卜克内西在声明中说：“目前的战争是场王朝战争，是为了波拿巴王朝利益而战。”他声明：“我们不能同意为了进行战争而向国会请求的拨款，因为如果同意，就是对……准备这次战争的普鲁士政府投信任票。”他又声明：“我们对于所请求的拨款同样也不能加以拒绝；因为这样会被理解为赞同波拿巴的凶恶和犯罪的政策。”

1870年7月19～23日马克思写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德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洲全体会员》。他指出，“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国的阶级斗争篡夺了政权，并用以不时进行的对外战争来延长自己的统治，无怪他一开始就把国际看作危险的敌人。”他指出：“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

在谈到战争性质时马克思指出：“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战争。”同时马克思揭露了俾斯麦同路易·波拿巴相勾结，以期摧毁德国内部的民主派反对派。”马克思指出：“德国工人阶级如果允许目前这场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么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

1870年8月15日，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写信给马克思。恩格斯说：“德国已被登格（指路易·波拿巴——引者）卷入争取民族生存的战争。”“包括各个阶级在内的德国全体人民群众已经了解到，问题首先正好是在于争取民族生存，因此，他们马上就投入了这一斗争。”恩格斯在信中又指出：“这场战争是在勒曼（指威廉一世——引者）和俾斯麦之流指挥下进行的，如

果他们幸运地结束了这场战争，那他们必然会赢得暂时的荣誉，这一点，我们要归咎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这种情况确实非常讨厌，然而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因此就把反俾斯麦主义提高到唯一的指导原则，那是荒谬的。”恩格斯认为这是次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应是民族统一。

德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恩格斯提出了六点意见。他说："我认为这些人可以：

1、参加民族运动——这种运动强大到什么程度，我从库格曼的信中可以看到——只要这一运动是保卫德国的（但并不排斥在某种情况下在缔结和约以前的进攻）；

2、同时强调德国民族利益和普鲁士王朝利益之间的区别；

3、反对吞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的一切企图——俾斯麦现在正流露出要把这两个地方并入巴伐利亚和巴登的意图；

4、一等到巴黎由一个共和主义，而不是沙文主义的政府掌握政权，就力争同它保持光荣的和平；

5、不断强调德国工人利益和法国工人利益的一致性，他们不赞成战争，也不愿彼此打仗；

6、至于俄国，就像国际的宣言所说的那样。

8月17日马克思回信说："你的来信和我已考虑成熟的答复计划是完全一致的。"

德法战争

1870年7月19日，法国对北德意志联邦宣战。法皇拿破仑第三自任总司令，勒布尔任总参谋长。法国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企图集中兵力迅速越过边界，突进法兰克福方向，切断南北德意志之间的联系，迫使南德诸邦中立，全力击败普鲁士军队。7月26日，法军7个军团配置在麦茨、斯特拉斯堡—莱茵河地区，统称莱茵军团。另支法军配置在柏尔福。7月28日，总司令拿破仑第三携幼子到达麦茨，亲临前线进行指挥。30日，法军攻占萨尔布吕肯这座不设防的城市，这是法军在战争中取得的唯一一次胜利。

战争开始后立即暴露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军队的弱点，也暴露了帝国本身的腐朽没落。

1870年7月20日晨9时50分军需总监从麦茨致电陆军部行政总局主任说：

麦茨没有糖，没有咖啡，没有大米，没有白酒，没有盐，油脂和面包干很少，火速运送至少一百万份口粮到蒂昂维尔。

1870年7月21日晨7时20分米歇尔将军致巴黎陆军部电：

抵达柏尔福，没找到我的各个旅，没找到师长。我怎么办？我不知道我的各团究竟在哪里？

1870年7月24日晚7时，第三军团军需监致电巴黎陆军部：

第三军团明天离开麦茨。我处没有医务人员，没有辅助人员，没有医务箱，没有行军厨房，没有运输车，没有秤，第四师和骑兵师在这里连一个官员也没有。

1870年7月27日夜1时12分总参谋长致电巴黎陆军部：

参加军队的队伍，仍然在没有弹药、没有装备的情况下源源开到。

一片混乱，法国军队真是一片混乱！

战争开始后，普王威廉一世任总司令，毛奇任总参谋长。7月31日，威廉一世在首相俾斯

麦陪同下离开柏林，亲往前线。德军分三路前进：北路由斯塔因美兹率领，兵力8.5万；中路由弗·查理亲王统帅，13.5万军队；南路由弗·威廉亲王率领，兵力12万。

德国三路大军长驱直入。南路军在8月4日越过国境，在维桑堡打败麦克马洪元帅指挥的法军右翼，占领维桑堡。8月16日，双方在维也特村激战，傍晚法军撤退，随后又发生毕克伦会战。法军均遭败仗。一部分法军退守斯特拉斯堡，被德军包围。麦克马洪率大部分法军继续彻退，德军紧追不舍，几天后到达南锡。

德军北路和中路8月14日在科尔塞利斯打败巴赞元帅指挥的法军，迫使巴赞军退守麦茨。巴赞元帅企图西撤沙隆，被德军总参谋长毛奇发现。他立即派查理亲王中路军越威塞尔河，插入法军后方，把巴赞军团团围在麦茨城。8月16日，双方在马尔斯—拉平—图尔发生激战。巴赞之帅18万军队进行突围。德军1.2万人，竟阻止他6个小时，不久德国援军到达，法军突围失败。8月18日双方又在格垃夫洛特激战。德军20万，法军18万。德军伤亡甚众达2万人，但法军突围终未成功。

从南路撤回的麦克马洪军队在沙隆组建12．5万新军。这支军队在8月25日和27日又两次被德军打败。德军从两翼包抄过来。右翼越过麦士河，占领了通往比利时的阿登山口；左翼切断了法军退往巴黎的退路。两军合围，把麦克马洪军队围困在小城色当，法军总司令拿破仑第三也在这里。

1870年9月1日，20万德军对色当城发动全面进攻。法军第十二军团军长勤布伦将军的回忆录，论述了色当战争中德军的状况。他写道：

"第十二军团的各预备炮兵连，企图回击德军炮队的炮火。可是，唉，一颗炮弹也没有射到目标。他们的120毫米口径的大炮射程不大。它们的炮弹有的落入地中，有的在飞行到生效距离的1/2或1/3时就在空中爆炸。我对这些如此无力感到失望，下令给指挥该炮兵的上校，把炮位大大向前推进，布置得尽量接近步兵阵线……我对他说：如果你把炮位向德军炮兵移近几百米，也许你能使你的炮弹落到德军炮兵的所在地。上校反驳说：二三百米，多也好，少也好，丝毫也不能改变普鲁士的大炮比我们所占

的优势。我们的炮弹横竖射不到敌方的炮队。”

他继续写道：

“时间是早晨8点或8点1刻光景。在这个时刻，甚至在早晨7点半，德法两军的形势已经使杜克罗（代替受伤的麦克马洪任总司令）将军计划的退却，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无论如何是极难实现了。为了使法军摆脱德军，在8月31日白天或夜晚，就应当开始向美最尔退却。9月1日，从早晨8点起，弗·查理亲王从麦茨率领亲王大军，与萨克森太子的军人会合，这个联军已经在广大的盆地里压迫法军……我军要冲出这个陷阱退向美最尔，就得穿过配备有四、五百门大炮支援的20至22万德军的阵线，我军怎能做得到呢？”

他写道：

“法军当时的总情况是这样，突然……我们看到大批人、马和炮车，从加盒森林高地，像雪崩一样倒塌下来，溃乱不堪地滚入我所说的盆地的深处。这批人简直像疯了一样从盆地冲向色当的要塞壕，企图进入要塞。这样冲向第十二军团的后方的这一大批人原来是第七军团的主力，因为被敌军从原阵地击退，便企图在这些阵

地后面寻求掩避……”

“法军在这次战役中死伤1500人，可能还不止此数……步兵炮兵的弹药全部耗尽……”

“到战役末尾，原有沙龙军的总共13万人中剩下的7.5万到8万人，被围在拥挤不堪的色当要塞中。其中一部分还保持一定程度的秩序，奉派配置在防御工事里；已是乌合之众的另一部分则散乱在城内。监视这群溃兵的军官特别感到暗淡的景象，就是我们这些不幸的士兵样样东西都缺，冲入民宅，他们不听自己的指挥人员的命令，完全没有任何纪律。最后，还有在败军中常见的景象，几个坏蛋叫骂有人卖国，指斥自己的将领，说因为他们把法国卖给普鲁士人才使自己战败……”

在9月1日的色当战役中，普王威廉一世和俾斯麦站在离色当只有3公里远的弗雷努瓦村上面的山丘上，用望远镜观看德军400门大炮轰击法军阵地的情景。随从他们的有罗昂和毛奇。毛奇第一个看见色当要塞上升起的白旗。法军在色当投降了。这时天像1866年一样，一位军官对俾斯麦说：由于进攻取得成功，您是一位伟人，但是如果敌人冲过莱茵河，您就是现在

最大的坏蛋。

囚徒路易·波拿巴

毛奇看到色当要塞上的白旗以后，派布龙萨特·冯·舍伦多夫上校去了解情况。晚6时半上校回来了，说拿破仑第三想投降。他带来一名法国军官，带来了拿破仑第三的乞降信。信说：

“先生，我的兄弟：

由于我不能死在我的军队之中，因此对我来说只有把我的剑交到陛下您的手中。

拿破仑

色当。1870年9月1日。”

俾斯麦以国王威廉一世的名义口授写了回信。信说：

“先生，我的兄弟：

在为我们即将见面的环境而惋惜的同时，我接受陛下的佩剑，并同意您派一名赋有全权的军官安排您麾下如此勇敢战斗的军队的投降。我方指定毛奇将军执行。我是陛下您的兄弟！

威廉

色当　1870年9月1日”

当日晚，两名法国军官文普芳和卡尔特尔诺来到唐榭里，会见俾斯麦和毛奇。文普芳请求毛奇：饶了法国军队，以大度争取法国人民。俾斯麦却说：“人们可以指望一个诸侯的感恩报答，但不能指望一个民族的感恩报答，尤其不能指望法兰西民族的感恩报答。”他指出：“法国没有持久的关系接连改变政府和朝代，现在的政府没有它的继承者保证的束缚。”他攻击法兰西民族，说：法兰西人是个妒忌的民族，柯尼格拉茨战役虽然没有损害他们，他们却不高兴我们的胜利，如何能期待他们宽洪大度，能使他们为了色当而饶恕我们。”他指出：“我们需要土地、要塞和边界以保卫自己，永远不受我们敌人的侵犯。”德国方面同意，停火延长到次日早晨9时。

9月2日日出前，拿破仑第三骑车来到唐谢里，要求会见普王威廉一世，争取法国较好的条件，如把法军在比利时拘留，而不囚禁在德国战俘营里。俾斯麦穿好衣服，在公路旁一家农舍的阴暗的屋子里与拿破仑第三会见。他拒绝拿破

仑第三会见威廉一世的要求，除非他在投降书上签字。他告诉拿破仑第三，国王住在离这里很远的地方。会见的房舍只有10尺见方，屋里只有一张松木桌子和两把薄席椅。他们对坐了一个小时，谈话艰难而紧张。俾斯麦是单独会见拿破仑的，而拿破仑有四名骑兵保卫。俾斯麦说："我不得不扣紧我的左轮手枪。我发现我单独会见他的六名军官，我可能不自愿地看一看我的手枪。我自然地抓住它。我想皇帝已经看到这一点，因为他脸色灰白。"

拿破仑第三终于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俾斯麦陪同拿破仑第三在弗雷努瓦附近的贝莱维尤宫会见了普鲁士国王和王太子，双方达成协议，拿破仑经过比利时前往卡塞尔附近的威廉斯赫埃，作为战俘直到战争结束。

9月3日晨10时，细雨蒙蒙，道路泥泞。一队黑色枯髅骑兵护送一辆4面封闭的4轮马车，拿破仑第三坐在车里。这辆马车从唐谢里缓缓经过，俾斯麦和毛奇站在街上，向他敬礼，送他离去。

第十三章　德意志帝国

法兰克福和约，俾斯麦夜游巴黎

色当战役和停战协定签定后，德国军队长驱直入，进入法国，包围巴黎。9月4日晚，巴黎爆发革命，在市政厅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这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三共和。9月19日晚，法兰西共和国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到费里埃会见俾斯麦。普王威廉一世在费里埃的罗思柴尔德的豪华住宅里建立了大本营，把卫生间权作书房。这里距巴黎为25公里，距尼尔赛不到14公里。法夫尔律师出身，年已61岁。法夫尔对俾斯麦滔滔不绝地要求缔结一个公正和约，使法兰西和德意志两国人民友好相处，互相谅解。俾斯麦一面抽着雪茄，一面讲他的话。然后他对法夫尔说："我们并不关心你们的政府形式。如

果我们发现恢复拿破仑政权对我们有利，我们将把他送回巴黎。”他说：“如果我相信你们的政策是法兰西的政策，我将劝说国王不要一块领土和一分钱而撤兵。但是，你代表的是不足道的少数，我们既不能从你那里，也不能从你以后的任何政府那里得到保证。我们考虑我们未来的安全，我们要求整个阿斯萨斯、洛林的一部分和麦茨城。”

法夫尔听完俾斯麦的话，立即面无血色，声泪俱下，捡起挂满灰尘的外衣和压扁了的帽子，对俾斯麦说：“你想毁灭法国。我们既不让出我们的一寸土地，也不让出炮台的一块石头。”法夫尔要求停战，以便法国人能选出一个国民议会。俾斯麦告诉他，他不干涉法国内政，停战也可以获得，条件是他们保证交出阿尔萨斯残余要塞和巴黎近郊的一个要塞。会谈进行一个半小时。法夫尔忧心忡忡，垂头丧气，几乎绝望地离去。

俾斯麦和普鲁士大本营都认为，48小时内法夫尔一定回来签订和约。他们的算盘打错了。48小时内，法国临时政府公布了法夫尔同俾斯麦会谈的详细情况。这一消息的公布，引起了巴

黎和全法国人民的反抗热情。各地反德游击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俾斯麦采取严厉措施进行镇压。凡对德军射击或嫌疑者一律格杀勿论。接纳抵抗战士的村庄全部烧毁。他甚至想把抵抗地区的居民全部迁往德国，关进营房。但法国人民的抵抗运动是镇压不下去的。甚至王太子都说："法国人的顽强抵抗说明，一个团结的人民具有伟大的民族思想，就能够作出这样的事。"

1870年10月1日，俾斯麦派两名美国人，安布罗斯·伯恩塞德和福布斯上校打着停战的旗帜进入巴黎，探听情况。他们在市政厅会见了法夫尔和临时政府首脑特罗胥。他们二人从巴黎回来后报告说，法夫尔同意割让阿尔萨斯，但其他部长不同意。

1871年1月，法国临时政府派出和谈代表团。1月26日，俾斯麦同法夫尔达成停止炮轰巴黎的协议，也确定了交出巴黎防御工事的条件。同时，法国国民议会在波尔多召开，选举阿道夫·梯也尔为行政首脑。1871年2月21日星期二，梯也尔在法夫尔的陪同下来到凡尔赛，同俾斯麦会谈。他们两人唇枪舌剑，开展一场外交

斗争。

俾斯麦说："现在不再是9月末的地位啦。如果你再说我们堡垒一块石头也不让，那就不必讨论了。从我最后一次见到你以后，你的头发白多啦。可惜，你来得太迟啦。门后边有一位拿破仑派来的新使者在等候。我将接待他（实际没有——引者）。"俾斯麦说："我为什么要同你谈判，为什么我把你的共和国看作合法政府，实际上不过是几个叛党。如果你们的皇帝回来，他有权把你作为叛徒枪毙。"

法夫尔说："那时将是内战和无政府状态。"

俾斯麦说："你确信那样吗？我看不出你们的内战对我们德意志有什么损害。"

法夫尔说："你不怕把我们逼到绝境。你不怕我们进行更加猛烈的反抗？"

俾斯麦说："你们反抗！你们无权反抗。请你认真听我说，你无权利，在人们和上帝面前，为了挽救像军事名声这样的小事，让三百万人口的城市陷于饥饿？……不要谈反抗。在这种情况下，那是一种罪恶。"他掉过脸来看那道门对法夫尔说："拿破仑使者在门后等候呢！"

法夫尔说："现在还不！在我们遭受全部灾

难之后，请不要强迫容忍波拿巴的耻辱！”

在俾斯麦的压力下，法夫尔接受了割地和赔款的全部要求。饭后，俾斯麦接见了法国政府首脑梯也尔。俾斯麦要求6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梯也尔说：“这是一种耻辱。”俾斯麦开始用德语说话，通过翻译说：“我对你们的语言知道甚少，不懂梯也尔先生最后一句话。”

随后，他们讨论了和约的细节。俾斯麦又用法语说话。最后俾斯麦把战争赔款降到50亿。是交出柏尔福还是允许德军进入巴黎，让梯也尔进行选择。法国人宁可接受让德国人入城的耻辱，而保留了柏尔福要塞。

2月26日，谈判结束。梯也尔在法兰克福和约上签字。规定割让阿尔萨斯和北洛林、50亿金法郎赔款。规定法军在巴黎保留不得超过3万人，德国军队在巴黎街道上举行示威游行。德军司令部计划德军分三天入城，第一天3月1日沿香谢里大街进入，第三天形成高潮，德国皇帝、俾斯麦、高级将领率禁卫团通过凯旋门。规定，和约批准后德军立即撤出巴黎。3月2日，法国波尔多国民议会批准了和约。德军进入巴黎的仪式被取消了。德国皇帝在隆尚的跑道上，

1867年他和拿破仑第三在这里检阅过法国军队，在太子、俾斯麦、毛奇的陪同下，接受鸣炮敬礼！3月2日晚，俾斯麦夜游巴黎，遭到巴黎人民的嘲笑，人们对他出口不逊！这是他最后一次进入巴黎。他已不是法国人民的贵宾！3月6日，俾斯麦离开普罗旺斯路，第二天越过国境，从此他再也没有到过法国。

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

德军进入法国后，1870年1月5日在凡尔赛县衙门的旗杆上升起了普鲁士王国的旗帜。他们似乎把凡尔赛当作德国的首都，但并未住进凡尔赛宫。威廉一世住进罗思柴尔德的豪华住宅里，陪同他作战的6位亲王、4位大公、5位公爵和一名伯爵都住进其他华丽的宅院。俾斯麦住在普罗旺斯路一位棉布厂主遗孀的4层楼房里。

德国统一的问题已经摆上日程了。南德四邦君主虽然不喜欢德意志联邦。但他们也认识到他们的邦必须参加统一的德意志。想建立帝国最急切的是王太子。从进入凡尔赛那一天起。

他认为“这里是重建皇帝和帝国的最佳场所”。他对俾斯麦说：

“我们向这些邦表示我们已下定决心，是没有危险的。只要我们下决心并用适当的态度对付他们，你将看到，你还未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

俾斯麦说：“我们同我们的朋友一道在战场上，只为了这一点，我不能威胁他们。那样只能把他们赶到奥地利的怀抱。”

王太子说：“那有什么关系，最简单不过的是由现在这里的诸侯宣布成立一个帝国，并简单地宣布一部宪法。所有国王都将服从这一压力。”

俾斯麦说：“威廉国王本人不能被说服接受这件事。”

王太子说：“如果你，阁下，不希望这样作，那我完全没有可能劝说国王走这一步。”

俾斯麦说：“现在我们必须把德意志问题的发展等待时机！”

王太子说：“对于我来说，由于我代表未来，我不能不关心这种拖延。”

俾斯麦说：“王太子不如不发表这样的观

点。”

王太子说：“我强烈抗议用这种方式不允许我开口。除了陛下，没有人有权告诉我，我应该说什么，或不应该说什么。”

俾斯麦说：“如果王太子命令我，我将按他指示行事。”

王太子说：“我没有给俾斯麦伯爵下命令，我抗议这种说法。”

俾斯麦说：“如果您认为任何另一位能比我办事更好的话。我随时准备让位。”

两人的争论多么激烈！可是成立统一的国家已经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了。巴伐利亚、巴登、符登堡、黑森等几个大邦代表来到凡尔赛，进行建立德意志联盟的谈判。俾斯麦在谈判中对各邦采取不同的策略。巴伐利亚在平时可以保留一支军队，邮政独立，在外交委员会中有一名常委，在酒税上也对巴伐利亚让步。对符登堡采取孤立政策。经过艰苦的讨价还价，黑森和巴登在1870年11月15日，巴伐利亚在11月23日，符登堡在25日相继加入联盟。南德四邦统一问题已初步确定。

联盟采用什么名称，德国要建立一个什么

样的国家，还没有确定的主张。王太子想建立一个自由的德意志帝国。俾斯麦说王太子想当皇帝想疯了。俾斯麦也想建立一个帝国，它应该是普鲁士王朝的扩大。就建立一个什么国家问题，俾斯麦同各邦君主进行艰苦的谈判。巴伐利亚不同意宪法的某些条款，俾斯麦坚决不改。巴伐利亚大使回到慕尼黑去。俾斯麦便首先同巴登和符登堡谈判。它们涉及邮政、铁路、电报电话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例如，各邦要求，各邦军队要穿本邦的军服。在衣领颜色上的争论几乎使谈判破裂。俾斯麦只好让步。

同四邦达成协议的11月的一个晚上，俾斯麦手拿酒盃进入大厅坐下说："巴伐利亚条约已准备好并签字了。德意志统一已完成了，皇帝将执行权力。这是一件大事，报界可能是不满意的。但是一位依照一般方式写历史的人可能说，愚蠢的傻瓜可能要求更多，因为他们不能不让步。这样的历史学家说'不能不'这3个字可能是对的。但是条约中有'不能不'有什么用。我知道他们离开会满意的。条约有其缺点，但可以加以修改，缺点将来可以补充……我认为它是这些年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建立什么样国家，关键还在于威廉一世的态度。为了使威廉一世接受帝国和皇位，俾斯麦用威尔夫基金买通了巴伐利亚国王，让他写劝进表。这份劝进表是由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侍从长官霍尔施泰因写的，以德意志各邦诸侯的名义请求威廉一世重建德意志帝国并接受帝位。1870 年 12 月 7 日，巴伐利亚国王的列奥波德亲王趁给王后庆祝生日之机，在快要开宴之前，把劝进表呈送国王。威廉一世说："一件公文吗？先让俾斯麦看，这是他份内的事。"饭后俾斯麦大声朗读实际上由他亲手写的劝进表。威廉听后很生气。认为帝国和帝位对他是个负担。威廉一世说："我是一个普鲁士人，我要这个头衔做什么，像一个化装舞会的人跳舞一样。"当年除夕，威廉一世对他儿子说："对我来说，最反对最不喜欢的是称号问题。我不能不牢记德意志更大的统一是已故陛下的主要目的，不能不记住这顶纸皇冠是怎样敬献给我的哥哥，他又怎样不接受它，感谢上帝！"

尽管威廉一世对劝进表不高兴，王太子却非常兴奋。他在日记里说："今天，皇帝和帝国都是不可挽回地重建起来了。无皇帝时代，乱世

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这个光荣的称号是一个充分的保证。”

随后俾斯麦又导演一个帝国议会代表团的劝进活动。代表团的领导仍然是1849年那位西姆桑。他当着威廉一世的面宣读劝进表："北德意志联邦议会同德意志各邦诸侯恳请陛下接受德意志皇冠，以献身于统一大事。”威廉一世回答说："只有在德意志各王公和各自由市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只有根据德意志民族的志愿以及它的代表机关同各王公协商一致的条件下，我才承认上帝召唤，执行上帝的希望。”

1871年1月17日，威廉一世同俾斯麦发生了采用什么名称的争论。威廉宣布他不采用“德意志皇帝”称号，而采用“德意志的皇帝”，否则他不作皇帝。俾斯麦对他说，“德意志的皇帝”包括领土主权。他引用俄国的例子。俄国皇帝称俄罗斯皇帝，而不称为俄罗斯的皇帝。威廉不听俾斯麦的意见。俾斯麦递给威廉一个银塔勒，上面刻着普鲁士国王，而不是普鲁士的国王。俾斯麦引经据点，分析皇帝与国王、大公与公爵的地位。威廉生气说："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今天是我说他们应该怎样，大公已列于普鲁

士公之上，将来也应是如此。”威廉一世这时哭了，哭他“不可救药的地位，因为明天他就要同老普鲁士告别啦”。他哭着说：“我的儿子全心全意拥护新办法，而我不愿走那个方向，只抱住普鲁士！”然后，他跳了起来，他发狂了，不再讨论第二天的典礼。

1871年1月18日，内务部办公室发出下列请帖：“中午在凡尔赛镜厅庆祝教团节，举行简短祈祷，然后将宣布”，请帖或写请帖人和部门，也没写宣布什么？

1月18日，在凡尔赛镜厅72米长的大厅里，一头布置了一张讲台，窗户下设置了一个军用祭坛。17面大镜光彩照人。60面大旗在厅内展开，600名军官穿着整齐的军官服，排成庄严的队伍，代表各个部队，王太子亲自指挥。各邦王公鱼贯而入，威廉一世最后入场。

威廉一世请各邦王公同他站到一条平行线上。牧师没有宣读拟好的祈祷文，而是发表一篇演说，其中攻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还讲述了论1月18日的话。然后俾斯麦走上前去，宣读宣言。开头几句话是：“寡人，奉上帝之命的普鲁士国王，应德意志各邦王公和各自由市一致呼

吁寡人重建中断60年之久的帝国并管理这个帝国之请，现在敬告诸位，寡人把它作为对整个祖国的责任，答应联合的德意志各邦王公和各自由市之请，接受德意志皇帝的头衔。”

俾斯麦在宣读这篇《告德意志人民书》时，心情激动。呼吸紧张，胸部起伏，脸色煞白，两耳无色，几乎是透明的。

巴登大公带头高呼："威廉皇帝万岁！"会场同时高呼！王太子跪在皇帝面前，吻他的手，皇帝把他抱起，情绪十分激动，场面十分动人！

威廉接受皇位和各邦王公效忠后走下讲台，同站在前排的军官们握手而没有理会站在中间的俾斯麦！

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历史上的第二帝国，在法国凡尔赛宫的镜厅里诞生了。

俾斯麦被封为公爵，又获得弗里德里希斯卢庄园（两个莫尔根土地，两万五千莫尔根森林）。他的最大愿望把德意志统一为一个国家，已经实现了。他本人成了俾斯麦公爵、帝国首相、德国最大的庄园主之一，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德国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德意志帝国宪法

1871年3月3日，召开了德意志帝国议会，4月16日通过了德意志帝国宪法。宪法规定，德意志建立持久的联邦，联邦名称是德意志帝国。宪法第一条规定，联邦领土由25邦组成。各邦都保留一定的自治权，例如教育、宗教、部分司法、直接税征收、水上运输。南德各邦还可独立管理邮政、电讯、征收酒类消费税。宪法第四条规定，下列事务属于帝国的监督和宪法权范围之内：军事、外交、统一立法、邮政电讯、铁路、对外贸易、度量衡和货币制度、海关和银行立法、公民权等。

宪法没有规定德意志皇帝这一职位，而规定了帝国主席的职位。但规定"联邦主席职位应属于普鲁士国王，普鲁士国王享有德意志皇帝的尊号"。宪法规定，皇帝在国际上代表帝国，以帝国名义宣战：媾和、同外国缔结同盟或条约。皇帝有权决定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的召开、延期或闭会，有权任命宰相，建议并公布帝国法律并监督法律的执行，指挥陆海军，宣布戒严。德

意志皇帝享有的权力，无异是一位专制君主，由霍亨索伦家族世袭，而不是几年一选的总统。

宪法规定，帝国立法权属于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实际上联邦议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它由25个邦和自由市的代表组成。这些代表都是由各邦王公和自由市议会委托的。代表基本上按1815年德意志联邦议会的代表数。联邦议会共52个席位，普鲁士17席，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各6席，符登堡4席，巴登和黑森各3席、什克伦堡—什味林、布伦瑞克各2席，其他各邦为1席。各邦投票必须作为一个单位进行。宪法规定，对宪法的任何修改，只要14票就可以否决。而普鲁士就拥有17票。因此保证了普鲁士的统治地位。联邦议会负责执行帝国所需要的一般行政命令和措施，纠正执行帝国立法或上述计划所出现的缺陷，调解各邦之间的纠纷。帝国议会通过的提案和决议必须经联邦议会同意才能生效。联邦议会议员有权出席帝国议会的会议，以代表本邦的观点，并规定一经请求，不许拒绝。这样，德意志的联邦议会比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参议院的权力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宪法规定，帝国议会通过普遍、平等和秘密的投票选举产生。每5年改选一次。年满25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帝国立法、预算、借款、商约都需要帝国议会通过方能生效。它有权要求政府作出报告，对行政事务表示意见。在帝国立法范围内，有权向联邦议会和帝国宰相提出请愿。但它的权力是有限的。例如，宪法规定，帝国议会每年度预算，但国家主要收入是永久性的，没有联邦议会的同意不能修改。因此，德国的帝国议会不是英国的下院。政府不对它负责，不能由它的多数党组成政府。

帝国宪法规定了帝国宰相的职位。帝国宰相由皇帝任命，只对皇帝负责。宰相担任联邦议会主席，负责领导联邦事务。帝国宰相就是普鲁士王国内阁主席，他不对议会负责，可以解散议会，议会无权罢免他。因此，德国的宰相比英国首相具有更大的权力。他不是责任内阁的总理（首相）。从1870年帝国建立时起，俾斯麦就是帝国宰相，直到1890年。

宪法规定，帝国司法机关为帝国法院。而地方法院则是各邦法院。

帝国宪法也规定了公民权利。规定居住在

任何邦的公民都享有德国的公民权，包括居住、担任公职、获得财产等。但没有规定信仰、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

宪法规定，德国国旗以普鲁士的黑白两色旗加上汉萨同盟的红色，制成黑白红三色旗，以代替 1848 年黑红金黄三色旗。

《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1871 年 6 月 16 日，俾斯麦回到了柏林。他骑马经过勃兰登堡门，站在马路两旁的群众热烈向他欢呼。俾斯麦已成为历史上传奇式的人物。

1871 年 3 月 21 日，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写信给俾斯麦。信中说：

“最近六年间我的国家以惊人的速度成功地达到了今天所应有的光辉地位，十年前我召您到我这里所从事的活动都发生在这一时期里。全世界都清楚，您怎样没有辜负我的信任，根据什么当时我让人召您来。普鲁士和德意志因为今天在我驻跸之地体现出来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应当对您的建议、您的远见卓识

和孜孜不倦的活动表示感谢。

尽管给这样的业绩的报答您是应得的，但我仍要迫切地并有责任公开和永远表示祖国和我个人对您的谢意。为此，我晋升您列入普鲁士侯爵等级，并规定由您的家族的长子世袭这一爵位。”

俾斯麦从此被升为公爵，还被授予霍亨索伦宝石大十字勋章和位于劳恩堡的比瓦尔青庄园大得多的弗里德里希斯鲁庄园。

俾斯麦统一德国的成功，得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赞扬。历史学家特罗伊森在1864年6月12日在一封信里说：“你知道我并不太佩服冯·俾斯麦先生，但是，很长时期以来，普鲁士在欧洲的地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这样突出，这样掌握着主动。”他一贯坚持的原则是：“国家首先要关心的是力量。”

民族协会的领导人之一、激进派约翰内斯·米格尔1864年10月在民族协会大会上发表演说，列举了俾斯麦的成就，指出俾斯麦的所作所为，全都符合德意志的利益。

《普鲁士年鉴》这个资产阶级自由派刊物在1862年还在攻击俾斯麦。可是1864年8月它写

道："我们愿低估业已取得的成就，因为命运已注定我们的民族计划要由另一派人来完成。"1865年1月它又发表文章，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国家统一，或者采取意思一样的另一种说法，是普鲁士国家权力的扩充。至于通过什么道路达到这一目标，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统一和自由是资产阶级自由派长期奋斗的目示。随着俾斯麦武力统一德国的胜利，他们把统一放在第一位，自由成为次要的了。1864年民族协会的一名成员匿名在《边界信使》上写道："民族协会需要的是胜利，实实在在的胜利。要在政治上取得尊敬，只有靠取得胜利。如果民族协会不能独立地取得任何全国性的胜利，那它就只有支持俾斯麦的胜利，让自己从属于这些胜利，把俾斯麦的胜利看作自己的胜利。"

1867年2月4日，《普鲁士年鉴》发表文章说："如果德意志需要在统一和自由之间作出抉择，它必须根据历史和处境，无条件地选择前者……无论是要走征服的道路，还是要走独裁的道路，甚至在军事独裁面前，它都不应畏缩不前。它必须心甘情愿地追随专制的领袖，如果这

个领袖能使德意志得到国家的完整，得到生存，得到与别国平等的地位，从而得到自己的前途的话。”作者认为，“自由派的目的就必须服从于民族的目的……自由派的目的不能使民族的目的实现受到挫折。”

资产阶级自由派左翼，即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仍然坚持统一和自由并重的观点，对俾斯麦压制国内自由持批评和反对态度。舒尔兹·德里奇在1864年说：国家概念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国家要求通过政府形式来保证立国的基本条件，从而它就有可能按照本身需要来建立生活。这里自由重于一切，对一切国家和在一切情况下都是如此。”

1870年普法战争胜利后，自由派历史学家格菲努斯写文《要求和平的请愿书》，要求普鲁士在打倒法国以后不要在德意志内兼并领土，建立联邦国家，不要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他说：“半世纪来，人们企求、渴望和希翼越来越能摆脱了旧时代的军人体制，并希望使人民陷于贫困的常备军负担如果不能全部取消，至少也能有所减少。而现在，我们眼前却出现了一个将持久的、具有可怕优势的军事强国，它远为上

世纪侵略成性、致力征战的军事强国所不及。”

普鲁士自由派左翼的约翰·雅科比在1866年普奥战争后拒绝参加欢呼胜利。他说：这次战争并不是按照人民的志愿进行的，战争的胜利对争取自由的事业毫无裨益，只是对军阀们的无限统治权和专制主义有利。1866年8月23日，他在议会发表演说时说：“当代人对当代所作的判断并不都是不带偏见的；对普鲁士来说，比亚里茨的那些日子是不是比奥尔缪茨的一天光荣，这要由后人判断。”他认为“没有自由的统一是奴隶的统一”。1867年5月6日，他又说：“一个在政治自由中统一起来的德国是欧洲和平最可靠的保证；另一方面，在普鲁士军事统治下，德意志对它的邻国人民永远是危险的，它将开创一个战争的时代，这些战争有使我们回到暴力主义的悲惨时代的危险，但愿这样的灾难不要降临到普鲁士和我们的德意志祖国的头上。

1887年12月～1888年3月，恩格斯写了著名的《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对俾斯麦用武力统一德国作了正确的评价。恩格斯一开头就说：“现在，让我们把我们的理论应用于今天的

德国历史，应用于它的血和铁的暴力实践。从这里，我们将会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血和铁的政策暂时必然得到成功，为什么它最终必然破产。”

恩格斯分析了 1815 年后欧洲的政治形势，指出随着商业、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势力的增长，民族意识到处发扬，被分割、被压迫的民族都要求统一和独立。这是欧洲的大气候。就德国国内讲，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德国小邦的割据状况以及形形色色的工商业立法，已经成为束缚工商业发展的不可忍受的桎梏。同时，年轻的德国工业必须在世界市场上显一显身法，但是德国的商人在国外没有强大的统一德国的保护，像英法两国那样。恩格斯指出，对于一个统一的“祖国”的要求，是有一种强烈的物质背景的。恩格斯指出，争取德国的统一不仅要反对君主和其他内部敌人，而且也要反对外国。恩格斯详细分析了法俄两国相勾结，企图瓜分德国，阻碍德国统一的历史。

恩格斯论述了德国统一的三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就是通过消除一切独立的邦而达到真正统一的道路，亦即实行公开革命的道路。恩格斯指出：“按照当时的情况，只有在路

易—拿破仑发动的建立莱茵疆界的战争的情况下，才能踏上这条统一德国的道路。然而，这场战争并没有发生……。”

这就是当时存在用革命道路统一德国的可能性，但是并没有出现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条件。这就是评价俾斯麦统一德国的关键。

第二条道路是在奥地利统治下的统一，但是恩格斯指出："德意志在奥地利保护下的统一是一种浪漫的梦想；当德意志的中小君主1863年为了宣布奥地利的弗兰茨·约瑟夫为德意志皇帝而在法兰克福集会时，就表明这是一种梦想。"

剩下的第三条道路是：以普鲁士为首的统一。恩格斯具体分析了普鲁士资本主义的发展，关税同盟的成立及扩大，使中小邦的整个资产阶级都吸引到普鲁士方面来。因此中小邦的新兴资产阶级把普鲁士看成是自己在经济上的前卫和将来在政治上的前卫。因此，统一德国是普鲁士接受的一种新的"德意志的使命"。随后，恩格斯分析了民族联邦的纲领，指出："民族联盟尽管完全是自由主义的，但首先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全国统一，尽可能是在自由主义的

普鲁士领导下，不得已时，现在这样的普鲁士也行。”

通过恩格斯对德国统一上述三条道路的分析，我们理解到，俾斯麦用武力统一德国，不随他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是德国当时实际力量对比的结果，是德国历史的必然。俾斯麦只不过是普鲁士这种“德意志使命”的执行人而已！

恩格斯认为，丹麦战争已实现了一部分民族愿望。关于1866年普奥战争，恩格斯评论说：“简言之，这是一场用革命手段实现的完全彻底的革命。当然，我们决不因此而责备他。相反，我们要责备他的是：他是不够革命的，他只是一个从上面进行的普鲁士革命家，他开始整个革命时所采取的立场使他只能把革命实现一半；他一走上兼并的道路，就满足于四个可怜的小邦。”关于1870年德法战争，恩格斯认为，这一次他实际有人民作为后盾，人民只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一场不仅为了莱茵河地区，而且为了民族生存的战争。预备兵和后备军士兵——1813年以来第一次——又心甘情愿地斗志昂扬地云集于战旗之下。

恩格斯肯定了俾斯麦在统一德国中的作

用，然后又揭露了俾斯麦对法国的掠夺。他指出："按照俾斯麦自己的宣言，进行战争并不是反对法国人民，而是反对路易·拿破仑的。随着后者的垮台，进行战争也就没有任何理由了。"恩格斯反对德国占领亚尔萨斯和洛林两省。恩格斯揭露俾斯麦成为独裁者。他说："在俄国的帮助下，德国成了欧洲第一强国，而德国的全部政权都落到了独裁者俾斯麦手中。"恩格斯分析了德国当时的阶级关系，分析了大地主、农民、资产者、小资产者和工人。指出，大地主和一部分农民构成了保守党人；工业资产阶级构成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右翼——民族自由党，左翼为进步党，工人独立政党则是社会民主党。恩格斯认为，俾斯麦在德国推行波拿巴主义。他说："在 1871 年德国的形势下，像俾斯麦这样一个实际上就不得不在各阶极之间采取一种随风转舵的政策了。"恩格斯指出，这一点无可责难，关键是他今后走什么道路："如果走向建立最终的资产阶级统治，这就是同历史发展相适应的；如果它走向保持旧普鲁士国家，走向使德国逐步普鲁士化，那末它就是反动的，是注定要遭受最后失败的；如果它仅仅走向保持俾斯麦的统治，

那末它就是波拿巴主义的政策，其结局必然同任何波拿巴主义一样。”①

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俾斯麦究竟走向哪里？已经不是本书的任务了。关于如何评价俾斯麦统一德国的功过，让我们共同学习恩格斯这部巨著《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① 以上引言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63～533页。